

A large, stylized portrait of Zhou Enlai in profile, looking towards the right. He is wearing a dark Mao suit. The background is a warm, golden-yellow color with a faint map of China overlaid. The title '周恩来' is written in large, bold, red, calligraphic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image.

# 周恩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央电视台

##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

陕西人民出版社  
珠海出版社

# 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

## 第一集 风云途程

（江南外景。淮安驸马巷周家老屋）

（床。课桌。周恩来幼年照片）

江苏淮安城里有一个驸马巷。一百年前，周恩来就出生在这间老屋里。望子成龙的父母给他取名大鸾，字翔宇，期望他能够像大鸟一样翱翔天空。读私塾的时候，周大鸾改成了周恩来。

周恩来和内忧外患的中国一同进入二十世纪。历经坎坷，他后来成为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政府总理。

（周恩来逝世时的标准像）

（1976年4月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的群众图片）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了，那年他78岁。人民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自发地悼念他。这悲壮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人们在心里为他建造了一座永恒的丰碑！

周恩来这个名字，叫了整整一百年；周总理这个称呼，已经呼唤了将近半个世纪。中华民族一百年的风风雨雨，共和国半个世纪的艰辛探索，和这个名字相伴，和这个称呼相随。重温开国总理周恩来，就是重温我们自己的历史，展示一种崇高的人格精神，诉说一位历史骄子最具风采的生命历程。

（江泽民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周恩来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建立了丰功伟绩。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民主革命的战争年代，他披荆斩棘，出生入死，功勋卓著。新中国成立后，他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共和国总理的岗位上，工作了整整二十六年。周恩来同志一生的奋斗历程和思想风范，对我们今人和后人，都是很有教育意义的。

（周恩来逝世时联合国下半旗悼念）

（李琦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曾任周恩来办公室副主任）

周恩来1976年逝世以后，联合国专门下半旗哀悼。他担任总理职务这个时间之长，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在他二十六年多的总理生涯中，他为中国的振兴和富强。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的精力和生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永恒的丰碑。同时，赢得了世界上无论是东方的国家还是西方的国家，对他的很高的赞誉。

（巴黎旧景。周恩来图片）

（巴黎西郊布伦森林的空地）

（巴黎南郊意大利广场附近戈德弗鲁瓦大街十七号旅馆）

（周恩来和朋友合影图片。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的特写）

历史又是怎样选择周恩来作为开国总理的呢？

这要从1920年他22岁时去法国说起。

正是在法国，他开始走上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那里，他参加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为数不多的创建人之一。当时，在他的身边聚集着一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最有名的是蔡和森、李维汉、向警予、

蔡畅、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其中还有后来新中国的四位副总理，他们是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和邓小平。

邓小平曾说：在法国，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周恩来。

（今天的广州）

今天的广东，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曾是引人注目的前沿地带。七十年前，这里也曾是中国革命的政治中心。

在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中，广东也是个特别值得一说的地方。他在这里结识了后来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两个大人物，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蒋介石。广州还是周恩来的军事生涯的起点，他在这里为创建中国现代革命军队发挥了重要作用。

（旧广州。大革命时期镜头）

（孙中山、廖仲恺图片）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国内，到达广州的时候，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在蓬勃兴起。

二十六岁的周恩来，当时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而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廖仲恺一见面却对他说：“我们等你好久了。”廖仲恺邀请周恩来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刚刚创办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的校长就是蒋介石。

（黄埔军校课堂）

（周恩来当时的图片）

（黄埔军校外景）

周恩来全力投入到这支新型军队的政治建设工作中。军队里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直接听过周恩来讲课的，有后来战功赫赫的红军将领徐向前、陈庸、左权、蒋先云、王尔琢、周士弟。也有国民党中央军的著名将领杜聿明、范汉杰、胡宗南、宋希濂、郑洞国。这些人后来见到周恩来，都以师礼相待。

毛泽东曾说：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貌。

（黄埔学生军东征讨伐陈炯明）

（1925年3月25日蒋介石和周恩来在东征前线的合影）

为了讨伐盘踞广东地方的军阀，周恩来曾两次和蒋介石等率革命军东征。第一次东征的时候，突然传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他们就在前线举行了追悼会。于是就有了这张周恩来和蒋介石在一起最早的合影照片。

前面这个人就是蒋介石，身后手拿祭文的是周恩来。

（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克复潮汕地区捷报）

（周恩来发布东江行政公署布告。同文学堂。委任状）

（周恩来在东江行政委员任上的图片。东江外景）

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广东国民政府决定在东江一带建立革命政权，并任命周恩来担任包括二十五个县的东西各署行政委员，实际上就是东江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

这是周恩来发布的就职通电。在政权建设方面，他提出限期召集各种行政会议，引导人民参加政治，实现孙中山训政主张的初期目标。在经济建设上，他提出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为指导，着重治理河道，开设港口，构筑公路，先求交通之方便，再谋实业之发展。

这是周恩来当时签发的一些下属官员的委任状。

周恩来在东江三个月，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一个地区范围内全面主持行政工作。这也是他从政治国才能的第一次显露。

（今天的广州广卫路）

（太平餐馆。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时的图片）

广州的广卫路，如今成了结婚青年常常光顾的“婚纱一条街”。

周恩来的婚姻，也是从里开始的。1925年8月，他和邓颖超结婚了。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通信中，常常提到这个广卫路。这条街上的太平餐馆里面，如今还挂着他们当年结婚时的照片。实际上，他们只是婚后在这里请一些黄浦军校的朋友吃过一次饭。

（邓颖超周恩来妻子，曾任全国政协主席）

我和周恩来同志是在1919年“五四”时期认识的。以后，我们又有一部分人组织了觉悟社，这样我们的来往就比较多了。后来，1920年他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在天津当小学教师。在我们通信时，有一次，在信中他突然地提出来要求把我们的感情支展到明确的恋爱关系，他非常急迫地要求我回他的信，但我的母亲是非常民主自由的，在我小时候她就给了我婚姻自由，她来做参谋。那个时候，我不能不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就说，现在不要答复，等他回来看一看再说，母亲是这样的思想。但我的思想感情呢，被周恩来同志追得不能不马上答复他，因此这点上我没有接受我母亲的意见，我就自己主张婚姻自由，我就明确地答复了周恩来同志。从1922年，1923年这个期间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是一般的同志关系了，朋友的关系了，而是相爱的关系了。

（广州文德楼。周恩来和邓颖超当年合影图片）

（周恩来、邓颖超1954年10月、11月的通信手稿）

广州的文德楼是他们结婚时的住所。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在他们生前的通信中，周恩来常常自称“鸾”。叫邓颖超“凤”或“小超”；而邓颖超则自称“凤”，叫周恩来“鸾”或“来”。这样的称呼，一直保持到晚年。

在五十年代的一封信中，周恩来告诉邓颖超：昨天路过广卫路，发现了广卫楼，快三十年了，不能不引起许多回忆。

邓颖超给周恩来的信中说：羊城，是多么值得怀念和引起回忆的地方，那是你和我共同生活开始的地方。三十年前，你和我是天南地北害相思，这次我和你卫星地北天南互思念。

（广州附近的番禺。大革命时期农讲所旧址）

（毛泽东、周恩来在广州时的图片）

（毛泽东主办农讲所时的课程安排）

在广州，周恩来还结识了毛泽东。在大革命后期，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先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后来到广州附近的番禺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各地的农民运动骨干。

毛泽东经常邀请一些人前来讲课。从保存下来的这张课程安排上可以看出，他邀请了萧楚女、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这当中，自然也有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周恩来讲的题目是“军事运动与农民运动”，这大概是他当时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时，蒋介石已经暴露出反共的面目。他在1926年3月制造了“中山舰

事件”，大肆排挤在国民党里工作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得到消息后，立即赶往蒋介石那里，当面质问。气愤得把桌子也掀翻了。蒋介石硬是把周恩来软禁了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一起商量，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然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没有接受这个意见，丧失了一次机会。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武汉中共五大旧址）

（南昌起义旧址）

1927年4月，羽翼丰满的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

周恩来来到了武汉。他在大革命三年中的出色工作，在政治和军事上显露的才干，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1927年5月，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不到三十岁的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是后来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中，在政治局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党内主持军事工作的周恩来，以前委书记之职果断地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这场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辉煌转折。也是周恩来革命生涯的又一个辉煌起点。他由此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者之一。

（南昌江西大旅社内景）

（周恩来、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的图片特写）

（上述人物特写时配字幕，交待其当时身份）

在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这支队伍里，有叶挺将军，还走出了后来新中国的六位元帅，他们是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和起义时是排长的林彪。其中贺龙是起义后由周恩来亲自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的。

（车离南昌城）

（广东汕尾甲子湾周恩来避难处）

（傍晚，茫茫海天，一叶扁舟）

（地名的字幕）

（周恩来1927年时的图片，叶挺、聂荣臻的图片）

就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起义部队在南昌城里坚持了三天后，不得不撤出南下。

起义军走一路打一路，向广东进发，最后在潮汕一带被国民党军队打散了。

一直带病指挥作战的周恩来，焦虑万分。他被当地的党组织安置在这户老百姓家里躲避搜捕，以等待时机向香港转移。

高烧不退的周恩来在这张床上躺了半个月。

一天晚上，同行的叶挺和聂荣臻用担架把周恩来抬到海边的一条小船上面。聂荣臻后来回忆：“船太小，风浪大，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子拴在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在茫茫的大海中颠簸了两天两夜，好不容易才到达香港。”

（旧上海镜头。辣斐德路周恩来旧居。云南路477号中共中央旧址）

（上海中央时期周恩来的各种指示手稿，亲自编定的各地红军建制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处于低潮。经历南昌起义的周恩来，却更加成熟了。在香港治好病后，他回到了白色恐怖下的上海。他后来曾说：“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从来没有灰心过，在敌人公开压迫下没有胆怯过。”

1928年11月，周恩来在莫斯科筹备召开党的六大后，回到上海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

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首脑机关成为极其秘密的地方。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周恩来在这里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候，党还不成熟，主要领导人频繁更换，先后三次出现影响全局的“左”倾错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周恩来也受到“左”倾路线的影响。

但是，相忍为党的周恩来始终顾全大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全身心地负责各项工作的实施，恢复被打散了的党的组织，指导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建设，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到1930年3月，全国党员已发展到十万，超过了大革命高潮时的人数。并且出现了十几个红色苏区，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也已初具规模。

（瑞金中央苏区旧址）

（红军反“围剿”战争）

（南方外景）

（遵义会议旧址）

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来到了江西中央苏区。这时，毛泽东正受到党内极“左”路线的排挤，处境十分艰难。在随后发生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遭受巨大损失，只好放弃苏区，被迫长征。

长征途中，党内高层开始对苏区的失败进行反思。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时，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和博古的军事顾问李德谈话时拍了桌子，连桌上的马灯都晃动起来。

为了总结教训，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在这次会上，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杨尚昆时任红三军团政委，遵义会议参加者）

开这个会，最少要争取十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没有战争，平静地开这个会。周总理就负责布置整个军队怎么摆，摆在哪里，来保障中央有十天到半个月的时间来开这个会。如果说周总理的努力，第一个是在黎平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不向北，向西，向贵州。第二个就是经过他的手布置了一个可以开会的，争取十天到半个月的时间，在遵义开个会。

那么遵义会议一开的时候呢，博古就做了一个检查。博古做检查的主要内容是这样子的，他把五次围剿失败完全推到客观原因，国民党军队多呀，兵力强，武器好啊，还有帝国主义的帮助这么一套，首先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报告。做了报告以后，接着就是周总理做报告，就叫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周总理就检讨，恩来同志做了比较合乎客观事实的，深刻的检讨，整整讲了一上午，承认错误。那么这样子一下子毛主席的思想占了绝对多数。结果你看，遵义会议把博古摆在一边去了。

最早的三人团里头有周恩来，以后到遵义出去了。到了贵州边境上，不是改了个叫三人小组么，改了这个名字。那时候就决定张闻天当总书记，三人小组里头也有周恩来，这个证明什么东西呢，证明他确实检讨得不错，大家很服他，当然博古那时候是不满意他的了。再一个，我想，还有周总理这个为人，在党内一直是很重要的领导人，虽然他没当过一把手，他有一定威望，所以虽然犯了这个错误，但是大家还是原谅他，还是赞成他参加这个三人小组。三人小组最后就是毛、周、王三个人。

（红军在陕北的电影资料等。周恩来骑马的镜头）

（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有关资料）

经历于山万水，工农红军终于到达了陕北，结束了被迫进行的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多中央红军只剩下不到八千人了。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制造事端，民族危亡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蒋介石却在四面布置几十万重兵继续“围剿”红军。

为了生存，为了联合抗日的大计，红军一到陕北，就不得不努力做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等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这是今天能够看到的周恩来最早的电影镜头。

1936年4月，周恩来留着长长的大胡子，秘密赶赴当时为东北军占领的延安城，会见“剿总”副司令张学良。

（延安教堂）

在延安城里的这座天主教堂小楼上，周恩来和张学良两位交战双方的将帅坐谈了一夜，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双方一寒暄，却发现都是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的弟子。分别的时候，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张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大地图，还送了三万银元给红军。事后，周恩来说他“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快、这样有志气的人”。还写了封信给张学良，说：“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童小鹏时任中央军委机要科干部）

这个对张学良一生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原来张学良想着救国，怎么救国，用什么办法，他曾经想学法西斯。他到意大利，到德国去学，用法西斯的办法来救中国。周恩来跟他解释，法西斯是资本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的产物，没有群众基础的，凭他的独裁，这个特别在中国不适合，它没群众基础，救中国主要靠群众，靠大家统一起来，停止内战。这个对他（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作用。

（延安天主教堂外景。周恩来和张学良当时图片）

见面后，张学良对身边的人说：我和周先生一见如故，他说话有情有理，解决了我很多疑难，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我知道了共产党第一步是抗日，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报载“西安事变”消息。张学良、杨虎城当时图片）

八个月后，信赖共产党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在形势的发展扑朔迷离的时候，周恩来赶赴西安居中调停，迫使蒋介石答应了人民的抗日主张。周恩来后来反复提到，张学良是千古功臣！

（抗战初期的资料镜头）

（庐山。蒋介石讲话镜头）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形势转变的枢纽。从此，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走出西北的黄土山沟，活跃在国民党统治区。

周恩来长达十年的谈判生涯开始了。他曾两次到庐山，终于使蒋介石在这里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多灾多难的中国，迎来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崭新局面。

（周恩来穿国民政府军装的照片。孔祥熙照片）

1938年，身披中将军服的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到了武汉。他刚一露面，国民党核心人物孔祥熙就请他到自己控制的行政院财政部任职，周恩来拒绝了。



（中共南方局成员在武汉开会）

在八年抗战和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里，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主要在国统区领导党的工作。还要同方方面面的人士打交道。人们都说他是中国共产党联结外部世界的桥梁，也是国内外持各种观点的人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人格化的象征。

（海明威在重庆图片）

他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1941年在重庆和周恩来谈过一次话，他得出了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说周恩来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典范的话，未来就是他们的。”

从周恩来身上得出这个结论的，远不止是一个外国人。

（重庆外景。特园。康公馆。周恩来和民主人士交往的电影镜头和图片）

当时的重庆，集中了大量的国民党高层人士、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周恩来花费许多心血和他们接触和交往。爱国民主人士鲜特生的公馆“特园”，和民族资本家康心如住的领事巷十号，是周恩来经常和民主人士聚会座谈的地方。

受到周恩来影响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张澜、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胡子昂、胡厥文等，后来分别担任过新中国的政府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

亲眼目睹过这些场面的人，谈起周恩来当时做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形，至今还记忆犹新。

（康岱莎康心如的女儿）

国民党元老，如于右任先生、邵力子先生等，同我父亲有深交，而且常年住在我家。1941年夏天，在周恩来同志的关怀、支持下，成立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一般通称为“小民革”，这个成立会就在我家召开的。所以这样呢，领事巷十号，是我的家了，就成了我们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个点儿。周恩来同志到我家，看望过于先生和邵先生，谈的大多是抗战问题，他的坚持抗战，战则存、和则亡，国共联合抗日的思想，深得两位老先生的赞赏。周恩来同志的工作、也间接影响了国民党其他的军政要员，解放战争中，起义的地方实力派，高桂滋和邓宝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周恩来同志也非常重视我的工作，在同我伯父和我父亲谈话时，曾深刻地指出，复兴中国，必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抗日，才有出路。他还通过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并且得出了一些具体的数字，利用开座谈会的机会，列举了国民党政府对民族经济的敲榨和勒索，这些数字和事实，充分说明了事实真相。这种有理有据的谈话，使得我父亲等人，对于周恩来同志十分钦佩，并且在同周恩来同志接触中，进一步认识了共产党。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周恩来在重庆住地和有关图片）

1945年8月，八年抗战胜利了。

毛泽东亲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解决中国的前途问题。

但是，和平却没有到来。蒋介石自恃人多枪多，一心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了和平解决争端，周恩来依然留在国统区谈判。

1946年5月采访周恩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的文章。周恩来接受采访时曾三次流泪的情景，让这位记者记了半个世纪。

（曾敏之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

谈到他离开他的母亲，离开了母亲，几十年没有再回过家乡，母亲也死掉了，生母死了，他后来继母也死了，他那个时候，他对母亲的亲恩设法报答了，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他眼光里出了泪花，有泪花。我第一次看他这样一个革命党人，一个革命的英雄人物，原来讲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呀，但是从周恩来来讲，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人，他想到了亲恩，所以就泛了泪花，我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谈到张学良的时候，他也泛了泪花。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张学良，在“西安事变”有交往。张学良这样一个在患难中间，经过同盟的人，这个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反对内战的人，遭到蒋介石的扣押，又丢掉性命，到现在这么多年还没有出来。谈到张学良，他感情很激动，他说到现在我觉得我对不起张学良将军。

第三次呢，就是说到王若飞、叶挺、秦邦宪离开重庆回延安，飞机失事。他接到这个噩耗，简直是痛苦啊、痛苦。谈到这些同志，为了谈判，经常来往延安跟重庆，他们都为了民族团结，国家前途，可是牺牲了，他非常痛心。他说，我们牺牲多大呀，但是我们现在看来呢，这个谈判形势还不乐观，随时会引发一场我们大家不愿意见到的内战，所以谈到这个他也有泪光。

（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一起谈判的电影镜头）

（南京梅园）

接受采访后的第二天，周恩来就飞往南京继续谈判。参加谈判的不光是国共双方，还有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在艰难的谈判中，马歇尔承认，周恩来是他从未遇到过的谈判对手。而周恩来显然也积累了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

（陈浩时任中共谈判代表团外事秘书）

经过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揭露和周恩来在重庆、南京的揭露，就使得全国人民呢，就逐渐感觉到，美国呀，真的不是来帮助中国建立和平的，而是来帮助国民克打内战的，这一次谈判中还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问题，就是不能够给美国、美方以最后决定权，我们原则上坚决不能同意这种出卖民族主权的办法，一切决定只有主权国家、只有人民才能够作出，不是外国所能强加的。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者，不能承认这种丧失国权的办法。不能让美方当中国人的太上皇。就这样，周恩来就坚决地把美方最后决定权的阴谋鬼计给打掉了。所以这个谈判虽然失败了，但是中国人民经过这一年的谈判，看清楚是国民党要打内战，共产党是维护人民的利益的。这一年虽然谈判本身是破裂了，但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认清了，国民党他是要打内战的，是反对人民的，认清了美帝国主义是要帮助蒋介石来打内战的。

（国统区人民群众民主运动的电影镜头）

在紧张谈判的同时，周恩来还负责领导着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民主斗争运动。

（宋平时任周恩来政治秘书）

通过我们对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推动，在我们的代表团撤退之后，国民党的地区爱国民主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解放战争战场是第一战场，（民主运动）成为新发展起来的第二战场，对最后摧毁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呀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周恩来撤离南京前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文章）

1946年11月16日，在南京的这所房子里，还是穿着那身黑呢中山装，周恩来彬彬有礼地举行了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还要回来的。说完，他去了延安。

（周恩来图片。周恩来在陕北转战）

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开始了。

十年的谈判生涯给周恩来留下许多感慨。正像他对一位记者说的那样：“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西柏坡外景）

（周恩来在西柏坡的图片和电影镜头）

（解放战争的电影镜头）

正是这最后一段路程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从陕北转战到河北的西柏坡，周恩来一直以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毛泽东指挥了全国各个战场的解放战争和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

在这期间，周恩来还利用他过去和国民党人打交道的关系，争取了一大批国民党军队起义。在解放战争中，我们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大军，其中有一百八十万是起义的。

（周恩来在西柏坡的办公图片。地图。办公室。外景。朱德图片）

西柏坡，成了中国共产党人进城前的最后一个指挥所。隆隆的炮声还没有停歇下来，但夺取天下却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准备迎接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议论着一个重要话题：由谁来当新中国政府的总理呢？

（薄一波时任中央华北局书记）

我们在西柏坡向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同志汇报工作的时候，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现在要进城了，赶决研究经济工作，列入议事日程，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朱德同志马上就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就要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样一个家，他会把事情办好。”当然，这个地方的家，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他能把这个家管好。

（西柏坡外景）

（米高扬在西北坡的图片合影）

这时，斯大林派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在西柏坡同中共领导人会谈时，也曾说到新中国政府的人选。

（师哲时任中央政治秘书室主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米高扬他一开始就说，你们中国外交部长，现成的是周恩来，外交部长外国一般都是总理兼。他是从以后跟我们打交道，同谁打交道，从外交角度来考虑。考虑了同我们以后打交道的对手就是周恩来，他也是公开给我讲了，他们愿意同周恩来打交道。

（毛泽东等领导人进入会场）

（七届二中全会镜头。毛泽东讲话）

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这是进城前的最后一次重要会议。关于新中国总理人选。毛泽东在会上一锤定音。他说：“新中国

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的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需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周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解放军入城）

（毛泽东周恩来检阅部队）

（周恩来任政府总理的资料）

（开国大典。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天安门上）

（国旗）

不久，在西柏坡住了一年的中共中央机关进入了北平城。

中国共产党人似乎并没有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毛泽东谨慎地说这是进京“赶考”，还发出了“决不当李自成”的誓言。

这时候，周恩来也进入了总理的角色。他对赶来迎接的北平市代市长叶剑英说：“我们没有管过大城市，但我看蒋介石管理大城市的那一套办法不行。我们管理大城市，一定比他管理得好！”

这是个开天辟地的时刻。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郑重宣布：周恩来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

（周恩来近景特写。定格）

被宣布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总理的周恩来，时年五十一岁。

## 第二集 开国之初

（中南海红墙外街道，推入墙内的西花厅。）

（西花厅详细镜头和海棠花一组）

中南海西北角有一所叫西花厅的院子。新中国成立后，这所院子成了开国总理的住所和办公的地方。据说，周恩来选择西花厅有两个原因：一是院子里有个不染亭，可以时常提醒人们洁身自好；再就是这里的海棠树吸引了他。每年春天，海棠花开的时候，抽空在这里散步，是周恩来夫妇最轻松快意的时候。

（中南海西花厅旧景）

清朝末年，这所院子曾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王府西花园的一部分。四十年代末，它已失去往日的气派，显得十分破旧了。

西花厅分为前后两个院子。前院是周恩来举行会议和会见客人的地方；后院是他的办公室和卧室，还有工作人员的办公室。

1949年秋天，周恩来搬进这所院子，在这里操劳国事，日理万机。他是中南海里睡得最晚的领导人之一，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以上，有时甚至通宵不眠。在二十六年的总理生涯中，周恩来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渡过的。

（周恩来1950年第一周的工作台历）

（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

周恩来往进西花厅以后，一直保持着把日程安排写在台历上的习惯。这是1950年新年的第一个星期周恩来亲笔记下的重要活动。平时，还有许多临时安排的活动没有能够写上去。从台历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他“日理万机”的分量。工作人员将桌上的台历翻到1976年1月8日，表示这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开国总理。一直工作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

1997年春天，我们邀请周恩来当年的几位秘书来到这个他们十分熟悉的地方。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这里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秘书们说，周恩来有五个办公室。

（顾明原周恩来的经济秘书）

第一办公室在卫生间里头，女同志不能进去，我们都能够进去，有紧急事情我们就进去请示，回答后就办了。

（周家鼎原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第二办公室就是餐桌。第三办公室就是这里的正规办公室了。第四办公室就是汽车上了。第五办公室就是在散步呀什么的场所了。

（1949年航拍的中南海镜头）

（新政协筹备会议镜头）

有三千年历史的古都北平，历经战乱之后，终于掀开崭新的一页。

1949年春天，周恩来一进北平，便受中共中央委托，把主要精力放在主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上面。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由各个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人士联合组成，当时叫新政协，由于开国初期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因此当时也是法定的最高权力机构。

（毛泽东、周恩来亲赴前门火车站迎接宋庆龄到京）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参加新政协的重要人物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大批民主人士纷纷来到北平。

毛泽东和周恩来还给居住上海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写信，邀她北上共商建国大计，又派邓颖超专程南下相陪进京。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一行到达北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赴火车站迎接。

（周恩来在新政协会议上做《共同纲领》报告。代表们发言）

宋庆龄到来不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一次会议便正式开始了。

在会议召开前夕，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亲自执笔起草了这部《共同纲领》。事实上，它也是一部开国宪法。刘少奇曾经评价说：“它是总结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革命斗争经验而制订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共同纲领》等三个建国的根本大法，并选举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代表们讨论通过各项决议镜头）

（周恩来1949年9月27日在新政协上的同期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在北平，并改名北平为北京。赞成的请举手，请放下；不赞成的请举手；怀疑弃权的请举手。好了，我们现在一致通过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在北平，并从现在起我们就把北平改名为北京。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赞成的请举手，请放下；不赞成的请举手；怀疑弃权的请举手。好了，我们全体会议一致决定采用公元，今年为一九四九年。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赞成的请举手，请放下；不赞成的请举手；怀疑弃权的请举手。啊，有一位弃权，我们现在以绝大多数通过《义勇军进行曲》为我们现在的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请注意，赞成通过这样的国旗的重大的决议的文字的请举手，请放下；不赞成的请举手；怀疑弃权的请举手。好，弃权的两位，绝大多数通过五星红旗为我国国旗。

（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一次会议主席台上）

中国人民的新纪元开始了。

（天安门。周恩来在会议上写字。北京街景）

（报上登载的第一届政府部分组成人员图片）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一次会议，周恩来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当时，最迫切和最现实的工作，要算是政府的“组阁”。

开始的时候，许多人向周恩来建议，应该让邓颖超在政府里担任一个部长职位。他回答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邓颖超就不能在政府里任职。

但是，为了妥善安排民主人士在政府任职，周恩来却两次登门拜访不愿做官的黄炎培，煞费苦心，动员他出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

政务院四个副总理中有民主人士黄炎培和郭沫若；政务院二十一位委员中，有九位是民主人士；一百零五个部长和副部长职位中，民主人士占了四十九个。

（薄一波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所以，民主人士称赞，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这里讲的“周”是周到的“周”。

（周恩来在开国大典上的严肃表情）

（新中国面临的破败景象，水灾、旱灾等等）

对于开国总理来说，最严峻的挑战，在于能不能及时有效地组织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

人民政府接手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破烂摊子。长期的战乱，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1950年淮河洪水泛滥，吞噬着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各地的灾情报告送到了中南海。在周恩来直接过问下，救灾款送到了灾民的手中。工厂停工了；田园荒废了；交通瘫痪了；几百万的乞丐拥进了各个城市。

（解放军骑兵进入上海）

（旧上海外景镜头）

全国的财经形势极为严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成为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最急迫任务。在筹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时，周恩来就想到了一位能够主持全国经济工作的杰出人才。

（周太和原陈云的秘书）

周总理就推荐一位能够领导全国财经的一个人才，来组织全国财经工作。1949年2月，陈云同志奉命由沈阳经过北平到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周总理立即口头通知陈云、经毛主席同意，调陈云同志主持中央财经工作。

周总理在49年4月30号和5月7号，两次电催陈云同志赴北平接受新的工作，陈云同志于5月中旬到的北平，住在怀仁堂与周总理朝夕相处，商议财经大事。

（1949年的上海）

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不久，一些资本家和投机商公开宣称：共产党搞军事是一百分，搞政治可得八十分，搞经济只能打零分。他们屯积居奇，导致全国性的银元风潮和物价风波。

周恩来安排陈云到了上海。通过调查，陈云抓住大米、纱布和煤炭三个稳定物价的命根子，从各地抢运大量物质，和投机商进行了四次较量，终于稳定了物价，提高了人民币的信誉。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工地）

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中国立刻进入了百废待兴的恢复时期。

打了几十年仗，政府总理应该专注于搞经济工作了。1950年6月24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会议，刚刚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一百五十万人，准备把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国家建设。

（字幕：巨型人民英雄纪念碑石碑运抵天安门工地）

（美军在仁川登陆。美军轰炸我国边境）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开会）

（志愿军过江）

然而，和平并没有立刻到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不久，美国军队在朝鲜仁川登陆，并越过三八线，轰炸我国边境。

为了保家卫国，毛泽东决定出兵授朝，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志愿军兵分三路，跨过鸭绿江，赴朝作战。

作为中央军委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身上又增加了一副协助毛泽东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重担。

（郭英会时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部队的运输，入朝部队的调动，调动哪一个部队去。当然是中央、毛主

席、周总理和他们一起商量决定的。定下来哪一个部队去，沿途交通怎么去，组织铁路的运输，这都是总理做的。回来伤病员的安置，往前走的部队的运输，这些组织工作，也是总理具体组织安排的。大的战略决策和大的战役组织，这些事情呢，他协同毛主席做决策，但是这些决策定了以后，一些大的战役要打，决定以后，整个的后方保证，可以说前方是彭老总总指挥啦，后方整个的保证啊，可以说就是周总理在具体组织、具体落实、具体贯彻。

抗美援朝开始以后，可以说前方是彭老总总指挥啦，后方的整个保障，可以说就是周总理。

（西花厅军事地图）

（抗美援朝的运输线）

（朝鲜战争镜头）

人们都说，毛泽东是抗美援朝战争的主帅，周恩来是副帅，是后方的总后勤部长。

这条通往朝鲜的炸不垮、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被前线的志愿军战士们称作生命线。

抗美援朝期间，在西花厅办公室的墙壁上，始终挂着一幅中朝边境的军事地图。每天上半夜，他总是在总参谋部处理作战和后勤问题。当时许多发往前线的作战电报，都是周恩来亲笔起草的，他对志愿军每个团所处位置几乎了解得一清二楚。

尽管战争仍在进行，但是，周恩来始终把经济工作摆在首要地位，一直牵挂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根据他的建议，中央明确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

短短的三年时间，新中国就奇迹般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开国之初，全国人均只有六两钢铁、一点六斤棉花，可是到了1952年已经分别翻了三番和近两吞。这使人们惊讶不已！兴奋不已！

（周恩来在1954年一届人大会议上的讲话图像和同期声）

在1949年至1952年间，中央人民政府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全国大陆的统一，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着重地发展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和各种类型的合作社经济，初步地调整了公私营工商业之间的关系。这一切，都为有计划进行经济建设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西花厅夜景）

从1951年7月开始，周恩来又成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人和指导者。

（郭英会时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谈判有的时候也很紧张，差不多都有电报来往，有的时候是电话，紧急一点还是电话。但是，当时的电话确实是质量太差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质量太差了。所以，说总理讲打电话真把嗓子喊哑了。

总理那个时候确实忙得不得了。他大概一般都是两三点钟起来，午后两三点钟起床，一直到第二天最早也是五六点，甚至晚的时候，是七八点才休息。那时候我们都说总理是两头见太阳，起来时候太阳偏西了，睡觉的时候，太阳已老高了。除了文革那一段，其他的时间呢，大概总理在抗美援朝那一段，那两三年大概是最忙的。

（周恩来办公室电话机。办公室夜景）

（周恩来办公桌。桌上文具。抽屉按钮）



（客厅。饭桌）

由于工作过于繁杂，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最多的时候曾经有二十多人。他们各自分管一摊事情，在这间办公室里进进出出。在周恩来办公桌抽屉里还安装了一排电钮，为的是随时通知各方面的值班秘书来汇报工作。

（周恩来的秘书对话）

周家鼎：他一回来，我们这些人就像在自由市场一样，全都涌上来了。实行“车轮战”。

顾明：谁都觉得自己的事情最紧急的，谁都想抢到头排。结果总理看了（文件）呢，说你这个等一会儿。

周家鼎：韦明长期搞新华社那一摊，在文件上拟一个标题，非常耸人听闻。总理一看，哦，这是怎么回事儿？他就马上到前面去了，这一下，那一下，几下他就办完了。

顾明：总理本来在事先都说好，你们谁的文件最紧急，可排在前面，编上号。大家为了抢时间，谁都是最紧急的，一会放在前面，一会又被别人放在后面，都是互相争时间。

周家鼎：老齐就一直坐在总理对面的凳子上，他也不吭气。有时他还感冒了，一会儿一个喷嚏。总理说。你回去休息吧。可他的文件完不成，他怎么能回去休息呢？最后就一直陪着总理那么坐着。总理看他实在太那个什么了，就说，好，你有什么事，讲吧。那时候，总理实在太忙了。

顾明：他每次出差的时候，头一天都要清理他办公桌上的一摞一摞的文件。有几次我要跟他一块儿出差，看到他一直到早晨四点、五点钟才清理完。

（西花厅办公室、文件）

三年经济恢复时期，他起草和签发的经济工作的文件，保存下来的就有两千多份。这还不包括出席很多的经济工作会议时的讲话。在这期间，周恩来已经开始规划第一个五年计划。

（大连海滨。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大连休养的两张图片）

由于劳累过度，周恩来病倒了。毛泽东让邓颖超陪他到大连海滨休养了一个多月。这是周恩来建国后第一次外出休假。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建设）

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设，这时候也全面铺开了。

（周恩来起草或主持起草的《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

（周恩来 1952 年出访苏联。莫斯科机场欢迎仪式）

1952 年 8 月 15 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周恩来此行的目的，是就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和实施问题，征求苏联政府意见。同时，还要同苏联政府商谈援助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项目。

（周恩来在机场的讲话同期声和画面）

亲爱的同志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诸同志，奉毛泽东主席之命，来到莫斯科，我们感到非常荣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这次来到莫斯科，是为了继续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并商谈有关问题。

（莫斯科周恩来住过的别墅外景。苏维埃大旅社）

（克里姆林宫）

（柴树藩当时图片。旅社内景。餐厅、酒杯）

在紧张的谈判过程中，代表团里一位叫柴树藩的年轻人准备了一份关于

国家林业方面情况的表格。周恩来发现，其中有几个数字对不上，便立即打电话给他，严肃地批评说：年轻人对待工作应该尽职尽责，一点都不能疏忽。柴树藩立即找来一些人对这些数字进行核对。并由此深感内疚，背上了思想包袱。第二天，周恩来到代表团住地吃饭的时候，特意举起一杯白兰地找柴树藩碰杯，表示安慰。

（柴小玲柴树藩之女）

我父亲每每提到这个事情，他都讲，总理对干部严格要求，同时又非常爱护干部，使得他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这个事情，而且在今后几十年的工作过程当中，就是完全认认真真地，就是对自己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尽职尽责。

本来呢，我父亲知道你们这个关于总理的文献片正在编排，他非常想亲自来讲述他的这段经历，来纪念总理。很可惜呢，他得了癌症，身体越来越不好，在他临终之前没有实现他的愿望，他感到非常遗憾。所以，我今天是代表我父亲把这段经历讲述出来，来纪念总理，缅怀总理。

（柴树藩照片）

后来，柴树藩曾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六机部部长。

（莫斯科外景。周恩来签字）

在莫斯科，周恩来就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各项内容和斯大林等人进行了反复商谈，从而争取到苏联政府对中国实施这个计划所需要的技术、设备、资金和专家方面的援助。

（周恩来回到北京。邓小平等人在机场迎接）

（周恩来工作台上关于和邓小平谈工作的内容。周恩来与邓小平的合影）

（邓小平、陈云图片）

1952年9月24日，周恩来一行启程回国。他指定国家计委副主席李富春留下就援助的细节问题继续商谈。

两个月前，还是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也出现在北京机场的欢迎人群中。

周恩来去莫斯科前几天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建议把邓小平调来担任政务院副总理。8月13日临行前，他专门找邓小平谈了工作，接着又在政务会议上宣布：“在我奉毛泽东主席之命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职务。”

从此，由周恩来调来的陈云和邓小平，一直是他主持政府工作的得力助手。

（斯大林葬礼镜头）

1953年3月8日，周恩来赴莫斯科出席斯大林葬礼。

（袁宝华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

3月8号，总理专门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工作的空隙，专门听了李富春同志介绍和苏联进行谈判的情况和苏联的意见。他听了汇报以后，做了很详细的指示，而且把这些意见都带回到北京来，把它整理成文字，发给有关的领导同志，来征求意见。到了3月30号，开始正式谈判。苏联方面是米高扬主谈，中国方面是李富春同志主谈。

（西花厅夜景）

在周恩来领导下，谈判工作进展得顺利。

（袁宝华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秘书长）

4月上旬，就派了宋劭文、钱志道同志回到北京进行汇报。一回来，总理就找宋劭文谈话。那天，据宋劭文同志讲，总理忙得不得了，已经到夜里十二点钟了，还在那里批文件。宋劭文一直等十二点钟以后，才跟总理汇报。总理听了这些汇报，详细地记。总理有个习惯，他自己作记录。据宋劭文同志讲，对谈判他很有兴趣，详细地听。

另外，对苏联经济专家给我们上课的情况，他也很有兴趣，详细地听，特别是对里边的一段话，他很有兴趣，他让宋劭文给他讲了两遍，他自己亲自记下来。第一条是总产值增长的幅度要大于职工人数增长的幅度，这样才能保证你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二条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比你的工资增长幅度的提高还要大才行；第三条就是技术人员人数增长的幅度要大于工人人数增长的幅度，这样才保证你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总理对这一段话非常有兴趣，他亲自记下来。宋劭文讲了一遍，总理就说你再讲一遍。

（西花厅夜景）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对于新中国来说，是个全新的课题。为了适应新情况的需要，周恩来催促身边工作人员同他一起学习新的知识。

（顾明时任周恩来的经济秘书）

他每天跟我们办公室同志一起学计划，叫我们把苏联三个五年计划的书都看一遍。一个礼拜讨论两次，总理亲自参加。实在忙不过来，他一个礼拜保证到一次，听听我们的意见。我们当时在总理身边，最大的好处，是你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说什么，随便发言，他不抓小辫子。后来，就谈到斯大林的一个说法，叫计划就是法律。总理非常不同意。他反对说：计划怎么就是法律呢？计划根据不同情况，要做必要的调整嘛！

（西花厅办公室）

周恩来亲自指导编制“一五”计划，几乎每一个数字他都要过问，几乎每一个百分比他都要计算，当他发现数字有出入时，就耐心地指出，让有关人员再好好地算一算。

（周恩来和米高扬签字仪式。毛泽东、赫鲁晓夫出席）

这样的谈判经历了八个多月以后，在北京由周恩来和米高扬签字。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也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一五计划”建设的骨干，便是苏联援助的一百五十六个大型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有现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煤矿企业、石油企业、重型机械制造厂、汽车制造厂、飞机制造厂和化学药品制造工厂。通过这次谈判，培养和造就了一批高素质的经济管理人才。

（电影资料：鞍钢建设、一汽奠基、包钢建设）

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完成了。渴望早日告别贫困落后的中国人民，终于勾画出了中国有史以来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第一幅宏伟蓝图。一时间，鞍山钢铁厂、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包头钢铁厂、哈尔滨飞机制造厂等一大批骨干项目纷纷上马和改建。中国人民从未有过的创造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

在这些繁忙的工地上，也时常能看到苏联专家的身影。

（今天的阿尔希波夫在家里的镜头）

年过90的阿尔希波夫，曾担任五十年代中国经济工作总顾问，和周恩来有很多的交往。

（阿尔希波夫时任苏联驻华经济工作总顾问）

我们到中国时，对中国一无所知，因为我们不是汉学家，而是自己国家

各个领域的专家。周恩来同志那时领导专家工作组的工作，周总理和我们交往非常密切，他非常仔细，也非常尊重专家们的工作经验和知识。这些丰富的经验和知识由专家们传给中国工人。各个领域，诸如经济、文化等。

周恩来同志非常关怀和理解在中国的苏联专家的生活，我经常和周总理见面，做为专家组的总负责人和中国国务院的总顾问，（通过这些）我了解了周恩来同志，也了解中国过去的历史和当时的国情。

（一届人大开幕。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开幕了。周恩来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讲语同期画面和声音）

从1953年起，我国就开始了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济建设工作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已经居于首要的地位。

（一届人大会议资料原声解说）

大会根据毛主席提名，通过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三个月后，在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逝世。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镜头）

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开幕了。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了《关于“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

（周恩来讲语的同期画面和声音）

同志们：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再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就要胜利完成了。为了使我们能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立即顺利地开展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及早着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现在，党中央委员会把关于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提请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审查。

党中央委员会提出，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应该是：一、继续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建设，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巩固和扩大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三、在发展基本建设和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工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发展运输业和商业。四、努力培养建设人才，加强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五、在工业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强国防力量，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同志们：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在今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党同志应该在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加倍努力，同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一起，同全国各民族、各党派、一切爱国人士一起，为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积极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只要我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主观主义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我们就能够动员一切力量，克服各种困难，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中，胜利前进！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建设工地）

这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修建工程，也接近尾声。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过程，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

初步形成了如何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经济发展十分顺利，到1956年初，有的部门提出了“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周恩来立即予以制止。他多次强调：不要乱加快发展速度，否则很危险。领导者如果头脑发热了，要用冷水洗一洗，这样会清醒些。

（1956年1月周恩来在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同期画面和声音）

我们应该努力去做。凡是客观上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事，不这样做就要犯右倾保守错误。我们也应该注意避免超越现实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不勉强去做那些客观上做不到的事情，否则就要犯盲目冒进的错误。

（鞍钢七号高炉、无缝钢管和大型轧钢厂三大改造工程完成）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第一辆汽车）

这些已经完成或正在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重点工程，为新中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3月，我国的第一座自动化高炉在鞍钢出铁；1953年10月，鞍钢第一根无缝钢管也生产出来了；工人们还把新产品送给了毛泽东；解放前，中国连一辆自行车都造不出来，1956年7月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出了第一批解放牌卡车。

中国人民寄予厚望的“一五”建设计划，到1956年就提前亮成了。

（周恩来参加包钢一号高炉投产剪彩镜头）

（字幕：周恩来参加包头钢铁厂一号高炉投产剪彩仪式）

（周恩来同期声）

“一五”计划建设成果累累，周恩来怀着欣慰心情来到包钢参加剪彩仪式。

同志们，我这次是来庆祝包钢一号高炉提前生产的，同时，也是解放后第一次来内蒙古自治区。这样一个北方过去荒漠的地方，我们开始建设，提前使一号高炉投入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所要求的打一个工业化基础，在包头，可以说已经打下了工业化的基础。

（袁宝华时任重工业部计划司司长）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周总理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给我们的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够忘记的。

周恩来也没有忘记那些为“一五”计划作出贡献的外国专家。

（阿尔希波夫时任苏联驻华经济工作总顾问）

当苏联大使告诉周恩来同志，阿尔希波夫要回国了，周恩来同志就接见了，高度和热情赞扬了苏联专家在中国忘我工作的精神。临别时，周恩来同志授予我奖状。当然，奖状的内容使我非常激动，可以说，我是带着眼泪离开了中国。过了不久，我又回到中国，又执行我的专家组负责人和国务院总顾问的工作。1957年秋天，我又调回苏联工作，当周恩来同志授予我这个奖章时，参加的有陈云、薄一波、李富春、邓小平，还有好多我的经过考验的亲密的朋友，离别的时候，周恩来同志这样具有坚强意志的人，都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在朝鲜为志愿军烈士扫墓）

送别阿尔希波夫回到苏联不久，1958年2月，周恩来启程去了朝鲜。

朝鲜和谈签字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分批撤回国内，但在朝鲜的桧仓郡留下了这样一座烈士陵园。在大雪纷飞的时节，周恩来向牺牲在朝鲜战场上的成千上万保家卫国的烈士们，表达自己的敬意和哀思。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揭幕仪式。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出席）

这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胜利落成。

在隆重的揭幕典礼仪式上，当周恩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凝望远处这座拔地而起的宏伟建筑时，心里或许装满无限感慨。历史和现实，仿佛在这一刻重合在了一起。先烈们的奋斗历程，被凝聚在这些栩栩如生的浮雕上面；先烈们追求的理想，则凝聚在开国八年来周恩来为之奋斗的宏伟事业的进程中。

（西花厅外景。海棠花盛开。西花厅俯拍）

每年春天，西花厅的海棠花依旧像往年那样招人喜爱。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秋后海棠成熟的时候，人们把它摘下来吃，酸甜可口，如果把它做成果酱，味道就更美了。

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回忆周恩来对海棠花的钟爱：“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白天就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就散步站在海棠树前，总是抬头看了又看。你抬头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

### 第三集 世界舞台

（周恩来欢迎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罗申抵达北京）

1949年10月10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罗申来到北京。周恩来亲自赶赴前门火车站欢迎。这是他第一次以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出席外国使节来北京就任的活动。

这个时候，新中国自己的外交部却还在酝酿组建之中。

（字幕：北京外交部大街33号）

在选择外交部地址的时候，周恩来注意到了这条记载着历史沧桑的街道。这里过去是晚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所在地，也曾是民国时期外交部的旧址。历史上曾在这里谈判和签署了一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1949年11月8日，新中国外支部在这里召开成立大会。

（刘庚寅时任外交部国际司干部）

总理就开始讲话，那次讲话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当时作了记录。这是总理建国以后，第一次发表重要的外交政策讲话。我记得他首先就讲，外交工作的任务是什么？要明确这一点。他说外交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对苏联和人民民主的国家，在战略上要讲团结，要讲合作，但是在战术上，在具体问题上，有时也要有些批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帝国主义国家，在战略上要反对，要斗争，但是在战术上，有些具体问题呢又可以联合。

后来总理又讲到：过去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外交史是屈辱的外交史，不管是清朝的西太后也好，北洋政府的袁世凯也好，还有蒋介石也好，都是跪倒在地上办外交的，所以叫屈膝外交。总理讲我们绝对不能学这个，我们要有独立性。

（进军大西南的电影镜头和有关报刊）

从此，中国的外交站到了新的起点。当时，协助周恩来开展外交工作的几位副部长是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

但是，除兼任中国驻苏联大使的王稼祥已去莫斯科赴任以外，其余驻外大使还都是空缺。打了几十年仗，钻了几十年山沟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现成的外交人才。

这时候，中国的商方还处于激战之中。为组建外交部正四处寻找人才的周恩来，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带兵打仗的将领身上。于是，中央向各野战军发出了一些人员调动的命令。

（进军大西南的电影镜头）

（《王幼平回忆录》手迹）

（王幼平图片）

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兵团政治部代主任的王幼平将军在回忆录里写道：一九四九年十月下旬的一天，兵团指挥机关从湖南邵阳率部西进，准备攻克贵阳。恰在此时收到了“着调王幼平星夜来京”的电报；我当即辞别了杨勇、苏振华等同志，部队西进我东返。到了长沙，我去见刘、邓首长，问调我干啥？邓政委说调我搞外交。我说干不了，请求收回成命。我又问，我要求回十八军参加入藏的报告，您是否看到？邓说看到了，晚啦！我无奈告别了首长赶赴北京。

（中南海有关镜头）

（第一批将军大使姬鹏飞，耿飏、袁仲贤、黄镇、王幼平、韩念龙的图

片资料，配上字幕）

他们都是和王幼平差不多同时从前线召回北京的兵团级将领。在周恩来安排下汇集在一起的新中国第一批派驻国外的十五位大使中，竟有十一位将军，而其中有六位后来都担任过外交部的副部长，成长为杰出的外交家。

然而，当他们奉召前来报到的时候，许多人却从来没有穿过西装，不会吃西餐，也不懂外语，更说不上熟悉外交礼节了。

（中南海里带木走廊、木窗格的老房子）

于是，周恩来就特意安排了几次现场观摩。一次，波兰驻华大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周恩来事先让他手下的将军大使们藏在按见大厅后面的小屋子里，用铅笔在窗户纸上捅了十几个小洞，从里往外偷偷观看。周恩来对他们说，这叫“窗下学礼”。让大使们难以忘怀的，还有一次“幕后学礼”。那时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时候——

（罗马尼亚大使向毛泽东递交国书的电影资料）

（资料片同期声）

罗马尼亚驻华大使向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呈递国书，在场的有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秘书长林伯渠。

（姚仲明时任中国驻缅甸大使）

毛主席接过国书以后，与大使寒暄，谈了一阵话。大使走了，总理就过来把我们这个帘子幕布拉开，他说：主席，咱们出国的大使等着见主席。主席就过来了，一看，他说我都认识，主席都能叫上名字来。他开始讲：你看，他们过去打仗，现在又办外交，这是时代的要求，你们老同志，你们出去中央放心，所以中央让你们出去，老干部经过了革命的考验，他靠得住。那时候流行着一句话，我们这些人，有一条好处，跑不了，连周总理都哈哈大笑。

（中南海怀仁堂）

（攻占南京前后的电影镜头，美国在南京的驻华使馆）

大使们就要走出国门了，那时，他们去的主要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开国初期，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世界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鲜明地倒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边。

美国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并没有完全放弃对新生共和国的试探和拉拢，当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时候，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便呆在那里没有走，还多次通过中间人传话，暗示愿意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说是可以提供四十亿美元的援助。当然，那是有条件的。

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中国人已经从亲身的经验中懂得了美国的所谓‘援助’是什么东西，就是民族自由和权利的丧失。美国政府为了取得中国，曾经支持蒋介石进行了大规模的内战，使中国人民得不到独立地和平地生存的机会和权利。”

（王稼祥递交国书）

（毛泽东到达莫斯科火车站）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49年12月，利用斯大林七十岁生日的机会，毛泽东来到了苏联。表面上是祝寿，实际上是准备签署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毛泽东对斯大林说，关于这个条约，我们让周恩来到这里来和你们谈吧，这方面他更在行，是谈判解决各种棘手问题的能手。



于是，周恩来乘坐专列跨越东北的茫茫雪原，踏上了访苏的旅程。这是他第一次以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出访外国。

（马列时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

总理到莫斯科去，路上要走十天，路很长，他就带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就是苏联出版的叫做《旅顺口》。在火车上，过几天他就看完了。看完他就对我说，这本书啊你看过没有？我说我知道这本书，我还没看过，这是一个曾经得过斯大林奖金的一本书。总理说这本书坏透了，这本书主要的思想就是宣扬沙俄的大国沙文主义，为侵略战争辩护。

五十年代时，苏联大使尤金，有一次总理接见他，他说苏联政府打算在苏联军队撤出旅大地区之前，能够在旅大地区修建五个纪念物，其中两个是纪念战胜日本法西斯和为苏军的死难烈士修建的纪念碑，另外三个呢是纪念日俄战争的。总理一听就跟他说：你纪念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苏军死难烈士搞纪念物，这是完全应该的，是可以的。至于另外要搞三个纪念日俄战争，那可是不能同意的，你们怎么都忘了列宁怎么说的，1904年的那个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领土上打的一场非正义的战争，没有什么值得可纪念的呢，他说你们回去跟你们政府说，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同意，没有商量的余地。这样就给苏联政府的要求给顶回去了。

（莫斯科火车站大钟五点正）

（莫斯科外景）

（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出席《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字仪式）

（游行队伍高举毛泽东和斯大林握手的画像）

1950年1月20日下午五点，在十天十夜的颠簸之后，周恩来到达了莫斯科。接下来便是和苏联方面的米高扬等人进行紧张的谈判，一个条文一个条文地细细斟酌，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字的时候，毛泽东和斯大林也出席了。

这个条约替代了1945年国民党政府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从此，中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紧密团结，共同应付风云变幻的国际紧张局势。

（朝鲜战争电影镜头。彭德怀等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人民日报》载周恩来赴日内瓦谈判的消息）

（周恩来离开北京前往日内瓦）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两个多月后，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越过三八线后，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中朝两国军队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联合国十六国军队打了整整三年，终于迫使他们坐下来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

1954年4月，为了解决停战后的朝鲜统一问题。为了和平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日内瓦出席国际谈判。

（周恩来在日内瓦机场）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正式亮相，引起了舆论界的极大兴趣。记者说：这是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为年轻的红色外交家。不久，他们便得到了一份关于周恩来传奇生涯的简历，上面称周恩来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之一”。这个简历是没有经过周恩来而直接报中共中央批准的，对外宣称中国某位领导人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这还是第一次。

（电影资料镜头：美国的史密斯、苏联的莫洛托夫、英国的艾登、法国

的皮杜尔等到达机场)

相继到达日内瓦的有那时候世界上风云一时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其中有：

美国的国务卿杜勒斯；  
苏联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  
英国的外交大臣艾登；  
法国的外交部部长皮杜尔。

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参加国际会议，使一直不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在事实上不得不认可中国的国际地位。

(日内瓦国联大厦外景。日内瓦会议会场空景)(五国首席代表步入会场和开会时的电影资料)被称为“红色外交家”的周恩来步入会场的时候，心里并不轻松。

在朝鲜和平统一问题上，周恩来同苏联的莫洛托夫和朝鲜的南日外相协调立场，提出所有外国武装力量都要撤出朝鲜，然后举行朝鲜国民议会的全朝鲜自由选举。而美国和韩国代表则提出按韩国宪法举行全朝鲜的选举，甚至主张美国军队留在朝鲜。马拉松式的磋商陷入了僵局。参加联合国军人侵朝鲜的西方十六国代表在美国的操纵下，宣称这次会议不会达成有用的结果，会谈眼看就要不欢而散。

(浦寿昌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那次会议上可以说主要由总理出面在美国做斗争。总理首先做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指出美国不仅是要阻挠朝鲜的和平统一，而且还要阻挠维护巩固朝鲜已经取得的和平，尽管如此，与会国家还是有义务要继续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做出努力。因此周总理临时提出一个两句话的决议草案，这两句话非常简单。第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要求与会国家表示一个意思，一个意愿而已，什么意愿呢？是要求与会国家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继续努力。第二句话是恢复谈判的日期和地点，将另外商定。就这么两句话的一个协议草案，可是你不要看轻这两句话。第一，表明了中国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立场，即使(美国)这样(阻挠)，我们还是要尽力争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第二，这个最起码、最具有和解性的协议草案就将对方所谓的十六国当中的大多数国家给争取过来了。

所以总理这一协议草案一提出来以后，他们十六国推出一个国家作为发言人，这就是比利时当时的外长斯巴克，他当时站起来表示同意周恩来的建议。他是代表那一方的。接着莫洛托夫站起来表示同意中国的建议，他是代表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两个表示同意就说明参加会议的双方都同意了周总理的建议草案。会场上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那一天担任会议主席的是英国的艾登，他看到这种情况，就讲：中国外长周恩来提出来的这个建议草案值得认真考虑，如果大家没有不同意见，那么我就认为会议同意这个建议。看到总理两句话的一个建议。造成这样一个局面，这时候美国代表非常为难，他要是说话了，算默认了，就让艾登说这会议达成这么一个协议，这样一来就明确地违反了国务院给他下的指示，国务院给他指示不能达成任何的协议。如果站出来反对，只此一家，孤家寡人一个，非常被动。可他在两个之间非选择一个，时间非常紧迫，无法再拖延时间了，他最后选的是站起来反对，理由是没有时间请示国内。因此，总理用他高超的外交艺术，使得美国虽然使会议无法达成协议，可使美国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

（艾登拜访周恩来电影镜头）

（英国外交部大楼。艾登当年从日内瓦写给外交部的信件）

这期间，由莫洛托夫牵线，周恩来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进行了两次私下会晤。艾登把会晤情况写成绝密信件送到了伦敦。里面说：周恩来向我申明中国的立场，我认为解决朝鲜问题没有中国参加是不合适的。大家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包括美国，而美国是唯一不愿撤走军队的国家。我对美国不接受周恩来提出的方案感到非常吃惊。

（莱蒙湖畔卓别林别墅）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片断）

（周恩来和卓别林会谈电影镜头）

在和西方代表团唇枪舌战的时候，《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充满人情味的中国戏剧片成了日内瓦会场外的热门话题。为了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感情，周恩来把片名翻译为《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随后又送给了住在莱蒙湖畔的电影艺术大师卓别林。云集日内瓦的外交官们感慨地说：周恩来不仅用艺术促进了外交，同时也把外交变成了一门艺术。

（越南奠边府战役电影镜头）

（范文同抵达日内瓦）

（伯尔尼城市外景）

日内瓦会议的第二个议程是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与会国家除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外，还有越南以及被法国占领的南越、老挝、柬埔寨三国四方。1954年5月7日，会谈开始的前一天，从越南战场上传来了歼灭一万六千多名法国侵略军的奠边府大捷的消息。同时，法国国内出现了主战和主和的两派政治力量，英国和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和平问题上也态度不一。于是，在整个会谈中，唱主角的仍然是周恩来。

（浦寿昌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他（总理）利用了英国、法国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利用了法国国内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的矛盾，争取了英、法这两个有一定的和平愿望，可是态度非常摇摆的国家，争取了表现了中立倾向的老挝和柬埔寨王国政府，集中打击破坏会议的美国。

他（总理）不仅在休会期间到柳州去和胡志明主席见面，休会快结束之前回到日内瓦，还和越南代表团团长范文同彻夜会谈。主要就说明，在一定的力量对比情况下，做出实事求是的妥协是必要的，是有利于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在周总理做了大量的工作之后，会议终于在7月21号达成协议。

（西花厅。盛开的海棠花）

（保留至今的海棠和红叶。周恩来托人从日内瓦带回来的芍药花）

（邓颖超卧室里悬挂的互赠的花的标本）

中南海西花厅里的海棠花露出了它的姣妍。让邓颖超遗憾的是，万里之遥的周恩来没能看到这番景象。

邓颖超把海棠花和红叶压成标本，还在上面写了两行字：“枫叶一片，寄上想念”。

日内瓦谈判桌上的周恩来，同样思念着国内的邓颖超。他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在驻地采摘了一朵芍药和一朵玫瑰，托信使带给了邓颖超。

邓颖超生前，一直把他们夫妻互赠的几朵花装在镜框里，挂在自己卧室

的墙上。

（西花厅）

（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前，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批示）

（周恩来在 1954 年 9 月 30 日在国庆节庆祝大会主席台上）

1954 年 8 月 1 日，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在外奔波了三个多月的周恩来回到了中南海的西花厅。接着便投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9 月 27 日，一届人大决定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并仍然兼任外交部长。

三天后，新中国便迎来了五周年的庆典——

（周恩来讲画时的画面和同期声）

我们坚决地相信，社会制度不同的一切国家都可以和平共处，一切国际争端都可以经过和平协商的办法求得解决。我国一向重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合作，尤其重视像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这样的主要的东南亚国家在和平事业上的努力，我们认为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当成为指导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

（西藏高原镜头）

（中南海）

周恩来这里阐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早是他 1953 年的最后一天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的时候提出来的。

印度是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第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1947 年，印度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独立以后，同时继承了过去英国在我国西藏拥有的通商和交通方面的、一切特权。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以后，不会允许这种特权继续存在。1953 年 12 月 31 日，中印两国政府就取消印度在西藏地方的特权开始谈判时，周恩来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想法，他还说：“中印两国只要根据这些原则，任何业已成年的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拿出来谈。”

（《中印两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有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内容）

（1954 年 6 月周恩来访问印度的电影资料）

（《中印两国政府总理联合声明》）

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五项原则”写进了双方协定的序言里。

1954 年 6 月下旬，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的时候，又分别向尼赫鲁和吴努提出：为了消除亚洲各国毫无根据的恐惧，给世界树立一个和平共处的范例，中国政府愿意看到中印两国确定的五项原则成为指导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于是五项原则又被写进中印、中缅两个《联合声明》中，《声明》提出，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和安全的坚实基础”。

（西花厅海棠盛开）

（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外景）

（尼赫鲁、西哈努克等各国代表团下飞机）

（周恩来、陈毅下飞机。在万隆会议大楼外面）

（会场开会镜头）

1955 年 4 月，也是西花厅海棠花开的时候，周恩来又赶赴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出席亚非会议。

五十年代初期，一批亚非国家相继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后，共同面临着西方国家的威胁。这些国家需要加强合作，但认识又不一致。于是，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新西兰五个国家发起召开了战后第一次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亚非国家会议，讨论各国之间的合作和发展问题。

但是，与会的二十九个国家中，和新中国建交的只有六个。多数国家还和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有的在政治和经济上还受美国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同中国有对立情绪。就是一些友好国家，对中国也有疑虑。要达到会议的预期目的，显然是困难重重。

当周恩来正要从昆明出发的时候，发生了台湾特务炸毁中国代表团赴万隆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他们的目标显然是对着周恩来的，但周恩来还是冒险来到万隆，受到印尼人民的热烈欢迎。

摆在周恩来面前的，是一个不好应付的“宴席”。

（李慎之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会议开始以后，可以说中国差不多处在被围攻的状态。第一天、第二天的会议都是有这种情况。会议日程表上本来决定，周恩来的发言排在比较早的，而周恩来呢也准备好了，在国内就准备好了会议的正式发言，但是在会场上一看实际情况以后，周总理表现得非常机智灵活，决定把发言推迟到比较后，在第二天下午。他同时决定把北京准备好的发言作为书面发言散发给大家，而他就在第二天的中午，差不多上午的会议上，我们就看到总理在他的座位上拿铅笔在写，实际上在写他的新的发言稿，就是所谓补充发言。然后到吃饭的时候，他还是在一边吃饭一边继续口授发言稿，然后我们几个年轻人就记下来。总理的这个发言稿，可以说是外交上的杰作。他头一句话就说，中国代表团来参加这个会议不是吵架。在补充发言里还特别介绍我们的外交政策是和平的，是把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看成朋友的，在华侨问题上特别讲，中国准备废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双重国籍问题，而改由华侨选择一个国籍。这个讲话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当时记得几乎超出了会场所有人的预料，认为周恩来发表了非常合理的演说，我还记得会议上有个美国人后来在报纸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是天然反共的，但是周恩来这个人我相信他。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的会外活动）

会议后期，在讨论《亚非会议联合公报》的时候，周恩来提出各国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一致。与会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出于好心，更是积极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好处，由于方法欠妥，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会议一时陷入僵局。美国舆论断言：“万隆会议不会成功”。

（李慎之时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

4月23号上午那个代表团团长会议，要决定会议最后发表的文件时，因为我们提出世界各国应该和平共处，但是有人提出反对，说和平共处是最初是由列宁提出来，是共产党的语言，因此不能接受。总理就说，既然如此，联合国的联合宪章也有和平相处这样的语言，也不妨用联合国宪章中的语言，并不一定非要用和平共处不可。最后池还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七条，而且还采纳日本代表团的意见，说这会议的最后宣言可以称为和平宣言。这就把大家的矛盾化解了，在此以后，最后的这个文件是由泰国的外长叫旺亲王，把大家的意见归纳为十条。所以有人说亚非会议通过了五项原则，其实这是不对的，亚非会议通过了十项原则，但是它的意思与我们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的五项原则，没有任何违背，只是内容更多了一些。总理就表示赞成，

所以代表团团长会议就通过了这个宣言，就在下午的闭幕会上一致通过这个文件，向全世界宣布。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期间的电影镜头）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的主张，再一次赢得挑剔的外国舆论界的赞誉。采访这次会议的美国记者鲍大可，在文章中称“周恩来准确选择时机的外交才能，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菲律宾外长罗慕洛则说：“周恩来是我去的时候的敌人，回来的时候的朋友。”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结识了两个终生的朋友，一个是刚刚在埃及搞革命成功的纳赛尔，一个是后来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西哈努克亲王。他在会议上宣布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引起周恩来的注意，特别交待，我们一定要交好这位朋友。

（周恩来 1956 年 11 月 29 日在印度国会的演说的同期声）

女士们，先生们，万隆会议并没有像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萎倒下去，我们亲自看到它已经在亿万人民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了，它已经在开花结果，而且还一定要滋长。

（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我觉得周总理的外交思想和实践中间，还具有非常丰富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哲学思想和策略思想。我这里举几个例子，他（经常把）大家都知道的一些说法来运用到外交上。比如说“后发制人”，一般叫做先声夺人，他提出来我们的外交应该是后发制人，也就是把情况弄清楚了，然后做出反应。又比如“来而不往非礼也”，意思就是你对我好，我应该报答，你对我不好，我也应该来对付，这个也很通俗。又比如说“针锋相对”。而在妥协的时候或者是寻求解决，或者是不准备造成僵局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退避三舍”，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退下来，然后再寻找其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再比如说“挽弓不发”，造成一种形势，我不直接去采取行动，骑在马上，我挽弓而不发。又比如说“有备无患”，一个事情我们可以先做准备，不一定马上行动，但是有备和无备不一样，有备就可以不怕这个情况发生。

（周恩来出访亚非国家的各种镜头资料）

万隆会议后，在新中国面前展示出一个更加广阔的外交前景。广泛地争取和团结亚非国家，成为五六十年代的外交工作重点。为此，周恩来三次率团大规模地访问了亚、非、欧三十多个国家。

开国初期，周恩来派出了一批将军大使，如今常常陪在他身边出访的又是一位元帅，他就是 1958 年上任的外交部长陈毅。陈毅元帅曾在一首诗里描述他 1964 年随周恩来出访非洲的感受说：“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热情的非洲人民把中国使者当作自己真正的朋友，而周恩来在加纳的那次访问更使非洲人民体会到了这种朋友的深情和价值。

（冀朝铸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就在总理访问加纳的前夕，加纳发生了一次武装政变。恩克鲁玛总统暂时把暴乱平息下去了，但是还非常危险。恩克鲁玛就不敢住在总统府，就退居到了城堡里面。他表示非常希望总理能够如期访问，并抱歉由于当时的安全上的原因，自己没有办法到机场去迎接。当时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政府首脑要访问另一个国家的时候，对方的首要领导人必须到机场去迎接。恩克鲁玛不能到机场去迎接，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就觉得，

是不是暂时先推迟，以后再去。总理不同意，总理说正是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更是要去，这样才是患难之交。这样我们的飞机就直飞加纳，到了机场，就是没有人接，坐着车就直奔城堡里去。恩克鲁玛非常高兴。通过恩克鲁玛的这个影响，我们很快在中部非洲很多原来没有跟我们建交的国家，纷纷和我们建交。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周恩来六十年代在非洲的镜头）

正是这次非洲之行，周恩来宣布了中国《处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关系的政治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周恩来出访亚非国家，使中国在发展中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地位，为七十年代初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后来说，不要忘了，是亚非国家的穷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

（埃及金字塔。周恩来观看埃及运动员用七分钟上下跑完金字塔的镜头）

在阿联访问的时候，一位当地运动员特意为周恩来表演了这个节目。他用七分钟时间上下跑完了金字塔。周恩来赠送给他一支中国生产的钢笔留着纪念。

（周恩来在阿联回答各国记者提问的镜头）

接下来的节目主角自然是周恩来。在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法国电视台的记者问他对法兰西的印象如何，周恩来回答说：我们对法国人民的热情印象很深。我和陈毅元帅四十年前都在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参加了共产主义组织，我愿借此机会向法国人民致意，我和陈毅元帅都希望有机会到法国进行访问。

（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法国议员富尔）

（刘少奇接受法国第一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中国第一任驻法大使黄镇向法国总统递交国书）

事实上，这次出国访问前，在周恩来主持下，同法国的建交谈判已经水到渠成。一些受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西方国家这时候开始意识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周恩来抓住法国和美国的矛盾，曾三次和来华访问的法国参议员、前总理富尔讨论建交细节。

1964年1月27日，当周恩来还在苏丹访问的时候，中法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经历十五年艰难的外交历程，中国，终于在看上去好像铁板一块的西方大国中撕开了一道裂口。

（周恩来早年留学法国的图片）

（法国凯旋门）

（周恩来1964年的图片）

1920年周恩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二十二岁。四十多年过去了，让他遗憾的是，自己终究没有以政府总理的身份重返法国访问。

## 第四集 万方乐奏

（周恩来各个时期和少数民族的合影图片）

这是一组周恩来与少数民族同胞合影的照片，每张照片的背后都有一个难忘的故事。这些和周恩来一起被记录在照片里的人们，回忆往事，想起的不仅是周恩来的微笑、手势和神态，还有经常穿在他身上的那套普通的中山服。

1949年10月1日，周恩来穿着这套衣裳参加了开国大典，他把新疆少数民族代表赛福鼎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上一个特殊的位置。然而，正是这身中山服，使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赛福鼎没有认出这就是新中国的政府总理。

（赛福鼎时任出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一次会议新疆代表团团长）

一位穿普通工作衣服的人走进来了，前面和后面的人也都是一样。我们以为，周恩来嘛，是中央的领导，应该是很隆重的，来的时候好象应该穿很高级的衣服啦，这不会是周总理。有这样的想法，我一点也没理这个进来的人。可是周总理来了，他问：你们哪一位是赛福鼎同志呀？我说，我是赛福鼎同志。噢，你是赛福鼎。周总理就和我握手，抱我，抱我表示欢迎嘛。和代表团讲完了话以后，周总理还说了两句话，问起阿合买提江他们牺牲的情况，跟我落实一下以后，表示了哀悼的心情。

（阿合买提江等人的墓碑）

（阿合买提江和三区革命领导人的合影）

周恩来和赛福鼎提到的阿合买提江，是开国前夕来北京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新疆各族代表团团长。途中因飞机失事，代表团成员全部牺牲。赛福鼎率领的新疆第二个代表团来到北京，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了。

（开国大典上站在毛泽东身后的赛福鼎特写镜头）

（少数民族欢庆解放。国旗）

站在毛泽东身后的赛福鼎，被永远地记录在共和国最庄严时刻的画面里。天安门城楼上的各少数民族代表也与赛福鼎一样，成了新中国成立的见证人。就在他们成为国家的主人并感慨万千的时候，各地的少数民族也在为共和国的诞生欢呼雀跃。长期饱受剥削和压迫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今天的天安门。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画像）

（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的修改手迹）

新中国成立后，每年国庆节，都会把孙中山的画像摆放到天安门广场。孙中山曾经主张民族平等，实行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蒋介石不承认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他把少数民族都当作汉族的分支。然而，旧中国始终没有解决盘绕了几千年的民族矛盾。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历来主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致力于“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新中国一成立，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就设置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在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被列为七大章节的第六章，并特意把“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等内容写到了里面。还对第五十一条中做了这样的修改：“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广电部大楼门口）

（各个语种的少数民族现场广播）



（反映五十年代初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镜头）

为了把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传达到少数民族地区，1950年，在技术设备条件不完备的情况下，周恩来指示开办了少数民族语言广播。

然而，少数民族同胞当时大都居住在偏僻的深山老寨、荒芜的大漠草原和边疆地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外边的世界很少沟通，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那样的遥远和陌生。何况一般家庭当时还不可能拥有收音机。

（中南海丰泽园）

中南海里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刻惦记着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为了尽快地使他们了解党的民族政策、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中央决定以直接见面的方式增进相互的了解。组建中央民族访问团，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访问；还组织各地少数民族参观团到北京参观。按毛泽东的说话，“上来下去，一年两次”。这些事情，自然又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

（云南昆明。王连芳的住地）

在云南的昆明，住着这样一位回族老人，时光早已把这位北方汉子的头发染得雪白雪白。看上去他也完全适应了南方的气候。

他叫王连芳，早年曾经担任过共产党领导的渤海回民支队的政委。1950年率中央民族访问团的一个分团来到云南这个多民族的居住地，从此便留在了云南。

1997年秋天，我们给老人带去了一盒记录访问团当年情况的录相带，电视里的画面仿佛把老人带到了过去的岁月里。

（电视资料同期声）

去云南的第二分团，由夏康农、王连芳正副团长率领下，向彝凉挺进……

（王连芳、费孝通画面定格）

担任云分团副团长的王连芳到达了普洱、彝凉等地。

担任西南访问团团长的费孝通到达了广西的大瑶山等地。

（云南访问团当年的电影镜头。）

五十年代初，中央民族访问团分成十几个分团，先后搭乘飞机、火车、轮船、汽车、木炭车，没有路的地方就骑马、骑骆驼、步行，一路上跋山涉水，分别到达四川、西康、云南、贵州、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地。

（王连芳时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云南分团副团长）

在访问团出发的时候，周总理召集了我们这一些同志，开了一次会议，他就说了：你们下去以后，要掌握四条原则。第一条就是你们要准备受冷淡；第二个呢，他说，决心赔不是，因为国民党，因为历代的王朝欺压少数民族，欠了少数民族的债，你们到了那儿呢，就代表我们中央政府向他们赔不是。当时我们因为有个朴素的感情，我们还插了话，说是这个压迫少数民族，剥削少数民族，都是历代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国民党压迫他们，我们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中央，我们的政府从来没有压迫过少数民族，而且为少数民族解放奋斗，我们怎么替他们来赔不是呢？周总理听了以后笑了，耐心而风趣地说：我们接受了整个国家，整个家业，我们不能够、不应该替他们赔不是吗？还这笔债吗？这么一说嘛，我们大家也就笑了。然后他就说第三条：就是一切听人家的。因为那里的人民不了解我们，还是要听他们自己的上层人士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说的什么话，我们都要听，而且他们内部的事情不管合理不合理，都应该不干涉。第四个，就是如果我们和少数民族发生了矛

盾，你们到了边疆，跟少数民族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你们要首先作自我批评。

（王连芳在云南普洱的群众大会上讲话）

（访问团向少数民族赠送毛泽东像和各种生活用品）

按照周恩来的嘱咐，访问团向当地人民阐述了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并根据周恩来圈定的礼物清单，送去了毛泽东像、布料、毛巾和粮食，送去了当地紧缺的盐巴。还为他们放了电影。

（费孝通时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

很少数民族的同胞，衣服都没有。男男女女光着膀子，我说这也不成样子，太苦了，我们当时就发动访问团的同志，女同志就做衣服，做裤子给他们，没有穿的当场就送给他们。有的地方没有米吃，我们就送米。我还到少数民族家里当场送米。就这样子，以心换心呀，他们感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中央派来的，代表毛主席的人，待他们这么热心，想到他们穿的，想到他们吃的，他们信了，说这是“新汉人”。这个感动人哪，确实感动人哪。

（各个民族的人们喝酒盟誓）

（民族团结誓词石碑）

被称作“新汉人”的访问团，还根据当地习惯，和少数民族兄弟喝酒盟誓，他们把民族团结公约和誓词刻在了石碑上。这块由云南二十六个民族立下的石碑，如今仍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云南的思茅地区。

（少数民族代表乘火车到达前门车站）

（少数民族代表向毛泽东献礼）

在中央民族访问团走下去的同时，一批又一批的各地少数民族参观团陆续来到北京。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和只在画像里见过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面对面地站在了了一起，献上本民族最有特色的礼物。

（周恩来讲画的画面和同期声）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加强和巩固民族团结，我们应该有步骤地和切实地实现民族的区域自治政策，我们应该帮助各民族人民训练和培养成千成万的干部，并为逐步改善和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而努力。以便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

这是一段 48 年前周恩来在招待少数民族国庆观礼团宴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为少数民族代表签字留念）

也是在这个时候，许多少数民族代表认识了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他们纷纷地围过来请周恩来签字留念。

在这些画面里，除了服装你看不出周恩来和少数民族有什么不同。也许正是在这个时候，代表们亲身体会到了周恩来关于民族平等的思想，一些代表甚至和周恩来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五十年代初反映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和教育的电影镜头）

在这些代表的家乡，他们的同胞也受到了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

建国初期，在一些没有建立少数民族自治机构的地方，为了发展民族经济，周恩来提出：“政权未建，贸易先行”。

湖南、云南、贵州等地的少数民族妇女有佩带银首饰的风俗。为了照顾这个习惯，在国家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指示给这些地方调拨了大量的白银。

从1950年开始，全国各地相继创办了十所民族学院，连人数最少的赫哲族也有了自己的大学生。周恩来要求民族学院不仅要为少数民族培养政治干部，也要培养专业技术干部。为此，中央民族学院在第一届学生中便开设了民族经济、畜牧业经济、财务、卫生、合作社贸易、科学常识各种课程。他们回到家乡后，大大加速了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周恩来1950年10月23日在政协会上讲话的同期声）

“一年多来经过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个少数民族地区访问，各少数民族代表来北京开会及其他工作，沟通了中央人民政府同各个少数民族的精神联系，促进了各民族对伟大祖国的体认。”“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则已从历史上的长期分裂对抗转到团结合作。”

“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正在逐步推行”，“国营贸易机关正在以各种努力向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工作，凡力所能及的地区均以等价交换甚至实行补贴的办法组织物品交流”，“人民政府派出许多医疗队、防疫队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工作，或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建立自己的医疗机构”。

“这一切工作，对于国内民族问题的根本解决，还只是一个开端，但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周恩来到前门车站接达赖和班禅）

（达赖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届一次会议上发言）

（国家领导人和少数民族代表投票）

1954年9月4日，周恩来赶到前门火车站迎接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活佛。这是他们首次联合进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对中国的少数民族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达赖和班禅分别在会上发了言。西藏的达赖和新疆的赛福鼎还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百七十八位少数民族代表和国家领导人一起行使自己的权力。表决通过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

会后，根据《宪法》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这项基本国策，主持建立各地少数民族自治机构的工作，更急迫地提到周恩来的工作日程。1955年3月9日，他主持国务院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

（阿沛·阿旺晋美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秘书长）

周总理做了重要讲话，他说：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核心，是在国内各民族平等团结的基础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发展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使各民族走上共同繁荣发展的道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证，这也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和一项基本国策。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个重大步骤，希望你们回到西藏以后，进一步加强团结，做好各方面的筹备工作，尽快地成立西藏自治区。

（周恩来办公室）

（飞机起飞）

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除了一些日常办公用品外。还有两样特殊的装饰品。一个是毛泽东的雕像，一个是摆在书柜上的飞机模型。或许，他在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毛泽东同志的尊重，表达着对飞机的偏爱。

他曾经说过：“为了赶时间，外出生飞机冒点风险。值得。”

1955年，美蒋特务炸毁原来准备由周恩来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后，一些领导干部劝正在云南的周恩来外出尽量不要坐飞机，他又说：“为

了世界和平，外出坐飞机，值得。”

（刘明辉时任云南省代省长）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以后，我们见到周恩来也跟他谈起过，劝他不要出去……

（中缅边境外景。解放军站岗）

（云南边境小镇芒市）

1956年，为了促进中缅关系的发展和两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团结，周恩来提出在云南的芒市举行一次中缅边民大联欢，并且表示要亲自来参加这个活动。

而这个时候，“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刚过一年，盘踞在缅甸边境的国民党五个军的残留部队距芒市只有八十公里。他们经常深入云南边境暗杀干部、爆炸电影院等等。他们是否会利用这个机会暗杀周恩来呢？正筹备这次大会的云南省代省长刘明辉十分担心。

（刘明辉时任云南省代省长）

当时考虑的问题呢，当然主要的是要把这个会开好，还有怎么样绝对保证在开会的时候两国总理的安全问题，周总理的安全问题，缅甸总理的安全问题，怎么样保证这个会议的安全。要保证安全必须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少数坏人捣乱、破坏。

（芒市外景）

（当年中缅边境大联欢图片）

1956年12月，中缅边民大联欢如期举行了。周恩来到了芒市的消息也传遍了云南的各个角落。为了参加这次盛会，有的少数民族兄弟赶了许多天的山路，才来到会场。会场气氛很热烈，但安全保卫工作却并不轻松。

留在云南工作的王连芳向大会介绍云南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

（王连芳时任中共云南省委边疆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我站在总理旁边的一个扩音器那里，就介绍情况。我开始一介绍，总理说，从容呀，不要紧张呀，因为当时我是第一次这样讲话。然后我就介绍了。我说我们云南除了二十一个民族以外，还有独龙人、苦聪人、基诺人。当时、总理就低声告诉我：不要叫人，都要叫民族。然后就大声说，我们新中国呀，不论人口多少，不论是先进或后进，特别不是提落后，是提后进，各民族都是一律平等的。经过总理这么一说，我们打破了教条的束缚，就确定基诺人、独龙人都称为民族，而且他们也就理直气壮地成为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当中的一员，光荣的一员。

（中缅边境大联欢的图片）

正当这些被称为独龙人、苦聪人和基诺人的民族同胞们用模糊的双眼看着给他们带来平等和尊严的周恩来的时候，人群里，却有一支枪口指向了主席台。

（刘明辉时任云南省代省长）

当时我们不了解，事后了解到，还混进来坏人，就是台湾蒋介石那个残匪的一个组长，这个人原来就是芒市的一个小土司，跑到那边去的。他改了名，化了妆。以开车司机的身份混进来的。

（周恩来和缅甸总理吴巴瑞在一起的图片）

（今天的芒市街景）

这就是当时站在主席台上的周恩来。

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在那次大会上，他并没有受到伤害。也许你会觉得，这次历险和周恩来一生所经历的其他险情比起来，不值得一提，如果不是采访到当事人，人们甚至不知道曾经发生这件事情。然而，对心里永远装着别人的周恩来来说，为了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危险，他的回答仍然是那样两个字——“值得”！

（芒市中缅边境大联欢电影镜头）

（周恩来和缅甸总理吴巴瑞在主席台上鼓掌。群众欢呼）

我们用特技的手段延长了这段画面，为的是让芒市那些仍然健在的少数民族兄弟姐妹们，重温一下当年的幸福。

四十二年过去了，那些满脸喜悦的姑娘们，当你们今天把心爱的首饰传给下一辈的时候，也许你并不知道，那是周恩来总理给你们送去的白银；这些远道而来的小伙子们，当你接过盐巴的时候，也许你并不知道。这些来自周恩来总理细心的叮咛。

（飞机起飞。周恩来在赴印度的飞机上看《民族画报》）

离开云南芒市两个星期以后，翻看着新近出版的《民族画报》，周恩来又踏上了访问印度的航程。

如果说他在芒市的活动促进了中缅边境的民族团结，那么，这次出行则制止了一次迫在眉睫的民族分裂活动。

（刘春时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印度举行释迦牟尼两千五百年涅槃的纪念活动，邀请达赖和班禅到那里去参加纪念。这个问题报告到中央，也到总理那儿了。我的意见那，班禅去当然没有问题，肯定能回来，我说达赖出去可能就回不来了。

（达赖和班禅在印度的镜头）

周恩来电告达赖和班禅：去不去印度，完全根据你们自己的意愿做出决定。

达赖到达印度后，受到印度总理尼赫鲁的热情招待；也受到流亡印度的西藏上层分裂分子的包围，其中就有他的哥哥。回不回祖国，达赖的思想发生了动摇。

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三次找到达赖，就他的去留作了推心置腹的谈话。

（李佐民时任达赖的翻译）

总理就明确地跟他讲，你留在印度是没有前途的，第一、尼赫鲁总理本人明确地跟我讲，他是不支持西藏独立，他始终认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这是尼赫鲁很明确的态度。第二，你有神的一面，那么神呢，只有在庙里边才有神气，神要离开了庙，就没有神气了，而你的庙在拉萨，不在新德里。

总理还向达赖喇嘛转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说毛主席也希望你能早点回去，这样对你有利，对西藏有利，如果你留在印度不回去，西藏的工作照常进行，中央对西藏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但是你自己呢，就会非常困难，所以这也希望你要慎重考虑。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达赖在一起举杯的图片）

后来，达赖回到祖国。他说：如果没有周总理做工作，我也许回不来。西藏的发展经历了风风雨雨，但是自治区的筹备工作仍然在周思来的指导下进一步开展起来。

（西双版纳曼听公园。有周恩来塑像的风景点。）

（周恩来题词手迹）

这是美丽的西双版纳，30多年前周恩来曾经与这里的各族群众欢渡泼水节。今天，在周恩来曾经到过的许多地方，已经变成一道道风景，它融入了人们对周恩来深深的怀念。

随着时光的流逝，尽管我们不可能完全走进周恩来的内心世界，但在反复读解这些画面时，显然感受到在这些动人神态后面的一种特殊的魅力。无论是代表国家利益站在国际外交的舞台上面，还是作为一个公民出现在等待理发的队伍中，你都可以看到溶进周恩来的生命和个性的那种平凡和平等。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更忘不了开国初期周恩来的这段题词，里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苏联电影纪录片《普通法西斯》片断）

饥饿的孩子们，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红萝卜，可是被德国兵看到了。

你现在看到的，是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拍摄的一段“保密资料”。人类永远不会忘记世界民族关系史上这最黑暗的一页。

（《普通法西斯》片断）

集中营，光在德国本土，就有三百多个这样的集中营。等待着他们的，是毒气室和炼人炉。

（解说的画面延续上面《普通法西斯》的镜头）

（周恩来的图片）

周恩来深知种族歧视和民族不平等造成的恶果。他说：

（1957年8月4日周恩来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德国法西斯认为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我们认为，所有的民族都是优秀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勤劳的有智慧的，只要给他们发展的机会；所有的民族都是勇敢的，只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我们社会主义的政策，就是要使所有的民族得到发展，得到繁荣。

这是周恩来1957年在青岛民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讲话，至今仍然是民族工作的指导文件。

（报载有关广西自治区成立的争论，自治区成立的画面）

也是在1957年，社会各界就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问题正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有的主张“合”，就是把已有六百多年建制历史的广西全省改为壮族自治区，有的主张“分”，就是保留广西省，另外建立一个桂西壮族自治区。周恩来知道后表示：“我主张合，不主张分”。“如果把桂西的壮族自治区分出去，他就孤立了，不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总之，“合则双利。分则两害”，“要在广西汉族人民中进行教育工作，不要为保留一个‘省’字，把广西各族人民共同前进的道路阻挡了，那样，将来我们的子孙会笑话我们的”。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1958年广西全省便改成了今天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成立的省级自治区还有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并在许多省份成立了大批的民族自治州、自治县。周恩来说：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实现民族平等和共同发展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举。

（包钢外景。马的雕塑。周恩来视察包钢的壁画）

历史上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的蒙古族，至今仍保持着对马的钟爱。

在包头钢铁厂的厂区大路上，你每天都能感受这种奔腾的气势。

当年，在设定内蒙古自治区区界的时候，周恩来曾做工作把原来汉族占绝大多数的绥远省划入了内蒙古。他说：绥远的包头是我国重工业区之一，现在划归了内蒙古自治区，我们就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

当周恩来 1959 年来到包钢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的期望正在逐步变成现实——

（周恩来 1959 年 10 月在包钢讲话的同期声）

内蒙古自治区……东起海拉尔，一直西边连接到新疆，这么长一块地方。”“我们不是说要造成一些不平等的现象，而是使我们全国各族的人民更加平等，包头就是一个证明嘛。我们的内蒙古自治区现在有了工业化的一个基础的包头市，就可以在今后十年、十五年使内蒙古的工业化的情况更加发展。

周恩来当年来到这里剪彩时的情景，至今依然描绘在包钢一号高炉前的墙上。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周恩来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1959 年国庆十周年庆典）

这是个全民大跃进的年代。民族政策开始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一些地方违背周恩来提出的“慎重稳进”工作方针，采用整齐划一的方式开展民族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民族工作受到更大的冲击。一些人从根本上否定了民族工作的特殊性，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说成是“人为地制造国家和民族的分裂”。于是，在一些地方连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基本的政治体制也被动摇了。

（江平时任中央统战部民族处处长）

云南有四个自治州，就像西双版纳白族自治州，没有经过中央同意，云南就把这个自治州并到专区了，同时给他换了一个牌子，实际上它已经不存在了，同时挂了一个思茅专区，两个牌子。景洪、景颇自治州就并到保山地区了。总理发现以后严厉批评，我们不能随便改，自治州怎么能随便就撤消了，这是列入《宪法》的，你们应该立刻恢复原样。云南的自治州实际上被取消，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我们按照总理的意见，云南的问题陆续都处理了。

（西花厅夜景。周恩来办公桌）

（周恩来坐过的摇椅）

1975 年秋天，正是西藏和新疆两个自治区分别成立十周年和二十周年的日子。病床上的周恩来托人给西藏带去了一部叫《养蜂促农》的科教影片，又说自己不能再到新疆去走一走了，希望能多拍些照片回来，让他看看各族人民今天的生活。

（天安门）

（十世班禅大师每年 1 月 8 日到天安门纪念碑下悼念周恩来的图片）

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今天的人们会以各种各样的心情来回顾那段历史。怀念那一代伟人。

周恩来逝世后，每年的一月八日，十世班禅大师总是早早起来，经过沐浴、打坐、熏香、念经、祈祷后，来到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以自己的方式，来追念他的朋友和长辈——周恩来，直到他去世。

（天安门晨景）

（民族大团结路碑）

这是一个普通的早晨。在匆匆忙忙的车流中，也许就有你的身影。也许紧张的生活使你无暇顾及早已熟悉的景物。

当社会学家告诉我们，种族冲突和民族冲突，已成为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不安定的首要因素的时候，或许你会留意一下街头这块天天经过的大型路牌。在这上面凝聚的，正是周恩来民族团结、共同进步的心愿。



## 第五集 风雨情深

（在相机过卷的声音节奏中，由远及近推出周恩来不同时期的图片）  
周恩来是个知识分子。

他曾为自己没有很好地完成学业而感到遗憾。他说：“我中学毕业后，名义上进了大学一年级，但是正赶上‘五四’运动，没有好好读书。我也到过日本、法国、德国，所谓留过学，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这些国家的大学之门。所以，我是一个中等知识分子。……不过，我总算是知识分子出身。”

（五十年代初北京街景。北京饭店老楼）

（周恩来步入会场。讲话镜头）

1949年5月5日，刚进北平城的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召开了一个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的座谈会。

三十年前，一大批知识青年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走上了街头。三十年后，在一个新政权即将诞生的前夕，周恩来和“五四”时期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他告诉在座的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人在建设上很差，甚至可以说是无知，在建设上愿意做小学生，向大家学习。”

（故宫外景，飞机起飞）

（天安门。北京旧街景）

（海鸥。大海。科学实验。回国知识分子图片）

中国共产党人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争取着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最是无价的财富——知识分子。他劝说他们留下来，不要去台湾和海外；还邀请海外留学人员早日回到新生的共和国。

于是，五十年代初，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一个壮丽的奇观：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冲破重重难关，漂洋过海，怀着一腔赤子之情回到了大陆，参加祖国建设！

（梁思礼梁启超之子）

我回来的时候是大概在1949年的9月份，9月下旬，坐的是“总统轮”，那时没有飞机啦，就是坐轮船，大概得走两个多礼拜。当时我因为是学无线电的，所以我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收音机。那会儿已经知道，10月1号，我们要宣布成立新中国，所以我就爬到比较高的地方，把天线给接上，然后就听新中国的广播，结果就听到了毛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啦！而且中国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来了。我们所有进步同学在船上全都欢欣鼓舞，就说应该开个庆祝会，当时只是听到说是五星红旗，到底五个星是怎么一个放法谁也不知道，那会儿反正全是出于我们自己的想象，拿一块红布，然后剪了五颗星，也知道有一个大星，四个小星，结果把一个大星就放在中央，然后四个小星放在四个角，这就是我们当时心目中的五星红旗。

也就是说，当时我们的心目中的新中国象一个巨大的磁铁来吸引着我们这些国外的一些游子。

（国旗。海鸥。背景资料。回国之初的李四光作报告）

1949年8月到1955年11月，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有一千五百五十多人。周恩来拨出专款，在政务院专门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的常设机构。

（李林李四光之女）

到了北京呢，（我们）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就有人打电话来，说李

四光同志有没有时间，有人要来看他。我父亲说我没事儿呀。后来，那人就来了，一看是总理。当时我母亲，还有一些我父亲的学生，都在场，简直是高兴得不得了。想到总理肯定跟我父亲有很重要的话要讲，大家都退出去了。那是 1950 年，父亲刚刚回国，总理在北京饭店跟我父亲谈了三个小时，谈的内容，我们是不清楚的，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后来，经过我父亲点点滴滴地说，是这样，总理讲，现在全国解放了，要搞社会主义建设，找矿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总理还说：全国地质工作会议早就要开了，但是呢，我一直等着，要想叫你来主持这个会议，他说有人跟他讲，李某某是不会回来了，你别等他了，可是总理说，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他现在没回来，一定是遇到了困难。总理说你现在回来了，第一件事儿，就是要把破旧的中国极少量的地质工作者和地质机构团结起来，和大家共同商量，怎么为我们国家找矿。

（李四光看地图。地质人员勘探。李四光晚年图片）

回到祖国的李四光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地质部长，成为新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奠基人。六十年代初，根据他的地质理论，勘探出了著名的大庆油田。1971 年李四光去世，周恩来亲自出席了追悼会，当发现事先没有准备悼词的时候，周恩来当即念了李四光生前对地质事业的一份遗嘱，以代替悼词。

（周恩来 1951 年 8 月 11 日台历）

（火车启动。莫斯科外景资料）

在邀请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回国的同时，周恩来还主持制定了大批青年骨干留学苏联的计划。1951 年 8 月 11 日，第一批三百七十五个赴苏留学生就要启程出国了，周恩来专门接见了他们，告诉这些学子：“国家目前很困难，但下决心送你们出国学习，是为了将来回国参加建设。”从 1951 年到 1960 年，中国每年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少的时候有二百多人，多的时候达到两千人。

（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领导人出席最高国务会议的资料镜头）

（陈云和人谈话、毛泽东站在跟前听人发言）

（钱学森发言、周恩来发言）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很动人的一幕。他们相互尊重，认真听取对方的意见，谈论的只有一个迫切的话题：怎样把百废待兴的中国发展起来。

（周恩来和学生们在一起的电影资料镜头）

（一些学校当年的外景镜头）

新中国太缺少知识分子了。无论是请回来送出去，都满足不了建设的需要。

周恩来呼吁：“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最困难的事情。”“今天最大的不足是知识分子的不足。工作一开展，知识分子就更不够。因此要大量培养知识分子。”他还算了一笔账：大中专毕业生每年不到十万人，只要建设一开展，每年需要毕业生二十万人。为了办一所航空学校，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周恩来特批了六十亿斤小米，用它来换钱办学。为了高效率地培养人才，1952 年，在周恩来主持下把原来设立的教育部分成了两个部，一个是高等教育部，一个是普通教育部。

（周恩来在一些学校的讲话镜头。配周恩来的同期声）

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总方针，不论是在学校里有时候在小学、中学、大学，在社会上，工、农、商、学、兵各个方面，经过学校的教育，或者我

们在各个方面工作中的自我教育，都要在德育、智育、体育几个方面都得发展。使我们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周恩来和老师、学生在一起。参观实验室）周恩来是大学师生们的朋友。每年夏天学生毕业的时候，他都要到一些学校去讲话。他说：在由革命转入建设以后，学生对运动还有兴趣，而对学校学习却不那么重视，领导上要注意这种情况，要把它扭转过来。他还发现在一些政治运动中，有些教师受到牵连，提出：“只要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了，就要加以保护”。他反复强调：“教学是学校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要纠正师生参加社会活动过多的偏向”。这些都是为了让教育正规化，使学校能够培养出合格人才。

（周恩来讲着话，听众反映镜头。配周恩来同期声）

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为我们国家富强和个人的幸福，要把国家和个人的命运联系起来看。国家还没有富强，我们个人的生活还要长期地吃苦耐劳，节衣缩食，把国家搞富强起来。国家富强起来了，对世界有好处，对我们自己也有好处。

（北京旧街景。马寅初。怀仁堂。周恩来讲着话）

（马寅初等发言。马寅初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

（毛泽东等会见知识分子。周恩来宴请一些老人）

刚刚投身新中国建设的知识分子，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如何卸掉思想包袱，甩去旧社会的复杂影响的问题。

1951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向知识分子发出了进行思想改造的号召。北京大学汤用彤等八位教授发起组织了一个北大教师政治学习运动。应北大校长马寅初的邀请，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北京和天津高校教师们一口气讲了五个小时。

他说：我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同志要问，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还很多……，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工作，但也犯过很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可是，我从不灰心。犯了错误，不要当包袱，检讨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就是了。

周恩来的这个报告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马寅初随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

（季羨林北京大学教授）

对周总理本人，反正据我在北大看到的，没有一个人不尊重的，因为周总理本人道德大家有口皆碑，而且真正关心知识分子。总理很了解知识分子，理解知识分子。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大概有第三步：第一步是民族立场；第二步是人民立场；第三步是阶级立场。

当时北大的知识分子有一个词叫“洗澡”，什么叫“洗澡”呢，就是（开会的时候）你要当面检查你自己的思想有什么错误。当时有三种“洗澡盆”，大盆洗澡，中盆洗澡，小盆洗澡。大盆的话，就要对全校师生来检查，中盆呢，一般是系主任，要对全系的教职员来检查，小盆呢属于教研室那一个阶层。我是系主任，我属于中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对你检查的不满意呀，大家不通过，第二次还要检查，我还算是好的，我检查了一次，第二次就通

过了，就算洗澡洗完了。

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情况是这样子：最初，倒不一定认识到自己身上有什么毛病，可后来人们都说你有毛病，结果呢，人非常容易受外界影响，就觉得自己有毛病，倒不是勉强的。拿我来讲，我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是肮脏，就应该改造。这原罪呀，是应该的。当时我虽然在中盆里边也碰过一次钉子，洗过两次澡，可是感觉到，完了以后，真象洗过澡以后，觉得身体非常的干净，精神非常愉快。

（季羨林散步）

季羨林教授今年八十七岁，在北京大学教了五十二年书，一生致力于研究东方文化史。是为数不多的熟悉古代梵文的专家。

（齐白石作画。周恩来和齐白石在中南海怀仁堂）

他叫齐白石，是中国水墨丹青的一代宗师。1953年冬天，周恩来专门在中南海怀仁堂设宴庆祝他九十寿辰。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为白石老人买了一所过去的王府供他颐养天年。后来，白石老人又找到周恩来，说想和家人住在一起，周恩来当即回答：“我现在就送你回去。”（齐良驰齐白石之子）

我就把这情形告诉白石老人，我说：爸爸，周总理马上要亲自送您回跨车胡同。这时候我父亲就看着周总理，激动得嘴就发颤，要说话又说不出，激动得说不出，就望着周总理，周总理呢，也望着白石老人，就这样坚持了有一段时间。

车子很快就到了跨车胡同。是周总理先下的车。这时候我从前面的门也下了车。周总理下车的时候是他自己开的车门。周总理就把白石老人给搀出来了，同时又扶着白石老人进了跨车胡同他自己的家门，接着他又扶着白石老人进了他自己的三间北屋。

白石老人那时候年纪老了，他就是认为周总理对他最亲，我看是这么样，从那个表情上看得出来。（周恩来和齐白石合影。齐白石《和平万岁》的画）白石老人生前一直把这张合影挂在自己的屋里，还以九十二岁高龄为周恩来画了这样一幅画。

（长安街。五十年代中期建设场面。周恩来作报告）

（周恩来和知识分子交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一起）

（周恩来《关于收集知识分子问题材料的题目单》修改件）

五十年代中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到来了。知识的力量可以兴国安邦。主持经济建设工作的周恩来越来越感到建设人才的缺乏，他掰着手指头计算着仅有的十来万高级知识分子的分配和使用，明确提出：“无论在数量方面还是业务水平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

为了改变这个现状，周恩来产生了召开一个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想法。1955年11月，他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毛泽东说：“我们应该先在党内很好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随后，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专门发言说：对知识分子要用而不疑，给予信任，信任的中心是尊重他们，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也可以入党。现在绝大多数的教授工资都在副局长以下，有的只相当于科长，这是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影响的结果。毛泽东当即表示：“知识分子问题，我同意周恩来同志今天的发言。”

于是，中央决定在 1956 年 1 月召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对党的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

（费孝通时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

我就一路调查，一路写报告，写得很多。据说当时的反映呢，说写得好，一直通到天了，（就是说）一直到毛主席都看了，后来毛主席还顺口一句，文章写得好。我每跑一段，我就写一个报告，总结当时的知识分子情形。我感觉到知识分子待遇不够，说了几个“不”出来，（就是）对知识分子，重视不够，待遇不够，投入不够吗，现在讲，就是信任不够，党内党外对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距离，这是我总结出来的当时情形。

（统战部给周恩来的报告）

这是中央统战部根据各方面的调查，写给周恩来并转中央的报告。里面说到：“费孝通、谢冰心反映，知识分子喜欢信任，士为知己者死，希望党是‘孟尝君’”。还说，有个地方接待苏联专家，只让党内知识分子参加，党外知识分子被拒之门外。

（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手稿）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出席大会）

（周恩来作报告。毛泽东作报告）

1956 年 1 月 14 日，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开幕了。这无的重头戏，自然是周恩来在会上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宣称：“知识分子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各个方面的重要因素。”“正确地估计和使用知识分子，帮助他们不断地进步，已成为党和国家极其重要的任务。”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须充分信任他们，改善他们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周恩来还以急迫的心情告诉与会者：现代科学技术正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我们必须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毛泽东在会上大声疾呼：我们现在要搞一个新的革命，就是革没有科学的命，革无知和愚昧的命。

（报刊有关会议的报道。有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文件）

（周恩来题名的《知识就是力量》刊物）

（有关向科技进军的电影资料）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有关部门要联合创办一个科学普及杂志，周恩来欣然为这个今天还在出版的杂志题写了刊头。与此同时，他抓紧把改善知识分子的待遇落到实处。

（李準作家）

1956 年，中央开一个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总理参加，找了各种类型的作家，十来个人，有代表性的，最年轻的是我，我那时有二、三十岁。有郭老，有曹禺，有老舍先生，都在。（总理）就一个一个算在场的人的每月收入。他问：老舍，你多少钱，老舍先生说我还要吃，还要什么什么，我一个月没有三、四百块钱不行。总理说：不多，你还可以再加上一百二三十元。最后算到我头上，总理问：李（準）你现在多少，我说我三个孩子，现在农村住，我大概现在六十块钱，差不多够了。总理马上批评我：你那不标准，作家哪有象你这样生活的，都是叫提高点，不是叫降低点。那时候总理对知识分子的感情，叫我们都感动，真感动。

（李準当年的镜头）

李準当年还只是一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后来，他写出了著名的小说《李双双小传》，拍成电影后深受观众欢迎。

（空景。知识分子工作场景）

一时间，知识分子不仅在政治和业务工作中得到极大的重视，他们的生活待遇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一级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的工资由原来的二百五十三元增加到三百四十五元，相当于当时国务院的部长们的工资。

（中南海西花厅夜景）

中南海里的西花厅，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个非常亲切的地方。那时候，周恩来喜欢在家里用自己的钱请他们前来作客，常常兴致勃勃地聊到深夜。

（胡絜青画家、老舍夫人）

总理拿车邀请文艺界三对，有曹禺夫妇两个，有吴祖光、新风霞，有老舍和我，这么三对。总理在西花厅客厅一直说的都是文艺界的事，怎么样来创新。说的时间挺长的，然后就留我们三对吃饭。吃饭的时候总理是议论风生，吃得非常高兴。总理还把英国伊丽莎白送的白兰地，一种很老的酒，拿出来请大家喝。他看大家喝得很高兴，他就去厨房亲自做了干丝汤，他的干丝汤做的特别有味道，请我们吃。吃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回去

（老舍故居）

这里是老舍先生在丰富胡同的故居，周恩来曾几次到这里登门拜访老舍夫妇。

（胡絜青画家、老舍夫人）

突然间有一天，总理来了，来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多钟吧。没有说几句话，老舍就说：絜青啊，总理要跟我说点事，你上西屋去吧。

由两点钟一直说到六点钟。后来呢老舍就出来说，絜青呀，总理要在家里吃饭。我当时就愣了，因为已经六点多钟了，自己再到外头去买东西也来不赢了，总理事情挺多的，马上吃怎么办呢？急得我什么似的，后来没办法，就在厨房按我们家里吃的，摊个鸡蛋，家里有咸鱼，就拿这两样东西请总理。上东屋饭厅吃饭的时候，总理说你们家里有什么东西就吃什么，还说了一个笑话，你跟小超都是一样，你们知识分子不会做饭。

（西花厅。黄永玉抽烟。公园。街上游行的青年）

这是知识分子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他们用自己最朴素也最生动的语言表达着自己的心声。画家黄永玉曾这样回忆他五十年代的感受：“祖国的土地，天是蓝的，水是甜的，空气是清新的。可尽情地呼吸。我走在东单大街上，每一个行人脸上都透着那么纯洁。我体验到了精神的幸福，这才是幸福。我甚至做出这样的事，同那些素不相识的过往行人去握手，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但我的心情是舒畅的。”

（天安门夜景。大学生联欢场景）

1956年中秋节的晚上，人们相聚在天安门载歌载舞。当时清华大学的一位女生用高音喇叭朗诵说：“年轻的朋友们，让我们跳起来吧。昔日的对手，在月亮下，让他们和解；分手的情人，在月亮下，让他们互相原谅；过去的情敌，在月亮下，让他们握手。跳起来吧，想想我们的未来，只要想到未来，无论是嫉妒还是猜疑，无论是误会还是偏见，一切恩恩怨怨都在月亮下烟消云散。”

五十年代，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说道：“跟着新生力量走，用发展的观

点看问题，并有不怕困难的精神，这才是正确的。”

（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

这时候，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7年3月，费孝通教授发表了这篇轰动一时的文章。

（费孝通时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

当时的知识分子的心情有两面。觉得共产党道路是对了，是要把中国带到一个好的、富强的前途上去了，大家拥护。可是另一方面呢，落到自己身上，感觉到不舒服，因为压力太大，特别是思想改造的压力太大，他不能发挥他的自己的学科专长。到现在去问老知识分子还有这个感觉。

当时他（总理）看了这篇文章，在飞机上看了这篇文章，觉得真正透露了知识分子心里话的，就是这篇文章。这个评价很高了，我要求自己是不是用科学的眼光看，是不是真正表达了我的实际，表达实际，就很符合科学了。总理肯定了这一点，到现在我觉得还很高兴。

（电影新闻资料）

（1957年夏天报刊社论：《这是为什么？》）

然而，1957年的夏天，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场反右派运动。这场运动在进行过程中被严重地扩大化了。其中受到冲击的许多是党内外的知识分子。

（费孝通时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

我就不懂，为什么一下子变了。我就不明白。说我是恶毒地向党进攻，这一点我不懂。当时我的政治经验还不到家，什么叫进攻，我都不懂，我反映事实嘛，可被认为是向党进攻。

（电影资料）

这时候，共和国总理的办公室，也有三位工作人员的家属被划成了右派。其中就有秘书马列的妻子。

（马列时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

总理当然对我很信任啦。但是这个问题出来以后，那是敌我矛盾，右派，不是一般的错误，不是作风、工作里边的失误。我把材料先给邓颖超同志看了，邓颖超同志只是说林颖这个人哪说话太随便吧。

我马上就提出来，我说恐怕要调动我的工作，再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是不妥当的，总理就跟我说，他说你不要考虑这个问题，林颖同志她是一个阳性人，她有什么就说什么，你不要在意这件事情，继续在我这儿工作。

（夏衍图片。背景资料。马寅初图片）

当时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曾回忆：反右派运动开始的时候，有一次，总理召集意识形态部门的负责人开会，当场规定：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在海外有影响的人，包括知名的知识分子，要划成右派的。需把材料送给他看，经国务院批准后才能划定。

这个规定后来实际上没有能够执行，但周恩来还是力所能及地保护了一些知识分子。康生要把提出“新人口论”的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定为右派，周恩来知道后说：“马寅初这个人有骨气，有正义感，是爱国的，国内外都有影响，不能划成右派。”马寅初由此幸免。

（195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载《萧乾所争的是什么样的自由？》）

在这场运动中遭到冲击的著名作家萧乾，也得到周恩来的关怀。

（萧乾作家）

当时《人民日报》已经开始反右了，我们这些人都会被点了名，那天住在作家协会的书记刘白羽通知我到中南海参加总理接见。当时我还犹豫，我说我现在已经这步田地了，还去吗？他说：总理点名邀请你去，你不能不去。因此我就去了。去了之后看到当时文艺界还有一些被点名的出来了，冯雪峰、丁玲啊。我们这些被点名的都坐在后面。这时候巴金出于对我的同情，也跑到后边来跟我一道坐，谈话安慰我。正在这时候呢，总理进来了，进来第一声就问：老巴呢？大家就回头指着，看到巴金正在跟我谈话呢。总理就叫他坐到前面去。在谈话中间，总理主要谈他自己的地主家庭以及自个儿改造的经过。这时候就把我叫起来了，还是称我同志，问萧乾同志来了没有，我就站起来了。他说，你有一些右派言行，但是还不是右派，希望你认真检查，好好的在群众运动中提高自己。然后我就坐下了。

事后我有两种感觉，第一个是总理希望右派划得越少越好，而不是越多越好。

（毛泽东抽烟）

（毛泽东 1958 年 12 月 22 日在中宣部内部刊物所载清华大学搞“宁左勿右”材料的批示，给陆定一的信）

（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在一起）

反右派运动被严重扩大化后，资产阶级的帽子又重新戴在了知识分子的头上，使他们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与此同时，随之而起的大跃进运动在经济文化各方面急躁冒进，有人甚至提出要村村办大学，每个生产队都要有自己的梅兰芳和郭沫若，都要有自己的李时珍和华罗庚。只是空空的热闹一场罢了。

1958 年底，随着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开始，毛泽东提出了要纠正对待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以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为契机，周恩来从文艺人手，开始在文化、科技和教育领域纠“左”。

周恩来多次召集文艺家们座谈，时常参加他们的聚会，提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民主作风不够。现在好多人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当时正在批评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的人情味，周恩来却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但电影里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以政治代替文化，就成为没有文化了，还有什么看头呢？

一次讲话中，周恩来说到了他的校友、著名剧作家曹禺，说曹禺写《胆剑篇》很苦恼。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反而更胆小了。过去和曹禺谈问题，他拘束少，现在好像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来。

然而，纠“左”是艰难的。有的地方扣住周恩来的讲话不让传达。周恩来曾两次说到：我的讲话，都是从毛主席思想发展出来的，使我难过的是，讲了以后得不到反映，打入“冷宫”，有些省市就不肯传达。这就叫人不免有点情绪了。

（广州外景。背景资料）

就像全党纠“左”在 1962 年 1 月的七千人大会上达到高潮一样，科学文化领域的纠“左”在 1962 年的春天也成为人心所向的普遍趋势。这年二、三月间，在春风送暖的花城广州同时召开了聂荣臻元帅主持的“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文化部召集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这就是至今



让知识分子们难以忘怀的“广州会议”。

聂荣臻元帅后来回忆说：“那次会议的目的，起初是想借‘科学十四条’的东风，搞出一个新的科学规划来。大家集中到广州以后，我先找少教科学家谈心，发现知识分子顾虑很大。有人问我，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提法如何理解？”

（马大猷科学家，广州会议参加者）

总觉得我们解放已经十多年了，大家都认真工作，并且做出相当的成绩，但是一直老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个很不了解，很不理解。

（背景资料）

聂荣臻回忆说：听到这些反映，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先请示了周恩来同志，他说：“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人民的知识分子。”

接着，周恩来和陈毅飞到了广州。广州会议的主持者希望他们在会上讲讲话，给知识分子们打打气。3月1日晚上，周恩来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定调会议。

（龚育之时任中宣部科学处干部、广州会议参加者）

周恩来同志很谨慎。我记得一个会上有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还有陶铸同志，因为他在当地是书记啦，还有聂荣臻同志，还有张劲夫同志，于光远同志，我不记得文艺方面还有什么同志没有，这些领导人坐在一起，召开会议研究。周恩来同志要一个一个表态，你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当然倾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解决的，这些知识分子经过这么长的新中国的新的生活，为这个社会服务，又经过这么多艰难困苦和克一道走过来了，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他表示要一个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表示态度。别人告诉我，陶铸就说我的观点很明确，不能再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叫作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他说，不过我只是中南的负责人，我这只是地方票，不是全国票。这个全国票得周恩来做主来讲。还有聂荣臻同志等，大家都表示赞成。周恩来总理说：那我们这次在会议上就讲这个问题，你们大家都表示赞成，这是我们大家一起讨论通过的，我们大家共同负责啊。这个会议研究之后，第二天周恩来同志在会上做了这个报告。我想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就是针对当时工作里这个实际情况的。

（甘子玉时任聂荣臻秘书、广州会议参加者）

周恩来讲话的全文我背不出来。然后他就说经过十二年锻炼，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有了根本的改变，他们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背景资料）

作完报告，周恩来飞回北京。

他走了，却给与会的知识分子们留下了意外的惊喜。根据周恩来的嘱咐，陈毅元帅和主政中南局的陶铸在会上公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也就是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

（马大猷科学家、广州会议参加者）

这个会开了以后呢，大家回去就非常兴奋，都非常高兴。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买了一瓶茅台酒，大家都喝一杯来庆祝，这是我第一次喝茅台酒。

（背景资料）

（周恩来3月27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式上）

（《政府工作报告》）

飞回北京的周恩来接着投入了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的准备工作。经毛泽东同意，他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写进了这样几句话：“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毫无疑问是属于劳动人民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

（1962年11月26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稿）

半年后，在中央书记处的一次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还是引发了一场争论。有人在会上坚决不同意周恩来的提法。相持不下的时候，总书记邓小平出面作了结论，他说：“一切按总理在人大报告中所说，那是中央批准的。”

（周恩来图片）

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上说的这几句话，深深地刻在了知识分子们的心里：“对待知识分子，一定要承认我们过去有错误，应该道歉。党内我已经道过歉，现在再作个总的道歉”。

## 第六集 曲折行进

（北京清晨街景。5路公共汽车）

（吴宏均出门溜鸟）

北京的早晨，总是从安详和宁静的气氛中慢慢变得喧嚣起来。周恩来和几百万人民一道，就生活在这座城市。

五路公共汽车的退休司机吴宏均和许多老人一样，清晨和黄昏总要出门溜一趟鸟。五十年代，他曾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见到了周恩来，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印象。（背景画面）

（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

（八大会议电影资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在会议上）

正像吴宏均回忆的那样，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社会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

1956年4月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是一篇适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一个星期后，周恩来根据自己的记录在国务院做了详细的传达。后来，整理这篇讲话的时候，还参考了周恩来的传达记录。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大上，中央正式提出：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过去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建设。从此，新中国进入新的探索行程。

（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既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突破苏联的经济槽式，走自己的建设道路，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共同信念。但是，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人们的认识却不尽一致。

周恩来根据综合平衡的原则，主持制定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但不久有的地方在经济建设上便出现了急躁冒进的倾向。周恩来及时给予制止，他说：“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依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很危险”。“发展速度是不是可以放慢一点”，“否则就是把两脚悬空了，不好布局，结果还得停下来。”

周恩来的意见得到中央领导人的赞同，后来，人们把他们的做法称为“反冒进”。

（毛泽东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活动的电影资料）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祝大会，赫鲁晓夫对他说：“我们十五年后可以超过美国”，毛泽东回答：“我们十五年后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当时，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毛泽东很高兴，觉得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加快建设速度，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生产就会大跃进。他从莫斯科打回来一个电话，说1956年的“反冒进”是不对的，以后不要再提“反冒进”了。

（五十年代后期一台当时模样的收音机）

（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

1958年元旦那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号召人们“乘长风破万里浪”。“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争取1958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让全国人民“乘压倒西风的东风前进”！

（社会背景资料）

（南宁会议旧址）

以这篇社论为标志，1958年便成了中国当代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

十天后，中共中央在广西召开著名的南宁会议。

（薄一波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毛主席在会上，拿着那个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写的文章，叫做《乘风破浪，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毛主席面对着周总理说：你是总理，你看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就当面这样批评。这次会议我参加了，周总理在这种情况下，马上答复，我写不出来，因此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

（南宁会议期间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资料）

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南宁会议期间出席一次群众活动的从未发表过的电影资料。

从这些画面里，你看不出什么异样的地方。事实上，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这个时候在经济建设的大思路上已经失去了发言权。

（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苦愚回忆：1958年4月间的一个夜晚，总理在准备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稿时，有一天对我说：这次发言，主要是作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所以这次发言稿不能像过去那样由别人起草，只能是我讲一句，你给我记一句。总理在讲的时候，说得慢。我意识到总理的内心有矛盾，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表达他想说的话。

（乒乓球桌）

（打乒乓球。周恩来打乒乓球的图片）

在这段时间里，工作人员都感觉到周恩来内心有些压力，不忍心看着他在办公桌前发闷，就找了间旧房子，放上乒乓球桌，请他出来活动。

（梅行时任国家计委研究室主任）

我从来没有看到总理打乒乓球，也没看到他做其他活动，我就问总理办公室的其他同志，当时办公室主任叫许明，总理走以后我到许明同志的办公室去了。我问许明，总理今天怎么打起乒乓球来了？许明表现了一个心情很难受的样子，她说你难道还不知道吗？南宁会议以后，经济方面他已经管不了了，不让他管了。总理因为做惯了工作了，没有工作他会很难受。他们好几位秘书同志见到总理坐在那儿发呆，他们觉得很难受，后来他们没有用公家的钱，自己攒钱买了一张马马虎虎，很破旧的乒乓球桌，还买了乒乓球拍子和球，说是在总理心情很不好的时候把总理带到那里去打乒乓球。

（八大二次会议电影镜头。陈云、周恩来发言。毛泽东发言。大会举手）

（1958年6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和周恩来就1956年的“反冒进”问题再次作了检讨。会后不久，周恩来向中央提出，自己担任总理是否合适的问题。6月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认为周恩来同志“应该继续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改变”。现在保留的这份政治局会议记录是由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亲笔记录的。

（阿尔希波夫时任苏联驻中国经济总顾问）

50年代担任苏联驻华经济总顾问的阿尔希波夫向周恩来提出对大跃进的看法。

我感觉到周恩来同志在中国非常难进行工作，大跃进，毛泽东提出来的，

他认为这样可以促进生产的发展，我跟周恩来同志见面时说：“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不要这样做。”我看周恩来同志理解我，有一次，周恩来同志告诉我，他说：“阿尔希波夫同志，我对此无能为力，最好咱们不谈这件事。”我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到，他不赞成这件事。

从1958年春天开始的生产“大跃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期以来贫穷落后的中国人民改变自身面貌的强烈愿望。他们迸发出了从未有过的生产创造热情。他们相信，只要努力，甩掉落后，迎来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周恩来去十三陵劳动的图片）

周恩来也投入到了这场群众运动当中。

邓小平后来曾这样评说：搞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

（报刊载农业放卫星的各种资料）

到今年夏天，浮夸风和共产风也在各地滋长起来了。

这是当时各地争先恐后放生产卫星的报道。拍摄这张照片的记者在一篇谈创作体会的文章里说，这颗比人还大的玉米就像飞驰在天空中的火箭一样，很切合当前放生产卫星的形势需要。八月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大炼钢铁的号召，全民炼钢的热潮迅速兴起。

周恩来对当时用土法炼出的钢铁是否有用深表怀疑，曾让秘韦去当地调查。秘韦告诉他，炼出来的铁大部分是废品。他的办公桌上后来曾放了一块用土法高炉炼出的“海绵锈”。

（顾明时任周恩来的经济秘书）

大概那个时候放卫星，一个是鹿寨放了个卫星，鹿寨是广西省鹿寨，放了一个多少、多大的卫星呢，24万吨升天。所以呢，隔壁的邻省的领导同志，当时就打来电话给总理，开始是我接着的，后来总理自己接的电话，我在旁边。他这样给总理说的：总理呀，现在到处都在放卫星，我们要放呀，不放过不去，我们压力很大。总理就讲我给他说的那个故事，他说：这个炼铁要放卫星，现在都是浮夸的，有很多不行，他说你们不要搞吧，不要这样。对方说：哎呀，无论如何要求你让我们放一个，我们过不去，压力太大。总理总是劝他，以后就放下了，后来还是放了。

（四川大炼钢铁，几百万人上山）

对大炼钢铁造成的资源浪费，周恩来十分痛心。1958年底，他听说四川省有几百万人还在山上大炼钢铁，并且没有冬衣御寒时，果断下令：马上下山。

（周恩来视察农村）

面对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周恩来深感忧虑，但也难以制止。他曾陪一批外宾到成都郊区参观了一个农业合作社。他后来说当时的感觉是：这个社提出的计划指标很高，当时我不敢相信。由于计划是经过全体社员讨论通过的，所以我不能泼冷水，只能表示祝贺，并说，如果在执行中有困难，我们上面帮助解决。

（吴宏均、甘宇平乘公共汽车）

1958年9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跨上了北京五路公共汽车。

（甘宇平时为北京五路公共汽车售票员）

那时候正是天桥剧场散场，上来人很多，我们照顾人上完车，车门关好

以后，我开始售票打戳卖票。卖到单人座这儿，我说同志你买票吗，他说“我买票，买到北海，两张”。我当时把票给他，也没有看他这个人，就把钱收过来。那时都是4分、7分、9分的票了，一毛三、一毛七、一毛五这样的票，卖给他的是9分票，找给他零钱呐，要看他人，我一看呐，很惊讶，这不是周总理吗，我内心里叫出来了，真是从肺腑里叫出来的。这时候，周总理笑了笑，冲我说：小伙子，你们辛苦吧，你们很辛苦吧。我不辛苦。后面好多人都围拢过来。都站起来，过去跟总理握手。总理频频示意，冲他们点点头、微笑。在这个时候，后面有一位乘客说，大家注意安全，注意总理的安全、咱们要安静，这时候，车上就鸦雀无声，都用很敬慕的眼光，羡慕的眼光看着总理，总理就冲大家笑笑，车就走了，我们在天桥拐弯，就奔前面大街那条道走了。这个时候，总理悄悄走到司机老吴身边。我说，老吴、总理在车上呢。是吗？他说。

（吴宏钧时为北京五路公共汽车司机）

后来是老甘过来跟我小声说，在我背后说，总理在后边坐着呢。当时我说不可能，我想不可能，总理怎么会坐咱们的车呢？结果到下一站呢，停了车之后，我住回一看，总理就在第三排座，当时这车左边是单排座，右边是两人的双排座，总理就在第三个单排座上，离司机挺近的。

（甘宇平、吴宏均在公共汽车上）

（吴宏钧时为五路公共汽车司机）

总理后来就从座位上起来，走到前边司机的背后，旁边有个机器盖子，总理就扶着那个栏杆，站在我后头。我一回头，看见总理就在这儿，当时，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当时没有思想准备，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心里就是很激动，光跟总理点点头。那时候开车要求挺那个，不允许说话。就跟总理说，好象是“总理，你好”，就说这个。那时候，司机头上都有一条，司机不许闲谈。……总理就一直站着，在我背后。因为是晚上，司机头上有顶灯，我就一边走车，开一下顶灯，看一下总理。

（甘吴下车。北海车站夜景）

五路汽车驶到北海车站，周恩来下车走了。周恩来在50年代曾坐过两次北京的公共汽车。这天晚上为什么要去乘公共汽车？或许是为了做点调查，或许只是为了散散心。

（周恩来乘江峡轮去庐山。周恩来等在江上轮船上谈笑风生）

1959年6月底，周恩来从武汉乘座江峡轮赶赴江西庐山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从这段锺头里看得出，他和随行人员的心情都是十分愉快的。

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事实上从1958年冬天开始，大跃进的弊端就暴露出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是较早冷静下来的中央领导人。从1958年11月初的郑州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毛泽东就提出要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此后不断发出警告：胡琴不要拉得太紧，拉得太紧有断弦的可能。由毛泽东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目的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

（庐山云雾。与会者游庐山。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开会镜头）

庐山，是周恩来非常熟悉的地方。二十多年前，他几次到这里和蒋介石会谈。如今，又在这里筹划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大事。

在庐山会议前期，说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毛泽东谈到正在养病的

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他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又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制定 1959 年的计划和生产。

一位参加庐山会议的当事人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是当家人，他不能空谈总路线的正误。在庐山上，他始终务实，算经济账，落实 1959 年的经济指标。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

以彭德怀给毛泽东的这封信为标志，庐山会议的主题突然发生了逆转，从纠“左”变成了反右。

（袁宝华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助理）

总理通知我到庐山去汇报钢材平衡情况，我和国家计委的安子文同志两个人一起，坐总理的飞机到庐山去。一到庐山，这个气候就变了。到的当天晚上，一报道，总理就召大家在一起，告诉大家现在这个形势是什么形势，大家说话要小心点，这就避免了在紧要关头干部犯错。总理爱护干部，确实无微不至。

（八届八中全会镜头）

（云雾）

接着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于是，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没有能够实现。

这弥漫庐山的云雾，似乎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困境就要降临了。

（周恩来办公室）

（困难时期的资料镜头）

这时候，一份反映十五个省份出现灾荒甚至饿死了不少人的报告，送到了周恩来的办公桌上。而北京、天津、上海几个大城市也处于只有三五天存粮的危险情况。回到领导经济工作前台的周恩来和陈云焦急万分。

这是一段当年拍摄下来作为资料用的有关北京市民排队购物的镜头。中国的老百姓，开始了凭粮票买粮食买副食品的日子。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恩来和陈云两个人商量，决定进口粮食。当时，这是一个令许多人不能接受的事情。

（雷任民时任外贸部副部长）

周总理访问缅甸前，在飞机场，陈云同志、总理、叶季壮、李先念同志，决定的进口一百五十万吨。所以到昆明以后，外贸部给我来电话，陈云同志决定进口 250 万吨。总理听说后很沉重，怎么一天就有这么大变化，给陈云打电话，陈云同志解释后，总理也很理解，说陈云同志很仔细，非常稳健的一个领导同志，所以总理说，陈云同志要 250 万吨，恐怕这事不能少，少了会出乱子，所以总理感到很沉重。这个时候总理在缅甸访问，第二天快要访问结束时，总理告诉我，你不要随代表团回去，你直接到香港，我让缅甸办手续，直接去香港，了解三个问题：一是有没有粮食可买，二是能不能运回来，第三是有没有能力支付，你去摸清楚回来。

（周恩来工作台历，记录谈粮食问题）

（周恩来为调拨粮食而制定的“哈达表”）

这是周恩来当时的工作台历。上面反反复复记载的，都是谈粮食问题。在粮食最困难的日子里，周恩来曾下令准备几列装满粮食的火车停在交通干线上，随时待命驶向告急的地方。

我们在翻阅周恩来档案的时候发现，从 1960 年 6 月到 1962 年 9 月，他为解决粮食问题的谈话就有一百一十五次，其中还不包括他做出的有关批示

和文件。

工作人员还为他制定了这张从全国各地购销调拨粮食的图表，因为它是用许多张表格粘连起来的，很像藏族人民表达祝福用的哈达，人们就把这张表格叫着“哈达表”。

（1961年9月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周恩来的住处）

1961年9月，中央领导人第二次来到庐山召开工作会议的时候，周恩来就住在这里。他煞费苦心一一解决的，还是那个粮食问题。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周恩来曾找当时的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商谈调拨粮食的问题。

（水静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夫人）

那么他就讲：尚奎同志，我今天来呢，和华东几个书记一家家的谈，我每家都谈一谈，主要是现在中央有点困难。他说现在三年自然灾害，你们是知道情况的，全国特别是粮食紧张的不得了，就是饿死了很多人，很惨的，所以中央很紧张，我很急，我知道你们作为省里头头，你们也很急，但是全国说来，江西还是可以的，过得去，我晓得你们调了十亿斤粮食，我知道。总理数字清楚极了，他说，尚奎，我现在来跟你商量，还要请你增调一点。尚奎就跟他讲：他说江西没有严重的地方饿死人那么厉害，也有很多得浮肿病的，但不是很厉害，我们知道中央紧，我们江西已经支援中央十亿斤粮食，江西也不是大省。总理说：尚奎，我们知道你们对中央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年主要特殊情况是四川，四川是天府之国，出粮食的一个大省，但是今年遭了灾，现在中央粮食调不过来，还要给你们增加两亿斤粮食，还要你们增调两亿斤。尚奎同志说：总理呀，两亿斤粮食现在很困难呀。总理说：我知道你现在很困难，我晓得你的情况，知道你不是没有困难，有粮不调，老表是老实的。总理很好玩的，很爱开玩笑。他说：老表是老实人，我知道你困难，但是你还是照顾大局，还是要支援中央。尚奎说：总理你既然这样讲了，我回去商量，勒紧裤带，两亿斤粮食我得调给你，保证。结果那一年调了十二亿斤粮食，调了十二亿斤粮食。总理很高兴，他说：老表风格高，老表风格高，你这两亿斤粮食要救活多少人啊！

（背景资料）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

要真正走出困境，还必须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

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写下的这篇《十年总结》的文件，说“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是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搞建设，还有很大的盲目性，我们要找出规律。里面还提到：周恩来提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好啊”。

（李鹏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同志……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是充分地考虑了做计划留有余地，第二个五年计划是正确地处理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农、轻、重的比例关系而制定的。但是不幸的是，不久以后，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跃进”开始了，使中国的经济遭到很大的损失，中国经历了三年最困难的时期。到1961年，周恩来同志在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支持下，共同商量，又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

（八届九中全会的资料）

（台历。周恩来在邯郸调查图片）



1961年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把周恩来、李富春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确定为调整国民经济的基本方针。为了落实这个方针，毛泽东在会议上呼吁各级领导干部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1961年搞成实事求是年。

1961年4月间，周恩来来到了河北邯郸地区的武安县伯延公社进行调查研究。一位随行的新华社摄影记者拍下了这样一组照片。

（杜修贤时任新华社摄影记者）

总理在路上也好，挨家挨户去访问也好，都是问农民为什么吃不饱，为什么大锅饭不好，调动不起来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在走道一看，农民确实是非常穷，饭吃不饱。比如总理看到肩上挑担子的，他要试试看，你挑的有多重，这个到农民家里，他坐在门槛上问这个老人讲，你们生活得怎么样。开始人们不敢讲真话。我记得在一次座谈会上，有一个人讲了，如果再吃大锅饭，再过两年，恐怕你们也会饿死。他的这个话我听见了，但具体是什么人讲的，是谁，我也忘了。

（伯延村外景。今天的伯延村人）

（张二廷旧屋及图片）

（周恩来台历记载伯延座谈会一事）

在那次座谈会上对周恩来讲这番话的那个农民叫张二廷，是伯延村的普通村民。村里的人都知道张二廷和周恩来交往的故事。周恩来问张二廷：为什么这样说呢？张二廷回答，因为我们首先要顾自己。一位陪同的地委干部当场说：“这是个落后分子。”周恩来却说：他的话是真理，只有把我们看作自己人，才会说这样的话。他说：张二廷这句话对我教育很大，这是我在调查中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句话。

后来，周恩来和张二廷成了朋友，每年都派人到伯延村看望张二廷。

（周恩来工作台历。向毛泽东汇报的电话记录）

5月7日晚上，周恩来在邯郸将调查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电话汇报，就解散食堂、评工记分、包产到队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七千人大会电影镜头）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通过大量的调查，统一了全党思想，到1962年1月，举行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负责人参加的“七千人大会”。纠正大跃进以来思想方法和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在这次会上达到了高潮。

（吴冷西时任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

那是非常动人的。总理在这个会上做了一个发言，就是怎么样克服分散主义，克服这个不民主，怎么样真正把调整方针落到实处。总理的为人大家知道，他批评人家的时候，首先做自我批评。他就是这样子的。少奇同志代表政治局做批评，主席呢，是自己做自我批评了。总理做报告，他一上来就讲，向大家道歉，因为当时所谓“四高”，是国务院做的决定，所以他说我作为总理，对这个错误也要负主要责任，不能推到中央去，不能要中央来负责。大家非常感动。

（运载大庆原油的火车）

（周恩来视察大庆的各种图片，和钱律华的合影）

七千人大会后，在周恩来主持下，调整经济工作的部署全面展开了。

六十年代初开发的大庆油田是一座世界级的大型油田，这座由我国自己

勘探、自己设计、自己开发的油田，终于使我们甩掉“贫油国”的帽子，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从1962年起，周恩来曾三次到黑龙江松嫩平原的大庆油田，向这些艰苦创业的人们送去自己的诚挚感谢。

（钱律华时任大庆石油指挥部总指挥宋振明的秘书）

当时我们大庆人居住条件很困难，没有房子住，就在地下挖一个大坑，上面搭一些笆叶呀，油毡纸，人就在这地印子里住。后来总理看见这个地印子里走出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头发乱蓬蓬的，满脸粮黑，还领着一个小孩，从这个地印子出来，总理老远看到了，赶紧跑过去了，我们想怎么往那边跑，他原来是看我们大庆工人住的地方。地印子这个东西，可能好多人不太了解，挖个大坑，里面弄个炕，炕这边一个炉子里烧着原油，为啥脸粮黑呢，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大庆空气不象现在这么好，一片粮黑，沙里麻雀都是黑的，脸也是黑，一到油区里面，就是一股油味，所以我们烧的都是大原油块子，一蛇一蛇象帽子一样。……（中间去掉）总理走路很快，步子迈得挺大，直接过去了。过去以后总理就一下看见是我们的家属住在这样恶劣环境下，总理就两手握住家属的手下去了。下去看到下面正在煮高粱米，总理还拉开锅，把锅里面高粱米搅一搅，总理就握住家属的手说：“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当时我们旁边听了很感动，我们是在这吃苦，没白吃，党中央、国务院很关心我们，而且表示亲切的慰问，一再表示感谢。所以我觉得我们大庆吃那么点苦，受那么点累也值得，中央是知道的。

（周恩来1966年第三次去大庆的电影镜头。和王进喜等人在一起）

在大庆，周恩来又结识了一个工人朋友，他就是被工人们称作“铁人”的王进喜。临别的时候，周恩来握着张云清和王进喜的手说：“你们两个钻井队，今年一个队如果打上五万米，给我发电报，我一定替你们向毛主席报喜。”这年，这两个队果然都超过了五万米，周恩来邀请王铁人等登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典礼并请他们住进中南海。

（周恩来会见斯诺资料片）

当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好转的时候，周恩来在北京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斯诺。斯诺问起中国的经济状况，周恩来高兴地告诉他，最困难的日子过去了。

（1964年底到1965年初三届人大电影资料）

（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1964年12月21日，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

参加《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吴冷西回忆说：当时总理就在考虑一个长远的计划，并且写了段话，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四个现代化。中央常委会在讨论这个稿子的时候，总理提出是不是可以把四个现代化写进去，毛泽东说：我已经写好了。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开幕那天，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奋斗目标：“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毛泽东《满江红·和郭沫若》手稿，杭州外景）

面对日益好转的经济形势，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词《满江红·和郭沫若》。毛泽东在杭州把它送给周恩来，诗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吴宏均溜鸟回家）

见过周恩来的吴宏均溜完鸟以后，悠闲自在地往家里走去。谈起五、六十年代，他说那时候好。他或许不知道中央上层当时在建设道路上的曲折探索，但他却一口认定，不管怎样，上面都是为了老百姓，为了他这样的人能像今天一样过上好日子。

## 第七集 九霄揽月

（蘑菇云。美国核试验的场面）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及其惨状）

1945年8月，当美国在日本的广岛扔下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蘑菇云的阴影便降临到了人类自己的头上。

在原子弹爆炸的地方，留下的是一片片废墟。拥有核武器垄断地位的国家自以为掌握了瞬息之间改变世界进程的法码。在加紧进行核试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对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施行核战争的威慑。

（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使用的载有核弹的飞机资料）朝鲜战争期间，美国政府在远东部署了许多载有核弹的飞机，并露骨地对新中国进行核威胁。

（周恩来在苏联谈到）

那时候，和中国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拥有了原子弹，美国自然不敢贸然行动。

然而，爱好和平、谋求独立自主的新中国领导人深知，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是不可能核威慑中依靠别人的保护生存下来的。中国如果不自己掌握核武器，腰杆就永远直不起来。

于是，反对核威慑，打破核垄断，和平利用原子能，便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重要战略思路。

（周恩来、钱三强图片）

为了实现这个战略思路，在周恩来主持下，新中国一成立就咬紧牙关走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1949年，周恩来同意批了五万美元给科学家钱三强，托他到法国请他的老师居里夫妇帮助订购研究原子能的器材和书籍。还托人转告钱三强：“国家这么穷，拿出这些钱来很不容易，中央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周恩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场面。周恩来与钱三强等科学家在一起）

为了推动白手起家的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周恩来设法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开始的时候，新中国对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我国发现的铀矿石）

这是1954年底我国地质部门首次发现的一块铀矿石。

看起来它和一般的石头没有什么两样，但却是发展原子能科学的基本原料，它的出现加快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决策进程。

这种特殊的矿石，引起周恩来极大的兴趣。1955年1月14日，他找来著名科学家李四光、钱三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薄一波、刘杰等，详细询问了我国原子能研究和铀矿资源的情况，然后告诉钱三强：中央要讨论发展原子能问题，你们做好汇报准备，到时候一定要带着铀矿石和简单的探测仪器进中南海，当场演示。

送走客人，周恩来当天晚上给毛泽东写了这样一封信：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

“今天下午已约了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时间谈得较长。……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一下今日所谈。”

（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毛泽东、周恩来等看过的演示仪器）

第二天下午，在中南海举行了周恩来提议召开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主持会议的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的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刘杰时任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副主任）

这个时候，毛主席说：现在呢，我们国家已经发现了铀矿，而且还会继续地勘探，会发现更多的铀矿。那么解放以来呢，我们也培养了一些人才，我们的科学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了，现在我们有了条件，我们应该发展原子能。过去吗，我们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情；现在呢，该抓了。只要是列入了日程，我们一年抓几次，我们相信一定可以搞出来的。

（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

半个月后，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正式通报了发展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决定，他说：“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我们都必须懂得才行”。“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这是一件大事，是一次生产革命”。

随后，周恩来委托李富春、聂荣臻等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十二年远景规划》。组织实施原子能计划，被列为重点学科中的第一重点。

（背景资料）

决策定下来了，首先要解决人才问题。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这方面的专家只有吴有训、钱三强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于是，周恩来想尽办法，争取了一批受到新中国感召的科学家先后从海外回到祖国。他们是：赵忠尧、朱光亚、邓稼先等。周恩来还从高等院校调集了一些相关学科的专家。人们不会忘记也不应该忘记这些后来为新中国尖端科技事业作出贡献的科学家。

当新中国把一大批杰出人才聚集起来的时候，周恩来对他们说：我们发展尖端科技事业，遵循的方针是“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

（钱学森镜头）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携带夫人回来了。他的回国之路，更为艰难和坎坷。

（蒋英钱学森夫人）

有一天是礼拜天，学森呢就拿起笔来，简单地写了几个字，就说我们日日夜夜盼望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但是我们现在被美国政府监禁，不能如愿……那么这封信，我们怎么发出去呢？因为我们四围，日日夜夜都是特务监视着我们，信是学森写的，信封是我写的，我模仿了儿童的笔迹，让他们认不出来，把信寄到比利时我妹妹那里，这样就避免他们的嫌疑，果真信到了目的地。家妹也在报纸上知道我们的情况，她也很着急，她火速把这封信寄到上海学森的父亲那里。学森的父亲收到这信以后，火速转到北京给陈叔（通）老，后来，我们听陈叔（通）老跟我们讲，他收到了信以后，马上给周总理联系说我有急事要报告，那么陈叔（通）老就把这封信直接交给了周总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日内瓦中美大使谈判的时候，王炳南大使就拿着这封信，有这封信在手，当时美国大使还不肯承认，最后铁证如山，美国大使不得不承认，他第二天就给他们的上级联系，所以在第二天，我们就接到移民局通知，说现在我们国家决定驱逐你们全家出境，限你们两周之内离境，就是这样，我们才能够回国。

（钱学森讲课镜头）

对于钱学森的回国，周恩来后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也是值得的。

（钱学森空气动力学家）

1955年我刚回到祖国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年终的时候啊，让我到东北去看一看，学习。因为那个时候呢，东北是中国的最强的一个现代化工业的基地。我转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到哈尔滨。在哈尔滨呢，有一天呢，忽然通知我，说今天晚上，你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庸大将要会见你。我去了，去了就吃饭，吃完了饭呢，陈庸大将就跟我谈谈，谈着他就问我：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庸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钱学森向周恩来提交的《建立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周恩来 1956年2月22日就上述意见书给毛泽东信的手稿）

（钱学森回国后的活动）

钱学森从东北一回到北京，周恩来立刻委托他起草了一个《建立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为保密起见，这里说的“国防航空工业”，实际上就是导弹火箭。

（钱学森工作镜头）

（我国第一枚导弹仿制弹试验基地现场。聂荣臻讲话）

（1962年导弹试验失败的场面）

中国的导弹火箭事业，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具体实施了。今天人们常把原子弹、导弹和航天卫星叫着“两弹一星”。

从零开始的导弹研制和试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62年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导弹试验失败了。

（戚发轫卫星研制负责人之一）

我当时在现场，我当时心情特别沉重，就感觉到我们犯了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就感觉到对不起党和国家，无地自容，但是当时科工委的主任叫王秉璋，他给我们鼓气，说没有关系，失败是成功之母，你们应该总结经验再干。

（1964年导弹发射成功现场）

两年后，我国自行研制的导弹终于发射成功了。

（陈毅为原子反应堆落成典礼剪彩）

（如今的原子弹生产基地和发射基地）

（当年建设资料）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也是中国第一颗导弹火箭的发射基地。它座落在甘肃和内蒙交界的巴丹吉林沙漠腹地。那时候，这里是个十分神秘的地方。

这里是青藏高原，有一块属于青海省海晏县管辖的传统牧区，那时叫“全银滩”，西部歌王王洛滨曾到这里采风，写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1958年，周恩来、邓小平批准在这里建设研制生产导弹、原子弹和氢弹的基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就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

当年，建设者们就这样开始了艰辛的创业。

（原子能资料。苏联专家。风暴袭卷沙漠）

正当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中苏关系出现裂痕。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了援助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协定，并撤走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

（刘杰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在这个时候，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骤然一撤离，首先，他这个设计，有很多设计都是空白，设备供给方面，一半的设备都没有给。还有关键的技术问题，确实有上千个技术问题。那个时候，苏联撤退的时候，专家里边有两种表现。苏联一个专家顾问走的时候，由陈毅副总理亲自送到机场，他表示中国有四大发明，你们也有个“格拉老”，苏联话“格拉老”，意思是你们是聪明的，你们一定可以搞出来。也有的人讲了，说你们已经快进入到技术的真空，不过两年，这些设备都会当作破铜烂铁卖掉，你们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在这个面前，周总理讲我们要坚持自力更生搞下去。那个时候，确实也有两种意见，那个时候正是处于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是不是象这样的事情可以下马，暂停一停？

（背景画面）

在这艰难而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表示：“不理他那一套，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来。”陈毅元帅则风趣地说：即使当了裤子，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从此，中国的原子能事业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

（中央专门委员会会场）

为了加强和统一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1962年10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成立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中央十五人委员会的建议》，《建议》提出，这个工作“最好是总理抓总”。

（刘柏罗时任中央专门委员会办公室专职副秘书长）

30号写的报告，这个（报告）小平总书记马上就批了：“同意，请毛、周、朱、彭核阅。”按着第二天毛主席就批了，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后来少奇同志说：“这件事非总理抓，非总理出面不行，总理出面。”

（专委会正式成立的文件）

（周恩来和贺龙等在一起）

周恩来众望所归地成了这个机构的主帅。它的组成人员中，还包括共和国的七位副总理和七位部长。在此后中国尖端科技事业的发展中，中央专门委员会的成员虽然有所变化，但周恩来终身担任着主任一职，这个机构，也一直是最高的决策和领导机构。

（干旱地裂。当时基地人员吃的窝窝头）

（基地劳动场面）

当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加速发展的时候，正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

这是当年原子弹研制基地的人们吃的窝窝头。它是用沙漠中的骆驼刺和沙枣等捏成的。

怎么能让我们的科学家饿着肚子研制原子弹呢？周恩来当即决定，从青海调来四万只羊，请粮食部一次调拨数百万吨黄豆给基地。又指示商业部和总后勤部在兰州成立二级批发站，专门负责供应西北地区特种部队和核工业部门所需要的生活资料。

（李觉时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

除标准供应之外，中央、周总理调一些黄豆给部队、施工队伍，提供帮助。除此之外，我们自己有一条办法，就是自己生产，这是延安时期的作风，叫做丰衣足食，就是自己开荒生产。开荒生产，高海拔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啦。怎么办呢？种佬东西得有把握才行呀，种土豆总可以吧，种蚕豆总可以吧，种燕麦总可以吧。这是想的一些办法啦。那么另外一个呢，靠近青海湖，捉鱼总可以吧。那么草原上有野生的动物呢，那么打猎总可以吧。大概想了多种办法呢，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通往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控制室的秘密通道）

随后不久，原子弹的验制工作进入联合攻关的阶段。在周恩来部署和协调下，全国上百个部、委，二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九百个工厂、院校和科研机构都程度不同地投入了力量。最忙的时候，核试验的通讯量占全国通讯线路的一半以上。

（车进中南海西花厅）

1964年4月11日，周恩来召集第八次中央专委会会议，他在会上提出，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在9月10日前作好一切准备，具体试验时间由中央常委会决定。不久，中央派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总指挥、刘西尧为副总指挥，前往试验现场。试验之前，按照周恩来绝对保密的要求，他与现场的联系采用了特殊的办法：原子弹爆炸被称着“瓜熟了”；周恩来的代号为“五十一”，罗瑞卿为“六十一”，张爱萍则为“七十

（张爱萍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现场总指挥）

搞这个原子弹，从一开始一直到最后的基地试验这个事情，总理就规定了一条，绝对保密，他就规定，绝对保密，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告诉。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说：你看邓大姐，我也不会告诉他。所以我们这个事情所有人都不知道。总理确实没有告诉邓大姐。最后我们爆炸完了，从基地回到西花厅去，向总理报告具体情况，碰到邓大姐，邓大姐就说：你们这样子好事都不告诉我，我说大姐你不能怪我，总理强调的，他都不告诉你，你不能怪我不告诉你。

（飞机起飞。基地各种装置就位。基地镶嵌周恩来的十六字方针）

1964年10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下达了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就位的命令，并特别强调：第一次核爆炸试验，必须一次成功。

基地顿时处于；临战前的紧张气氛。人们用贝壳把周恩来提出的“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醒目地镶嵌在基地的土坡上面。实际上，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周恩来不是没有担忧。

（刘杰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

在15号的晚上，总理给我打电话，说究竟你现在考虑我们这次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在当时我也是很紧张的了，我说：总理呀，目前根据我的认识有三种可能，第一是干脆利落，第二是拖泥带水，第三是完全失败。我说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1964年10月16日台历。起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过程。）

就像人们后来十分熟悉的那样，1964年10月16日下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进入倒计时。三十多年后，我们不妨再沉下心来看看当时的情景。

下午三点，现场的张爱萍将军等清晰地看到了中国自己的蘑菇云。远在北京坐镇指挥的周恩来也焦急地等待着基地的准确报告。



（周家鼎时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跟总理还有个直接热线电话。那时我在办公室，（接到电话后）去报告总理，当时心情非常激动，声音全有些颤：“报告总理我们原子弹已经爆炸了，爆炸成功了”。总理当时不放心，总理马上打电话给爱萍，能不能断定这是核爆炸，也告诉刘杰，叫他也反馈回去。反馈回去以后呢，张爱萍根据当地的情况，说现在蘑菇状烟云已经升空了，而且还把好多现象也很详细地报告给总理。总理这时如释重负，就马上拿起电话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

（基地欢呼）

（现场喇叭）

同志们，我们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到北京了。周总理来电话，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国务院，向参加这次试验的全体同志们表示祝贺。

毛主席万岁！

（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发表的政府声明）

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毛泽东让周恩来把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面对全场的狂欢，周恩来不得不说：“高兴可以，可不要把地板震塌了呀！”

与此同时，周恩来发表《政府声明》，郑重宣布：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防御，绝不首先使用。

（华盛顿外景。代表性建筑）

国外最先获得中国爆炸原子弹消息的是美国。美国总统约翰逊却声称：中国只不过爆炸了一个小东西。几天后，美国根据可靠情报，又改口说：中国这颗原子弹的当量比他们当年投向广岛的那颗还要大。

（巴黎外景。代表性建筑）

消息传到法国，法国总统蓬皮杜表示：顷刻之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变化。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一天也为期不远了。

（莫斯科外景。代表性建筑）

（周恩来会见记者的图片和电影资料）

有意思的是，10月16日这天，苏联宣布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辞去职务。国际舆论认为，中国是有意把原子弹的爆炸安排在赫鲁晓夫下台的第二天。周恩来则回答说：这完全是巧合。我们怎么能够那样准确地知道他要下台呢？即使知道他要下台，马上爆炸，除非我们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原子弹，像放焰火一样随便放。

（杨振宁回国后的活动画面）

国际舆论不相信这一声巨响是中国人自己干出来的。回国的杨振宁教授也这样问老友邓稼先：听说有外国人参加了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深知内情的邓稼先故意说：我去问问周总理。后来杨振宁这样回忆：周恩来让他转告我：在苏联专家撤走以后，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我在上海接到邓稼先的信，激动地哭了……

周恩来深知，中国人民为了这一声巨响，付出了多么艰辛的努力和代价。但这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他说：如果没有这一声巨响，就不会有人理睬

我们。

（罗布泊）

（美国、苏联等国五、六十年代科技发展，军备竞赛的状况）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主要是解决了核装置的爆炸问题，要真正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还要解决原子弹的武器化问题。于是，把核爆炸装置和运载工具结合起来，也就是把核弹头和导弹结合起来的试验，提到了重要日程。周恩来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提出1965年是“两弹结合试验年”。

（李觉时任核武器研究院院长）

周总理抓得很紧，要求原子弹与导弹相结合，要“小型化”。要安全可靠、要万无一失才行，这是周总理很强调的。他要求，你七机部一定确保不能掉下来啊，你二机部要确保掉下来也不能是原子弹在地上爆炸，所以他要求很严的。为什么？因为在自己的国土上。另外呢，对部队也有要求，对当地的许多工作有要求，这个时候呢，真正准备好了之后，也还得在当时的情况下把老百姓移开，铁路呀，准备火车啦，准备汽车啦。把老百姓移开，也还得有医疗防护呀，卫生部呀，组织医疗队伍，到那个地方去做必要的准备。这是都得要做的。周总理指示得非常具体。

（基地进行两弹结合试验镜头）

在两弹结合试验中，周恩来多次在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凡是有漏洞的地方都要补起来，一点也不能疏忽大意。

1966年10月，我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个地对地导弹东风二号装备着核弹头，等待发射了。

（组织发射场附近的群众撤离。资料同期声）

（读秒同期声。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过程。）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在安全防护方面，指挥部也做了周密的安排，把发射场附近的居民、儿童转移到安全的地区。对敌机的突然袭扰，防空部队处于战斗准备状态。

六十秒至八十秒钟，导弹经过恒温层。

核弹头在预定的靶标上空精确地爆炸了。

（群众欢呼场面）

1966年10月27日的这次核试验，开创了世界上在本国领土上进行导弹、原子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先例。

（周家鼎时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当然原子弹爆炸以后，主席紧接着讲了，我们不仅要有原子弹，而且氢弹也要快。总理在这时候就起了另一个作用了。总理就马上通知，把很多专家就请到北京来了，给大家祝贺呀，敬酒呀，在这个会上呢，总理又给这些专家提出问题，传达了主席的这种决策、指示、决心，然后呢就说你们各个工业部门，各个科学专家要连续作战，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不要放松。

根据周恩来提出的加快氢弹研制步伐的要求，核工业系统制订了争取1968年进行第一颗氢弹试验的计划。

（朱光亚时任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

那天总理是在北京电话机子旁边，时刻听，听到了我们的消息。按道理，我们叫着水下瞄准那么一圈一圈，到了什么时候就该投了，结果投不下来，这个弹怎么投不下来，总理说沉着，再来一次，总理是在北京指挥的呀。因

为我们那位空军的一位司令员，兰州空军的一位司令员，他指挥，这是军事行动，等于是，都是及时向上报告，再一圈，还下不来返航，于是飞机就回来了，带着它就回来了，就回到起飞的飞机场。大家进防空洞，我说用不着进防空洞，没事，我们也还准备了个小队伍，就是回来了，怎么把它卸下来，怎么检查，我们这个都准备好了，当然是肯定是我们工作里不知道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所以是很平安无事，所以那次一个副产品就是我也做了。

（第一颗氢弹爆炸过程）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试验成功，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美苏宇航事业发展的电影资料。宇航员登月）

就在我们研制导弹、原子弹和氢弹的时候，1961年，苏联的“东方”号宇宙飞船载着加加林进行了人类第一次太空飞行。1969年，美国的“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在月球上着陆，实现了人类的一个古老梦想。

（背景画面）

中国的核试验和导弹发射的成功，也为研制人造卫星、探索太空奠定了基础。1965年8月，周恩来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原则批准了由钱学森、赵九章等人提出并制定的发展人造卫星计划。

然而，正当人造卫星计划大力实施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航天事业也受到了干扰。

为排除干扰，周恩来果断决定：原先由中国科学院领导的人造卫星工程改由国防科委直接组织领导，并提出对科技人员要加强保护。

（钱学森空气动力学家）

那个时候呢，文革中，所以就组织军管会，那么周总理就见了这个军管会的负责人，见了以后交待，说这有一个名单，科技人员的名单，名单上每个人你们要保证他们不出事，出事我就找你们。

（研制卫星的科技人员）

当时，周恩来对七机部的政委杨国宇将军说：“国防科研由钱学森挂帅，你是政治保证，钱学森和其他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又说名单中需要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如果有人要侵犯他们，抓走他们，你们可以用武力进行保护。

（卫星组装情况）

1970年4月，周恩来两次从卫星发射场把有关负责人员召回北京。

（戚发轫时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试验队队长）

当时周总理给我们明确提出要求，这颗卫星一定要看得见，要听得着，要抓得住，就是说一定要稳妥可靠，万无一失，一次成功。那么我当时作为卫星技术的负责人，作为卫星试验队的队长，就和一些老专家，象任新民。杨南生一起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非常仔细地问，我们这个卫星是不是上去以后就可以播放《东方红》乐曲，到底有没有把握。当然我们心里很矛盾，做了这么长时间试验的工作，应该说我们心里还是有把握的，但是就是说我们还是第一次，从来没有做过，也觉得很恐慌。我们还是讲，很好地反映了我们现在的这个情况，说还是有把握。另外，总理确实实亲自记所有的结论，所有的测验参数，他都问到，而且自己记。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他没带秘书，他自己记。

（卫星发射前总检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这颗人造卫星就要发射开空了。正在做发射前总检查的人们按到了周恩来从北京传来的话，他要求卫星发射做到“安全可靠，万无一失，准确入轨，及时预报”。还说，“一颗螺丝钉都不要放过。”

（孙家栋卫星研制负责人之一）

当时就有一个非常为难的事情要处理。这个高技术产品……每一克重都是非常可贵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参加这方面工作的人，很多基层研制人员，包括工厂的老师傅，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都在自己的产品上，好比说一个仪器，外头都镶着一个很大的非常漂亮的毛主席的纪念章，同时呢，不仅仅做得非常严肃，非常漂亮。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也很清楚，也很难提出来，说是应当装，还是不应当装。在那种政治气氛情况下，到那给总理汇报的时候呢，我当时自己的心情，对这个问题也是很紧张，感觉到从技术保证质量这个角度讲呢，一定要给总理汇报，请示总理看这个事情怎么办。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思想又是有一定的压力，感觉到提这样一个问题，妥呢，还是不妥呢？但是最后呢，我感觉这个问题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最后还是向总理汇报了，我就提出了。当时总理听得很认真，同时态度也很严肃。他立即说，你们这个搞科学技术的，要严格地按科学的规律来办事情，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的粗心大意，尤其是这样高科技的产品，更要严格地按这样一个态度来办事情。

（发射场。各地民兵守护沿途线路）

周恩来提出的“按科学规律办事”的要求，被贯彻到每一个岗位上。

为保证卫星通过地区通讯线路的畅通，沿途各地还组织了上百万民兵对通讯设施进行守护。（准备、点火、发射过程。同期声）

1970年4月24日晚上，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了。

正像周恩来要求的那样，这颗卫星既看得见，又听得着。

中国终于把自己的声音送上了太空。

（《东方红》乐曲同期声）

（夜色中的青藏高原）

当这颗卫星挟带着《东方红》乐曲飞越青藏高原上空的时候，一个叫贡布扎西的藏族青年写了这样一首诗：

多么近啊！

险些擦破了帐篷。

要是伸长炽热的双臂，

就可以把她搂抱亲吻。

……

遥望祖国会唱歌的星，

像藏家的歌化入飘荡的霞，

光明在我心头萦绕。

（北京天安门夜景）

据说，毛泽东从周恩来打来的电话中听到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时，一下子扔掉了手中的烟头，兴奋不已他说：“好，太好了！总理，准备庆贺！准备庆贺！”。

（毛泽东、周恩来1970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

1970年5月1日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参加发

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人员代表。和广场上的人们一起观看了通过广场上空的卫星。

（我国核电站建设情况的画面）

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之前，1970年2月8日，周恩来又提出了另一个目标。他说：我们发展原子能的最终目的是和平利用，我们要建设核电站。从这一天起，一个被命名为“七二八工程”的核电站建设计划，拉开了帷幕。1974年，周恩来最后一次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会议，讨论的就是秦山核电站工程的建设问题。

（火箭、导弹和卫星发射基地）

（周恩来1965年7月到基地的电影资料）

周恩来曾多次到国防尖端科研基地视察。有一次，他利用出访归国的机会再次进入卫星发射基地。

这是基地人员拍摄的电影资料。当时他们拍了两个多小时，但洗印的时候毁坏了，只保存下来这一段。

从画面看出，合影的时候，周恩来坚持要那些基地的功臣们到中间来先坐。

而这些功臣们知道，作为领导中国尖端科学技术的主帅，周恩来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 第八集 魂系海天

（香港各界 1950 年庆祝新中国一周年国庆的资料镜头）

（字幕：1950 年 10 月 1 日香港）

（资料片原声解说）

1950 年 10 月 1 日，香港同胞以前所未有的热烈的心情庆祝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那天，全香港都张挂着国旗，象征着香港同胞在祖国召唤下的伟大的团结。

（1950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登上天安门检阅）

（字幕：1950 年 10 月 1 日北京）

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欢渡节日。千里之外的南国香港，同样是他们心中所牵挂的一件大事。

新中国从来不承认上个世纪英国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但是，为了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经济地位，也为了防止美国插手香港问题，周恩来作出明确指示。

（五十年代的香港外景）

（李后曾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党组书记、秘书长）

当时呢，周总理就在内部谈过这个问题，就是说与其让英国拉着美国一道来共同防卫香港，就不如把香港留到英国人手里，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第二个就是从我们国内本身需要来说，有这么一个特殊的地方，对中国有好处，有用。

（周恩来办公室。地球仪。周恩来批示的第一批关于香港问题的文件）

开国之初，中国政府关于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基本决策是“暂不收回，维持现状”。后来，又正式确定为“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

这是周恩来 1950 年起草的有关香港问题的第一批命令。他说：维持现状并不是不管不问，否则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子孙。

（50 年代初的一列火车进前门火车站。周恩来办公室）

（黄作梅图片并打字幕）

这时候，一列火车驶进了前门车站。新华社香港分社的负责人黄作梅被周恩来召到了北京。

周恩来告诉他：“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的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暂时不收回香港，不是妥协，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香港可以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

带着中共中央的明确决策，黄作梅离开了北京。

（英国工党代表团离开伦敦机场）

（周恩来、毛泽东和英国工党代表团握手谈话）

（报载消息）

1954 年 8 月，英国工党代表团离开伦敦飞往北京。当他们登上飞机的时候，心情或许还有些忐忑不安。这是西方重要政党第一次访问红色中国，其使命也非同一般，是要摸摸中国政府对香港和台湾政策的底牌。

出乎他们的意料，在欢迎宴会上，品尝着中国的茅台酒，周恩来和他们谈得非常融洽，全然没有外交场合常见的那种刻板和拘谨。

接着周恩来又把他们带到毛泽东那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分别的时候，毛

泽东亲自把他们送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大门口。

回去后，这些亲身领略到新中国领导人风采的政治家说：“世界和平离不开中国！”

（周恩来约见香港总督葛量洪的台历。葛亮洪图片并打字幕）

（西花厅。会谈纪录）

1955年10月，香港总督葛量洪作为英国驻华代办的私人客人来到了北京。当时，葡萄牙正准备大规模地搞一个庆祝澳门“开埠”四百周年的活动。这次谈话，周恩来看上去十分激动。他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一个挑衅，这不仅会刺激在澳门的中国人的感情，也会刺激在香港的中国人的感情。我们迄今没有提澳门问题，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忘记这个问题。

葛量洪回去后，把周恩来的态度告诉了澳门总督，使他们取消了原来的庆祝计划。事实上，葛量洪也许体会到，周恩来对他说的不只是澳门问题，而且也是指的香港。

（中南海紫光阁。《大公报》载周恩来会见港大教授消息。谈话记录）

送走葛量洪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在中南海里的紫光阁，同来自香港大学的客人们讨论如何增进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他说，听了你们的介绍，我们现在应该在那里多吃一些和平工作，香港是大有可为的地方。一位青年问他：“香港的问题怎么办？”周恩来回答：“香港问题我不能肯定地说，今年你才二十一岁，到八十岁还有六十年，总有一天，你会看到香港问题得到解决的。”

（字幕：中共中央档案馆库房）

（保管员现场开柜。同期声）

这是我们中央档案馆保管党中央档案的一个库房，这个库存只是保管1950年到1978年党中央的档案，其中总理的材料就有六万多件。

（1957年4月28日周恩来谈话纪录）

（五十年代上海和香港社会景观镜头）

在沉睡的六万多件周恩来档案中，我们查到一份1957年4月28日他在上海同工商界人士的座谈记录。

参加座谈的人向周恩来反映，香港的资本家大多是从上海去的，他们觉得内地管得太紧，工商界的一些人有钱也不买汽车。荣毅仁家族买了两辆新式汽车，也不敢坐，就是怕招摇。周恩来表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工商界应该有汽车，否则香港资本家会奇怪：内地的汽车怎么都是机关的？我们千万不要歧视港滨同胞在内地的亲属。总之你们在香港有很多朋友，要帮助政府多作工作。

在这次座谈会上，周恩来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达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他说：香港的主权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来的。我们这样大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工业化，对香港一定会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香港要完全按资本主义制度办事，才能生存和发展，这时我们是有利的。我们在香港的企业也要适应那里的环境。

（熊向晖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

他的理论不表现在他有什么哲学著作，而表现在他的理论是指导实践的。他有很多的很简单的话，就是起到理论指导的作用。比如在五十年代，香港我们有些企业，中国银行，华润公司，怎么办？总理就两句话：社会主义个业，资本主义经营。不仅过去适用，现在适用，这“五十年不变”的社

会制度还是适用。

（1963年香港缺水惨状的电影资料）

这是个让香港居民想起来都十分后怕的日子。

1963年，香港陷入了供水危机。为了祈求老天降雨，连庙里的和尚也动员起来了，但仍然无济于事。香港眼看就要成为一座死城。香港当局和各界知名人士联名向广东求助。广东省政府开始酝酿从东江引水到深圳的石马河供水工程。但是，钱从哪里来呢？

这时候，周恩来飞到广州。

（刘兆伦时任广东省水电厅厅长）

1963年12月8号那天，是个星期天，总理访问北非，经过广东。总理是一生操劳的啊，那天还下去转了一下子，到中山县走了一下。回来大约是中午，吃过午饭在陶铸家里，我就把方案详细地向总理汇报了。总理呢，他既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对水利非常在行的一个行家。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呢，他就赞成第三方案，说这个方案好。就是我们讲的石马河梯级供水方案。这个方案一个可以奠定基础，一个还可以发展。

（广州陶铸旧居。谈话记录）

在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家里的这次谈话中，周恩来说：向香港供水要和政治谈判分开。石马河供水工程不要让香港当局来举办，因为香港三百万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刘兆伦时任广东省水电厅厅长）

所以他（周恩来）指示国家计委要支持，从援外专款里面给了我们3800万块钱。那么，物资的调运有些靠火车，有时紧急还要靠飞机，全面支持。所以总理在那次的拍板是个关键。

（水库工地。《我们走在大路上》歌声）

被香港同胞称为生命线的石马河供水工程，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这时候，周恩来又开始布署另一条通往香港的生命线，他批示开通了至今还在运行的向香港输送鲜活和冷冻食品的三趟快运货车。

（六十年代香港腾飞外景）

（1984年12月11日香港《文汇报》载麦里浩文章）

正是从六、七十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迎来了腾飞。担任过香港总督的英国勋爵麦里浩曾经表示：在我作为总督的岁月中，我发现中国政府及在香港和广东的官员一贯地并且增加着对香港提供帮助。

（解放军在边界线巡逻。字幕：六十年代的粤港边界）

（大陆关于香港的社会情况的图片展览）

（西花厅）

然而，一条小小的深圳河仍然把大陆和香港隔成了两个世界。这种距离不仅是空间上的，也是心理上的。那时候，人们只能根据一些图片展览来了解对方。

这时期，周恩来出面邀请了香港一些知名人士来大陆参观访问，同时又向香港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使者。1963年，当京剧演员马连良、赵燕侠、张君秋等人要离开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把他们请到了自己的家里。

（张君秋京剧表演艺术家）

每次见到总理呀，都特别的亲切。我就记着总理说过这么句话，他说你的女儿在香港干什么呀，我说，在我回来的时候，她正生病，所以没把她带



回来，现在她在那儿念书呢。总理说：哎，这次去，把她带回来念书吧，香港咱们总归要收回的。等香港收回的时候，我整一百岁。我就记得总理这句话最清楚。

（香港总督在总督府宴请张君秋一行）

（“文革”中人群围攻总督府图片和北京火烧“英代办”图片）

（周恩来出席工人体育馆大会的镜头）

（周恩来同人谈话的电影资料镜头）

这次演出，在香港引起了轰动。香港总督柏立基特意把周恩来派来的客人请到自己的官邸。然而，在场的人谁也想不到，三年后，这里被愤怒的人群包围了。

“文化大革命”中，港澳地区的工作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香港和北京先后发生了围攻“总督府”和“火烧英代办”的事件。忧心忡忡的周恩来为了纠正造反派的过激行为，当晚联名广播，反复劝说，并派解放军进行保护。他还当面指责造反派：你们是不是打算明天就要收回香港。他强调，在外交关系上还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晚年图片）

（周恩来会见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霍姆电影资料）

这时候，周恩来已步入晚年。晚年的周恩来更加关注着香港的前途，考虑着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

1972年，他先后会见了英国保守党议员汤姆森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来访人说他们不知道中国在香港条约期满后采取什么政策。周恩来果断地回答：割去的领土总要收回来。但中国的政策不是急急忙忙地搞那些事，到时候我们会同英国谈判，不会采取突然行动。条约到期了一定要谈判。将来的谈判要着眼于时代的发展。

（晚霞）

（周恩来工作台历特写：中午十二时，叫起床。下午一时陪主席见希思一行。）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会见希思的电影资料）

这是周恩来当时使用的工作台历。1974年5月。刚刚下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访问中国的时候，周恩来已经病重。

见面时，毛泽东对希思说：我们之间就剩下一个香港问题了。接着问周恩来还有多少年，周恩来回答说还有二十三年零两个月。毛泽东感慨地说：我是等不到了，周恩来说，我也肯定见马克思去了。毛泽东说这是年轻人的事，由他们去解决吧。

（周恩来、邓小平同希思会谈）

（1984年邓小平出席中英签字）

（1997年7月1日江泽民出席香港升旗仪式）两天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和邓小平再一次同希思进行了会谈。

参加这次会谈的邓小平，后来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思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使香港问题得以顺利解决。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人的继续努力下，1997年7月1日，五星红旗终于在香港升起，实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中国领导人的夙愿。

（夜景。海上明月）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香港回来了，台湾却依然人为地阻隔在大海

的那边。

（片花）

（西花厅夜景）

（周恩来同期声）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事实。美国政府参加签字的《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也都肯定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已经在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正式归还中国，并且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接管。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正象他们解放大陆一样，完全是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不得干涉。

（杜鲁门视察海军。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

（《人民日报》载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的《声明》）

然而，美国政府就是要干涉。1950年10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两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台湾地位未定。并下令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用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

第二天，周恩来发表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必将为从美国侵略者手里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

（美军在台湾。美蒋签定《共同防御条约》）

（台湾备战镜头）

三年朝鲜战争停战后，世界的视线再一次集中到台湾海峡。1954年，美蒋签定《共同防御条约》，为两岸的统一设置了更大的障碍。台湾岛内，扩军备战；海峡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周恩来在国庆五周年大会上讲话同期画面）

海峡这边，新中国迎来了五周年的国庆节。

（周恩来讲同期声。只选择下面几句）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一定能够得到全世界进步人类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胜利。中国人民一定能够解放台湾，彻底完成全国的统一！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天安门阅兵）

（游行队伍中各种“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大型标语）

在国庆阅兵和群众游行队伍中，“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解放台湾”，成为了中国人家喻户晓的神圣事业。

（报载周恩来声明。解放一江山岛的资料镜头）

（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的资料镜头）

1955年，在毛泽东、周恩来周密部署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国民党军队占据的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一时间，国际上舆论纷纷。美国和台湾当局四处宣称中国好战。

这时候，周恩来正好赶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与会国家对中国的做法也很不理解，觉得朝鲜刚刚停战，台湾海峡不应该再度出现紧张局势。有人还当面问周恩来：这不是又要和美国打起来了吗？

（浦寿昌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在亚非会议期间，开了一个小型会。当时五个发起国和泰国、菲律宾，七个国家，加上我们，八国外长，在印度尼西亚外长家里开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呢，就是专门讨论台湾问题。

在这个会议上，总理就把台湾问题的来源始末讲清楚了。这些都是他们

闻所未闻，根本不清楚的，闻所未闻呵。另外，我们一般讲台湾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必须分清楚。一个是国内问题，一个是国际问题。什么叫国内问题呢，台湾是中国领土，我们有权解放，采取什么方式解放是我们自己的事，外国无权过问，这是国内问题，是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国际问题，美国现在军队就在台湾岛上，他占着我们台湾岛，阻止台湾跟大陆的统一，不断地制造紧张形势，这是个国际问题。什么叫国际问题，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始终建议，坐下来通过谈判解决。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可是又互相关联的问题。就是当作国内问题，我们也愿意采取和平统一的方式。可是美国站在那儿阻挠我们，那我们和平解放的路就被堵住了。

总理这样一讲，就完全清楚了。在座的其他七国的外长说，你是不是在会后能够发表一个声明？总理说可以呀，三句话。他从会场上出来，就口头对我讲，我准备讲这么三句话，因为没有书面的，记者就在外面等着呢，见着记者，这三句话就要译出来，你记住。第一句话，中国人民跟美国人民是友好的；第二句话，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第三句话，中国政府愿意跟美国坐下来谈判，以和缓远东的紧张局势，特别是和缓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就这么三句话。

（中美华沙谈判资料镜头）

从1955年8月1日开始，中美两国终于坐了下来，就台湾问题先后在日内瓦和波兰首都华沙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大使级谈判。

（周恩来答英国记者格林的同期声）

格林：看起来，只要台湾问题，或者按我们的说法叫着“胡磨沙”问题不解决，中美关系就不可能有根本改善，我说的对吗？

周恩来：对！如果美国继续侵占台湾，中美关系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善。请你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国家侵占了美国的长岛，美国能同这个国家改善关系吗？中国政府一贯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用武力威胁。中国政府甚至愿意同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美国政府坐下来谈。中美大使级会谈正是在中国的创意下举行的。但是，由于美国政府坚持武力霸占台湾，会议延续了五年，开会达一百次，至今尚无结果。

（周恩来会见英国麦克唐纳）

这期间，周恩来多次告诉来访的英国客人：几年谈判，美国总是要求我们不以武力解放台湾，但我们绝不拿原则作交易。我们可以等待时机。美国人一直想摸我们的底，你们可以把我的话告诉你们的美国朋友。

（陈诚赴美国访问的电影镜头）

稍后，台湾当局的二号人物陈诚到了美国。美国人把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给他看了。这位从黄埔军校起就同周恩来建立了个人友谊的国民党将军却说：“中共拒绝美国的一切建议，而坚持美国舰队以及一切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的风度。”

（五十年代大陆抓台湾特务的电影镜头）

（穿军装的蒋介石讲话同期画面）

提高警惕，严防特务破坏，曾是大陆沿海一带的军民非常熟悉的生活。

蒋介石一直没有放弃武力反攻大陆的念头。1955年10月10日，他对台湾军队发表了演说——

（蒋介石讲话同期声）

大家到台湾来，已经过了六年的国庆日。要你们锻炼好身体，磨练好你们作战的技术。有那一天，要收复大陆，驱逐俄寇，消灭赤匪，来完成我们反攻大陆，复国建国的使命。

（周恩来 1956 年 1 月 30 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讲话画面）

三个月后，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也发表了讲话。

（周恩来讲讲话同期声）

我们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一切爱国人士，必须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争取继续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和巩固世界和平而奋斗！为努力完成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而奋斗！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

（周恩来讲话时的听众反映）

（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会见马坤的谈话纪录）

细心的人也许发现，周恩来在这里使用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字眼。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变，在不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开始考虑和平统一祖国的途径了。

1956 年 3 月，周恩来在西花厅会见了一个叫马坤的英国人。马坤是一个中国通，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保持了几十年深厚的交往。他说读了周恩来 1 月间关于台湾问题的讲话，感到太好了。周恩来说：请你向蒋介石转达几句话，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他认识毛主席，也认识我，我们同他合作过两次，今天我们也是主张和谈的。他可以保持台湾的现状，主要的使台湾成为祖国的一部分。他如果作了这件好事，就会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我们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

周恩来还让马坤给孙科传话：大陆欢迎他回来，我们不愿意让孙中山的儿子长期地留在海外。

（1957 年 4 月 7 日《人民日报》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出席欢迎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的酒会的报道）

（在招待伏罗希洛夫的舞会上，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跳舞镜头）

1957 年 4 月，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访问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特意为他安排了盛大的晚会。

这周而复始的舞步，似乎预示着一些历史的运行法则。

在另一次酒会上，周恩来特意安排回到大陆不久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参加，话题转向了台湾问题，周恩来说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接着明确表示：我们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中国政府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在中南海开会、谈话）

（我军战士用望远镜观察金门备战）

（蒋介石游览阿里山、日月潭。蒋介石在台湾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上）

（台湾外景）

（北京解放台湾的游行。周恩来出现在天安门上）

随后，在周恩来主持下，和台湾上层的联系工作便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说：我们和台湾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民族精神，都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不可分裂的一部分。对台湾当权者，中国共产党不再纠缠

历史的恩怨。在同有关人员接触时，他甚至谈到对台湾首脑人物的安排，提出：“蒋介石当然不要做地方长官，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陈诚如果愿意到中央来，当不在傅作义之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来。”毛泽东后来也说：蒋介石还是一个民族主义者。

这种对话渠道，即使在1958年发生金门炮战，台湾海峡再度出现危机的时候也没有停止下来。

（章含之章士钊之女）

所以从我们一般的人来看，好象是两岸的关系特别紧张，台湾和大陆又打炮，又什么的。可恰恰在这个时候，我们当时的老一代的无产阶级的领导人就想到跟台湾谈。当时想到的一个中间人就是我父亲。我想选我父亲，因为有一个原因，我父亲的政治色彩是个无党派民主人士。所以孙中山开玩笑说，同盟会与章士钊的关系是“陪了夫人又折兵”，父亲也没有参加同盟会。我父亲一生都不参加政治党派。正是因为他这种色彩，所以总理就说，章士钊非常适合做国共两党之间的工作，做两岸之间的工作的。

当时我父亲联系的都是蒋介石周围的一些元老，比如说于右任是他的好朋友，他联系的都是于右任这样一些元老。我父亲每两年去一次香港，每次去大概都要住半年以上，任务主要是跟台湾联系。实际上我父亲当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工作他都直接向总理汇报，都是从香港直接汇报给总理。

（厦门和放气球的资料镜头）

50年代后期，在海峡两边来来往往的宣传战中，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精心起草了好几份《告台湾同胞书》。

（福建前线对台广播的电影资料画面和同期声）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军民同胞们，我们完全明白，你们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甘心做美国人奴隶的只有极少数。同胞们，中国人的事只能由我们自己解决，一时难以解决，可以从长商议……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开会镜头）

（1959年释放原国民党战犯的电影镜头）

（周恩来和原黄埔军校学生在一起）

1959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分批释放在押的原国民党高级战犯。

在这些昔日战场上的对手当中，就有杜聿明、郑庭笈、宋希濂、邱行湘、杨伯涛等十一个周恩来的黄埔学生。当他们以新中国公民的身份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百感交集，说的第一句话是“学生对不起老师，走错了路”。周恩来回答说：也不怪你们，是老师没有把学生教好。随后一个一个地询问他们出来后的打算。为了庆祝学生们获得新生，周恩来特意邀请他们一起开心地游了一趟颐和园。

（怀仁堂）

（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镜头）

（火车行进）

中国政府的和平呼吁和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在海外引起的反响是可想而知的。对台湾当局自然也有所触动。

台湾当局表示：今后不用红色中国、共党中国，而称中共政权。提到他们自己，不再称自由中国而用中华民国。60年代初，蒋经国又托人表示：不

再派人到大陆进行敌对活动，还说进一步派人到大陆谈判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的。

（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这个时候，由张治中先生给台湾当局写了一封信，正式地传达了当时我们对台湾工作的“一纲四目”方针。所谓“一纲”就是台湾必须归还祖国，必须统一于祖国。所谓“四目”，就是除外交外，一切军政人事，由台湾当局定，这是一“目”。第二“目”呢，就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尊重台湾当局的意见。第三“目”，就是台湾的经济不敷支出，由中央拨付。第四条，就是相约互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大海浪涛拍岸）

周恩来还在这封信的背后写了这样四句话：“局促东南，三位一体。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中山县外景）

（周恩来和当时的工作人员合影）

“一纲四目”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概括出来的。1963年12月，他又专门到广东中山县孙中山的故乡向台鹰派来的一位客人具体阐述了“一纲四目”的内容。

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

（台湾外景。陈诚的图片及其病逝报道。陈诚遗言）

那位台湾客人还带回去了周恩来送给正在患病的陈诚一些药品。1965年陈诚病逝前，向蒋介石进言：对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为外国动用台湾兵力，不能信任美国。在遗言中，他既没有提“反共”，也没有说“反攻”。

（李宗仁在上海虹桥机场走下飞机。周恩来迎接）

陈诚病逝几个月后，1965年7月18日，当过国民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回到了大陆。有人说，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国政府改造了一个皇帝——浦仪，争取了一个总统——李宗仁。

李宗仁的回国，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

1961年，他曾托人带回十二箱古董，传说说他当年在北平买的时候花了十一万美金。

（罗青长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周恩来办公室主任）

故宫博物院的专家鉴定的时候，说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最多值三千美金。我们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说给三万美金。结果这个报告转到毛主席那儿，毛主席说，恩来同志，你一辈子做统战工作，这是人家投石问路，又不是做买卖。他要11万，叫李先念，李先念当时是财政部长，拨现金，当时拨的是12万美金。据说事后李宗仁讲共产党是识货的，毛泽东就说他是投石问路嘛。把古董给共产党，这其实是一个政治买卖。

（周恩来出席欢迎李宗仁回国的宴会）

（丁国钰时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

李宗仁所以能够回国，从头至尾都是由周恩来总理安排的。总理给我的指示呢，就是说李宗仁要回国，这是件大事情，决定他在卡拉奇下飞机，由你负责把他接到大使馆，然后呢，再找适当的时间，把他送回国内。这个任务很重，必须要保密，保证安全。

那怎么办呢，我找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总经理，这个人是为中巴友好

做了很多工作的，是中国的一位友人。我就告诉他，我有一位朋友，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要到卡拉奇来看我，但是他走路有困难，我想把我的汽车开到机场的停机坪，在悬梯下面把他接回来。他当时考虑了一下子，但很快答应同意。

（接李宗仁的时候）我们就前头一辆，后头一辆，我在中间，我们三个车就开到了大使馆。这样子呢，就避开了巴基斯坦的海关，既保了密，又保了安全。到了大使馆以后呢，我们就打电报报告国内，说李宗仁已经安全到了大使馆。

李宗仁先生也知道，这个行动本身带有很大的危险性，所以他们也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就想法子来缓和他的情绪，使他们能够松弛下来。他们夫妇和程思远先生跟我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吃饭，一块儿聊天，什么都聊。

在决定回来过程当中，接到国内的电报，说国民党准备在中途破坏，准备在缅甸上空，就是在金三角，要击落李宗仁坐的这架飞机。当时我看到这个电报，连我的夫人也没敢告诉，告诉她，她紧张啊。当然更没有告诉他们了，程思远、李宗仁他们都不知道。

当我们在巴基斯坦起飞的时候，总理就到了上海，他就没有睡觉，他一直观察这架飞机的动静，直到这架飞机到了昆明以后，他老人家才开始休息。

（李宗仁 1965 年 7 月 20 日在北京机场宣读声明）

台湾省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绝不允许美国霸占。吾党同志继承孙中山先生爱国反帝的革命遗教，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两次合作的光荣历史。深冀我留台国民党军政同志凛于民族大义，也与我采取同一步骤，毅然回到祖国怀抱。

（周恩来在北京宴请李宗仁）

（1969 年 2 月 2 日《人民日报》关于李宗仁病逝的报道）

（李宗仁致毛泽东等的信原稿）

1969 年，李宗仁在他病逝前，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从海外回到祖国这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

周恩来说：这封信是一个历史文件。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两国经过将近二十年的谈判，于 1972 年发表了《上海联合公报》。美国政府终于正式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林丽蕴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当时呢，周恩来总理就很开心地，在签署完公报后。外宾都走光了以后，总理说，我们大家去看看台湾厅。我理解当时总理呢，虽然谈判已经实现了，已经圆满地达成协议，也发表了公报了，但是他老人家的心里还是在那里惦记着台湾问题的解决。当时的台湾厅，放在人民大会堂二楼的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房间也比较小，房间不大，而且还有几根柱子。我记得一次在那里举行纪念台湾“2·28 起义”座谈会的时候，也因为柱子的干扰，要照相也比较困难。总理当时就关心台湾厅要改个厅的问题，他当场就指示应该把台湾厅放在将来便于接待台湾同胞的更加方便进出的位置，而且要建成更加大的厅。

（人民大会堂台湾厅长镜头）

（周恩来 1975 年 9 月 4 日批示的文件）

人民大会堂里的台湾厅很快就改建好了，但是，周恩来却一次也没有使用过。这时候他已经病重住进了医院，办公室也设在医院里面。

1975 年 9 月 4 日，身患绝症的周恩来于弥留之际。躺在病床上批示了他一生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最后一份文件。在这份文件的后面，他一连写下几个“托”字。

（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1975 年 12 月 20 日，早晨七点，我接到周总理医疗小组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周总理醒来以后，几次提到要见见我。我去了以后，总理说：青长，我平时不病，没想到这次病成这个样子，我还能够看到你。他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有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

（周恩来病房走廊）

（周恩来画外音）

一切爱国者，一切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应当共同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



## 第九集 心忧神州

(1961年周恩来在江西庐山学游泳资料镜头)

(周恩来的图片定格)

周恩来出生在南方的水乡，让他遗憾的是小时候没有学会游泳。六十三岁那年，他又一次认认真真学起来。

学习游泳，实际上包含着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规律的探寻。开始的时候，人们总是格外地谨慎和小心。

在二十六年的总理生涯中，面对不时发生的瘟疫、水灾、地震、森林毁坏、环境污染这些直接影响人类生存的天灾人祸，周恩来始终当作国计民生的大事，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费尽心血地谨慎对待。他似乎有一种高瞻远瞩的信念：尽管中华民族在这片灾害频繁、资源匮乏的土地上生存了几千年，但新中国却必须改造这个生存环境，创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周恩来和孩子在一起的图片)

(志愿军和孩子在一起的宣传画)

(抗美援朝期间沈阳一母亲抱着孩子的和平呼吁)

(周恩来愤怒地讲话图片)

周恩来一生没有留下自己的孩子，但他却非常地热爱儿童。从这些画面里，我们不难看出他慈父般的情怀。

但是，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美国侵略者在我国东北地区扔下了传播瘟疫的细菌弹。无数人面临着病害的威胁，沈阳的母亲们抱着孩子发出和平的呼吁。

周恩来被极大地激怒了！他代表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国侵略者的罪恶行为。

(北京居民的爱国卫生运动镜头)

与此同时，周恩来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号召。他还亲自担任全国防疫委员会和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的主任。

为了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劣生活环境和不良习惯，人们投入到讲究卫生、预防疾病、增进健康的热潮当中。一场清理城市垃圾的运动也在各地开展起来。

(北京治理龙须沟的资料镜头)

(话剧《龙须沟》宣传画)

(周恩来和《龙须沟》剧组人员合影)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观看《龙须沟》图片)

(改造后的龙须沟图片)

在北京，政府组织了成千上万的人民投入清除淤泥和疏浚下水道的工程。

当年北京前门外的龙须沟，是条著名的臭水沟，一到夏天，苍蝇、蚊子疯狂地传染着疾病，四周的老百姓几十年来受尽了痛苦。

龙须沟很快就治理好了。作家老舍根据这个题材创作了话剧《龙须沟》。这部反映在改造生活环境方面新旧社会鲜明对比的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反响。老舍也由此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周恩来看了这部话剧更是十分的喜欢。演出结束后他高兴地和演职人员们合了影，随后又把他们请进了中南海。

在中南海演出那天，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等领导人都来了。《龙须沟》也成了毛泽东进城后看的第一部大型话剧。

治理后的龙须沟成了人们观赏游玩的好地方。而对周恩来来说，这只是刚刚起步改造环境的一个小小缩影。

（黑场）

（周恩来的祖居地绍兴老屋。大禹陵）

（叠出周恩来 1939 年在大禹陵前的照片）

浙江绍兴城里的这个老院子，是周恩来的祖居地。

相传远古时候的治水英雄大禹，曾在绍兴城外的会稽山上会盟诸侯，治理泛滥天下的滔滔洪水。他死后，人们就把他葬在这里，后人还立了一个大禹陵的石碑。

1939 年，周恩来到东南抗日前线视察的时候，回到他的祖居地绍兴，曾专程拜谒了大禹陵。他那时也许想不到，十年后，自己会作为政府总理主持治理全国的江河湖海。五十年代初，他曾这样说过：我们治水，要有长远计划，一定要治本，把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几条主要河流修治好，为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大禹治水之下。

（淮河流域动画图）

（报载国务院根治淮河决定及治淮工程的报道）

（1951 年治淮工程图，人民群众治淮劳动电影镜头）

（航拍治理后的淮河新貌）

水灾，一直是威胁我们民族生存的心腹大患。1950 年的淮河大水，仅安徽一省的受灾人口就达到九百九十多万人。毛泽东、周恩来做出了根治淮河的战略决策。在周恩来主持下，伴随着朝鲜战争的隆隆炮声，治淮工程拉开了序幕。新中国也由此揭开了大规模改造自然环境的第一个篇章。

有人说，前方正在打仗需要大量的钱，治淮工程可以暂缓一步，可是在周恩来眼里，关系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的治淮工程，其意义决不亚于打赢一场战争。华东派钱正英到北京来申请治淮款项，周恩来亲自见了她，果断地给予大力支持。还指示把原来设在南京的治淮委员会迁到安徽的蚌埠。刚刚翻身的淮河人民那时正赶上搞土改，周恩来又决定苏北地区的土改工作推迟一年再进行。

治淮一期工程的胜利结束，为以后的治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年轻的水利专家钱正英为治淮有功，不久担任了水利部副部长。

（钱正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

我感觉到周总理之所以对水利工作这么重视，是因为周总理深深地认识到水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存条件、生存环境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历次讲话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就象 1950 年那次在对全国质量科学技术工作者代表会上的讲话，他当时讲，中国的农业、农村，当时是非常的贫困了，粮食也不够吃，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认为首先我们要搞土改，配合着土改我们要办几件事情，在这个配合土改中间，在土改的基础上，他提出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搞水利。

（荆江分洪工程工地图片）

（一些水利工程图片。毛泽东题词石碑）

（工地欢呼。锦旗：毛泽东题词的“为中国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

紧随治淮工程之后，对长江、黄河一直到海河等几大水系的规划和治理，也提到了日程。一批水利工程纷纷上马。

在那些年里，周恩来每年主持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都要专门讨论一次水利建设计划。他说，治水问题很复杂，我们要有一种战战兢兢、若履薄冰的感觉，这是关系人民生命的大事。我虽是外行，也要抓。周恩来说自己是外行，但专家们却说：周恩来是主持全国治水工作的“总工程师”。对许多工程的具体细节，包括数字、移民和土石构筑方式，他都十分内行地详细过问。

1954年，经周恩来批准兴建的荆江分洪工程刚刚完成，便经受住长江特大洪水的考验，保护了沿江人民的生命财产。毛泽东高兴地写来题词：“庆祝武汉人民战胜了1954年的洪水”。

（五十年代中期一群姑娘们在花下跳舞唱歌的电影镜头）

（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

（百货大楼人们购物）

这些光阴，这些年华，这些歌声，这些人们，传达着一种信息，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到处沐浴着朝气蓬勃的气象。

西花厅的海棠也映衬着这美好的气象。格外忙碌的周恩来，很难在院内盛开的海棠花下逗留。

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以后，中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周恩来注意到了环境、资源和人口这三个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甚至倡议实行计划生育，有效地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这一切，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

（周恩来在八大会议上的讲话同期声）

（字幕：周恩来1956年在八大会议上的讲话）

克服各种困难，在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奋斗中胜利前进！

（周恩来形象定格）

（毛泽东1956年游长江）

在为实现工业化目标的奋斗中，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改造自然环境的认识又进了一步。面对旧中国留下的恶劣的生存条件，不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治理，而是主动地探寻自然界的规律，变害为利，利用自然资源造福人类。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畅游长江的时候，满怀豪情地写下“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诗句，向世人宣告、准备在长江三峡修建既防洪、又利于农业灌溉，还可发电的水利大坝的宏伟设想。

（五十年代治水的电影资料及同期声）

就是这浩浩荡荡的长江，也要在它身上架起宽阔的桥梁。它再也休想把祖国的大地分成南北两半。今天，我们发出震动全世界的宣告，十五年要把黄河根本改造好，我们要把黄河的泥浆变成绿色的清水，我们要用滔滔的洪水发电，把黄河的夜晚变成白天。

（五十年代治水的电影资料）

那个时候，这样的语言、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热情，不知激励了多少人。而着手考虑三峡大坝的建设，似乎也已势在必行。

（周恩来题词）

为了把这个理想变成现实，周恩来用了自己的表达方式：“为充分利用中国五亿四千万（ ）的水利资源和建设长江三峡水利枢纽的远大目标而奋斗！”其中“远大目标”几个字，对在治水中一向谨慎的周恩来来说，显然不是随意写下的。

（航测三峡的图片）

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不仅要考虑人力、财力的使用，还要注意生态平衡、移民安置和综合利用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等问题。为此，毛泽东、周恩来要求有关部门充分做好勘测和论证工作。

（南宁会议会址外景）

1958年1月，一场冬雨给广西的南宁带来一些寒意。然而，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三峡水利工程的讨论却非常热烈。

（林一山时任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

讨论三峡，当时主席的意思是要早做准备，早些开工。当时讨论了很多问题，总理在会议前也问我，我也答复，就是说当时国家没有这么多钱，三峡工程我们设计要七十二个亿，主席的意思能不能省一点，总理就说五十个亿，减少二十个亿。因为我们当时装机两千多万，周恩来说装机五百万行不行，主席希望能开工。我说行，先把大坝修起来，将来发电以后再组装，先修大坝防洪水。

（南宁会议会址外景转内景）

三峡工程是不是立即上马，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还有不同意见。在双方争论不下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今后长江流域的规划和三峡工程由周恩来负责主持。还要求他一年抓四次。

（武汉外景）

一个多月后，周恩来召集相关部委的领导和专家一百多人，汇聚武汉，乘“江峡”号客轮逆水而上，沿途研究长江规划，考察三峡工程的坝址。谁都没有想到，周恩来因为反冒进的问题刚刚受到批评。

（钱正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

我们是一起跟着总理在武汉上船的。当时我们所接触到的周总理，一点没看出他受影响，他在组织三峡研究中还是坚持实事求是，非常认真地研究三峡的问题。当时我们看到总理的精神，我们都根本没有想到周总理在南宁会议上受到这么大的压力，根本就没有看出来。那时候下着大雪呀，在湖北下着大雪呀，那看荆江大堤，看三峡的坝址，在船上就是天天开会讨论，会议上也极力辩论一些问题，总理就是耐心地听了这方面的意见。

（客轮逆长江水流而上。一组周恩来在考察途中的图片）

当时人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需不需要建三峡大坝，能不能够建三峡大坝，可不可以提前建三峡大坝。周恩来这次考察研究的直接目的，是要在三月间的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拿出一个详细的报告。

于是，一路上他冒着风雪实地踏勘了三斗坪、中堡岛等设想中的三峡坝址，研究对照了工程设计方案。他对地质部门在当地勘探出来的一块花岗岩心十分重视，说要带回北京放到自己的办公室里。

（钱正英时任水利部副部长）

就是走过丰都，丰都不是阎罗殿的那个地方吗。长江沿岸，我们下岸，老百姓当时一看，船上下来的人都是风度非凡，研究说一定这里面有大人物，究竟谁是大人物呢，一群一群的学生就跟着我们，先看到苏联专家，说这是

外国人，看到我们张含英，大胡子，说这个可能是大人物。最后发现了周总理，这一下子丰都这个小城就万人空巷，就传开了：“周总理来了，周总理来了”，就整个城市都出来了。那时候幸亏我们在丰都已经是快回船了，总理已经到船上了，丰都是个山城，山上好多群众都下来了，一直到船跟前，到江边上，周总理在船上给大家招手，群众热情的样子真叫人感动。

（船到三游洞）

那些热情的人们并不知道，周恩来是肩负着重大的使命来到三峡的。

客轮开到了南津关坝区的三游洞，这里也是一个旅游景点。当人们请周恩来上岸的时候，他说我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专家解释说，在三游洞旁边打了一个钻孔，发现里面是石灰岩，有溶洞，如果在这一带建大坝有可能漏水。周恩来这才弃船上岸仔细察看。

（重庆狮子滩水电站。周恩来题词石碑）

（周恩来和狮子滩水电站职工合影图片）

重庆附近的狮子滩水电站，是周恩来此行考察的最后一站。周恩来当年在这里的题词，后来被人们刻在了石碑上。他说：“为综合利用四川水利资源树立榜样，为全面发展四川经济开辟道路”。

狮子滩水电站是在长江上游水系建造的第一个成功的水电站，当时被人们称为“小水电之花”。

周恩来在水电站门前和职工们的合影，也被人们珍藏至今。但这些兴奋的职工们并不知道，那一天，正好是周恩来六十岁的生日。

（从武汉到重庆的沿江地图）

（长江。今日重庆）

从武汉到重庆的沿江考察，周恩来的想法逐渐明确了。三月六日，他在重庆主持会议进行总结，提出：兴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深远意义，在技术上也是可能的。但准备工作要统一规划、分期进行，必须联系长江流域远景规划和近期开发，联系干流和支流，联系大型、中型和小型水电工程进行综合考虑。

半个月后，根据周恩来在成都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央正式做出一个十分慎重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一些当事人说，在发动“大跃进”的时候，这个决议是成都会议通过的许多文件中，唯一的一份“促退”文件。

（今天三峡工程建设现场）

（1958年周恩来视察中堡岛纪念碑）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如今终于大规模地兴建开来了。这些在沸腾工地上的建设者们，将亲手实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曾经反复论证和精心构画的宏伟蓝图。

在今天的中堡岛上，人们立了这样一个石碑，来纪念周恩来这位第一个登上中堡岛的国家领导人。

（周恩来视察各水利工地图片）

周恩来费尽心血关注的，不仅仅是一个三峡工程。江河治理的全部框架，水电工程的整体布局，包括丹江口、葛洲坝、刘家峡、三门峡、新安江等大型水电工程，以及北京的密云水库，河北的岳城水库等等，都是周恩来筹划兴建起来的。

“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这是他改造中国自然环境的一个坚定信念。

（黑场）

（北京总动员赶鸟打鸟的电影资料镜头）

五十年代后期，我们在一味地强调“人定胜天、改造自然”的同时，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还缺少深入和全面的认识。

这时当年全民动员赶鸟、打鸟的电影镜头。在人们看来，要吃地里粮食的麻雀无疑是祸害，但并不知道它也吃其他危害庄稼的害虫。人为地破坏生物链，结果会导致害虫的泛滥。

人和自然的关系就是这么复杂。包括新中国的领导人，显然也需要一个认识的过程。

（毛泽东、周恩来等看建设规划模型）

（北京城里大兴土木搞建设的场面）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观看首都城市建设规划模型的镜头。

在我们大规模地进行建设的时候，大兴土木和保护森林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更严重的是，由于缺少保护森林的绿色意识，在大跃进中，为了大炼钢铁，九千万人上山，大批的树林遭受砍伐和毁坏。而我们的森林资源并不像人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乐观。

（《人民日报》“爱护我们祖国的森林”的宣传画）

（周恩来在昆明的住地）

早在建国初期，周恩来就在考虑如何处理这个矛盾。他说：护林、育林、伐林必须统一计划和管理。1950年，他和林业部部长梁希联名发出的第一份《关于林业工作的指示》便要求，“以普遍护林为主，严格禁止一切破坏森林的行为。”1953年周恩来又提出制定《森林法》。到六十年代，周恩来明确提出了“合理采伐，采育结合”的林业工作方针。

1963年，周恩来去云南的时候，了解到那里的原始森林受到破坏，引起他的警觉。

（刘春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到昆明住下来以后呢，第二天早晨吧，我在外面散步，看见总理在前面也在散步，比我还早啦，就在走。我就很注意，我说是总理呢。我就慢慢走，总理就回过来，一看确实是总理，还有一个同志跟随着。我就跑到前面去，就问候总理，我还问一句，我说总理怎么来了，意思是总理做什么来了？总理也没有回答，回答我说的是说：刘春，有一件事情我来不及说了，你跟阎红彦同志，阎红彦当时是云南省委的书记啦，你跟他说一下，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破坏得很厉害，很严重，要他立即制止。我说，那好，那好。总理就回去了。

（1964年周恩来在昆明郊区海口林场植树的电影镜头）

（周恩来当年种下的油橄榄）

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又到了昆明。在昆明郊区的海口林场，他种下了这棵油橄榄树。种树的时候，他还特别交待这样一件事情，他说：从中央到地方的负责同志，除年老体弱的以外，每年都要带头植树，要养成一种风气。

有人认为，这就是今天对每个公民来说都不陌生的植树节的一个来源。

（乱砍树木的镜头）

（1965年春东北一森林大火的镜头）

但是，掠夺式砍伐树林的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自然和人为的火灾又进

一步毁坏着我们的森林资源。1965年春天，东北林区发生一场大火，烧了整整十二天，毁掉了一百万亩树林。这一事件让周恩来非常痛心。

（周恩来1966年的图片）

1966年2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林业工作会议上说了这样几句话：“我最担心的，一个是治水治错了。一个是树林砍多了。治水治错了，树林砍多了，下一代人要说你。现在砍树多于造林，再亏下去不得了。我们不能当败家子！”

（西花厅）

这是周恩来在他总理生涯的第十七个年头发出的感慨。也是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到表现出来的富有远见的深切忧虑。

就在他发出这种感慨后不到半个月，又一个没有预料到的灾害发生了。

1966年3月8日凌晨，河北邢台地区发生了强烈地震。

（周家鼎时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总理还在办公室批阅文件，还在办公室办公呢，大地颤动、电灯摇晃。总理意识到这个问题很严重，马上告诉我说，你马上告诉国务院的值班室，各总参谋部，立即查明这个地震的震区，震级和这些地方是什么样的破坏，。总理会想到当时要立即查明，这是一个；第二就是要给我准备直升飞机，我要到灾区视察；第三就是明天几点钟，国务院召集紧急会议，有关的各部委负责人一定要到会，还有副总理。

（人民大会堂）

安排完这一切，周恩来赶往人民大会堂连续会见三批事先约好了的外宾。下午四点回到中南海后，立即给刘少奇等其他中央领导人写了有关邢台地震的报告。傍晚六点，在主持国务院紧急会议，布置救灾措施的同时，周恩来考虑的问题则更为深远。

（周家鼎时任周恩来的军事秘书）

总理开完会以后全安排停当，叫大家马上行动，就留下李四光，还有地质部的，石油部的，国家测绘总局的，中科院的，这些负责人在那儿开了另外一个会。研究说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的地震，损失非常严重，要利用这一次地震，大家很好地接受经验，研究怎样来预测，预防和预报地震的问题。当时这一讲，大家好象面有难色，地震这个问题，世界都没解决。当时李四光同志就讲：可以预报，但是要摸索，事物是由量变到质变的，是有一定的客观规律的。总理同意李四老这个意见，说是好，就委托李四老，负责这个问题的解决，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作个贡献。李四老当时就接受了这个任务。

（飞行中的米8飞机）

（3月9日周恩来飞往邢台及在邢台地区视察灾情的一组电影资料）

当时周恩来还决定，地质人员随他飞到地震现场进行勘察。

第二天，周恩来飞到了邢台，出现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救灾首先要着眼于人。心里永远装着人民的周恩来，在对受灾群众讲话时，特意选择了一个自己迎风、让群众背风的地方。

这是当时拍摄的资料，也许你不止一次看到过这些画面。他考察灾情，问寒问暖，鼓舞受灾群众重建家园的情景，对许多当事人来说更是记忆犹新。

然而，面对人类无法抗拒的地震灾害，忧心忡忡的周恩来特别关注的是如何预测和预报，从而减少灾害。这或许是对人民更长远、更深切的关爱。

在邢台隆尧县，周恩来专门查阅了当地的县志，发现一千二百多年前，这里就发生过大地震。他遗憾地说：祖先给我们留下了记录，但没有留下经验。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我们必须从中取得经验。随后让人把这个资料带回北京进一步研究。

随周恩来到邢台的地质工作者也在现场开始了地震预测研究。看到他们如此专注地开展起工作，周恩来感到了一些欣慰，他的脸上露出期待的神情。

（李四光等开会研究地质问题。辽宁海城地图。国务院嘉奖文件）

在这之后，在李四光主持下，我国的地震预测研究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了。周恩来希望他们能在七十年代的地震研究领域放一个异彩。1975年，我国成功地预测了辽宁海城发生的七点三级地震，被国际地震学界称为科学的奇迹。周恩来指示对有功人员给予通令嘉奖。

（五六十年代的儿童画：冒烟的烟囱。儿童。初升的太阳）

（工业化镜头）

几十年前，今天的中年人还是孩子的时候，畅想中的家园，就是这样一种工厂密布，烟囱林立的景象。毛泽东告诉年轻人，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当人们热切地期待着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时候，周恩来的眼光却看得更远。

（西方发达国家六七十年代工业污染的镜头。美国两千万人上街游行反对公害。日本渔民游行）

那时候，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严重的工业污染和各种公害，激起社会公愤。美国有两千万人上街游行，日本的渔民也行动起来举行抗议。

在人类改造自然的同时，显然也在制造着环境污染。工业化刚刚起步的中国，能不能及早减少社会进步所付出的这个代价呢？周恩来对中华民族生存环境的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晚年又发生了一个飞跃。

（曲格平原国家环保局局长）

所以这个环境保护工作，首先是由他提出来的。那时是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就提出环境保护问题。当然他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方说在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来说，没有一个了解这方面的情况，所以这个甚至我们连个词都感到生疏。但是他一再讲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重大，西方发达国家，这个环境污染已经对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激起了强烈的社会公愤，那么经济发展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他说对我们中国来讲，现在算是新课题吧，如果我们不注意，工业化搞起来，也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他说我们一定要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我们在搞工业化建设一开始，就注意这个问题，不能够出现，避免出现西方那样的严重的情况，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么一点。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怎么能够体现出来，还怎么能称得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有这样语重心长的讲话。

（报载《综合利用，兴得除害》资料原声解说）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为了防止污染，除害兴利，党和政府对治理工业污水等提出了要求。

（工厂冒烟）

实际上，当时人们关心的主要还是如何处理工厂里排除的废滓、废气和废水。在认识上许多人甚至还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有环境污染的问题。环境



观念的转变也就显得十分艰难，也十分急迫，它直接影响到我们从根本上解决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时候，不放过任何机会了解国外的有关信息。

（曲格平原国家环保局局长）

我记得 1970 年 12 月底，有一个日本访问团到中国来。他（周恩来）在接见这个日本客人的时候，了解到当中有一位是电视台的公害记者，他特意约这位记者作了长时间的谈话，就是谈这个公害问题。他详细请这位记者介绍了日本公害的发展和危害的情况，以及现在日本采取的一些对策。谈话之后的第二天，他就指示我们要举行一次报告会，请这个记者来讲这个环境保护的问题。他指示除了一些有关的科学技术人员听这个课之外，要国家机关的负责人，各个部委的负责人都要听这个课。所以当时我们组织了一个报告会，讲了一个下午。讲完话，他还打电话来问：听懂了没有。并且还指示，要分组进行讨论，讨论的情况要向他汇报。

（瑞典斯德哥尔摩外景）

（报载我国派代表团赴斯德哥尔摩参加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1972 年 6 月，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第一届环境发展大会。我国有关部门以为环境问题属于卫生部负责，拟定的与会名单都是医务干部和专家。周恩来两次修改代表团成员名单，增加了国家计委、工业、农业等综合部门人员。他交代：要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这次大会后，中国在与人类日益相关的环境问题上，逐渐跟上世界的步伐。

（曲格平原国家环保局局长）

所以代表团回来之后，向他（周恩来）作了汇报之后，他就讲，现在证明了，我们所担心的问题在中国还是发生了。这个因为代表团的汇报当中，就对照会议发的一些材料，列举了一些环境问题，对照中国发现的环境问题，觉得已经相当严重。比方说这个大气污染，木质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还有生态破坏，都已经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总理说，果然在我们这儿这些问题还是发生了，这个还比较严重。所以他就指示、立即开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讲这个环境保护问题，不仅是国家有关部门重视，要使得全国各级领导都要重视这个问题。1973 年 8 月，就在北京，以国务院的名义召开了环境保护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汇集了大家交流了一下这个环境方面的情况。会议总结之后，大家都大吃一惊，因为再这样下去，这东西不得了。通过这个会议之后，大家都说到周总理的英明。因为他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几十年，没有人听，没什么反映，现在一看，把这些问题一汇集，问题严重了。就在这样一个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个规划，建立了一个工作机构，把这个环境保护列上了议事日程。在文化大革命那样子混乱条件之下，这项工作还是开展起来了。

（周恩来看显微镜）

（人民大会堂）

（周恩来讲讲话记录）

根据国家环保局档案资料的统计，从 1970 年到 1974 年，周恩来关于环境保护的讲话有三十一次。他说：“我们现在再不搞综合利用，后一代就要骂死我们，骂我们蠢才”。他还说，“我们可不要做超级大国，不能不顾一切，要为后代着想”。

（天安门城楼）

（北京北海公园白塔俯拍）

从防止自然灾害，改造恶劣的自然环境，到有意识地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还一个绿色的家园，中国人民经历了一个不算太短的时间。

当新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登上天安门的时候，也曾期望能看到四处有林立的烟囱。因为那时候我们太穷，我们太需要工业文明了。

（北海白塔。俯拍四周）

1975年，周恩来已经病重住院。有关人民利益的事情，仍牵动着他的心。一天他散步来到医院附近的北海公园。登上高处，他看到天空仍弥漫着烟尘，感慨地说了一句：什么时候我们的空气变得清洁起来就好了。

## 第十集 中流砥柱

（1966年华北旱情。干裂、贫瘠的土地）

（邢台地震后，周恩来赶到灾区）

1966年春天，华北平原遇到多年来罕见的大旱，人口稠密的邢台地区又发生强烈地震。这段时间里，周恩来格外忙碌，他那浓眉紧锁的神态，多少透露出内心的沉重。

（1966年“五一”节周恩来和刘少奇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和往年的“五一”劳动节一样，周恩来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兴致勃勃地观看焰火。他们这时不会想到，一场比自然灾害更空前、更猛烈的政治风暴，已经悄悄地卷来。对于他们中间有的人来说，这将是最后一次和人民群众一起欢庆“五一”。

（人民大会堂外景和里面会议大厅）

（北京大学校园张贴的聂元梓等人大字报）

“五一”节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人们称它为“五一六”通知。从此爆发的持续十年之久的这场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就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一些大学师生的大字报也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周恩来出访归来）

（人民大会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场，毛泽东、周恩来发表讲话）

7月1日，出访回国的周恩来，一下飞机，便被按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

一个月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错误地批评了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周恩来在会上对派工作组问题也承担了责任，检讨自己。

（清晨。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前金水桥旁，被无数红卫兵所簇拥、欢呼）

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师生。

人们发现，陪同毛泽东参加接见的中央核心领导人员作了重大调整。刘少奇被降至第八位，林彪一跃上升到第二位。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党中央副主席，和邓小平的总书记职务，都不再提及。

从“八一八”这天起，“红卫兵运动”由北京开始，在全国迅速蔓延开来。

（关闭故宫午门大门）

（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命名“反修路”）

周恩来从天安门城楼走下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指示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守护故宫，防止大破“四旧”的红卫兵冲进来毁坏文物国宝。

故宫的大门关闭了，然而，它却挡不住席卷一切的政治洪流。

几天后，周恩来听说红卫兵要在外国大使馆附近搞“命名”和示威活动，他赶去耐心劝说，同时采取紧急防范措施，避免了一次涉外纠纷。

已经被无政府主义思潮煽动起来的青少年们，一旦走入社会，必然要带来一系列更为严重的后果。大批领导干部和民主人士成了这场运动首当其冲

的攻击目标。

（章士钊宅院，章致毛泽东信函手迹，毛批示）

一天，一群红卫兵突然闯入民主人士章士钊先生的住宅，翻箱倒柜，进行“抄家”。章士钊早年是毛泽东的朋友，建国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当天晚上，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请求有关方面过问此事。毛泽东读后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家鼎时任周恩来的秘书）

总理呢，在这次就联想到，不仅仅一个章士钊的问题。章士钊这个问题，因为他和主席有这种关系，他可以反映，而有些人不一定能这样做。这样子搞下去怎么办呢？总理就亲自起草了一份应给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共七十九个字，我数了这七十九个字。

（周恩来起草的保护干部名单）

这份七十九个字的保护名单，包含了几百位需要保护的對象。不仅有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还有中共党内的高级干部，民族工商业的代表人物等。

（荣毅仁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受到的冲击比较重。当时的形势不安定，气氛很紧张。’66年11月，有一个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活动，我也参加了。当时孙晓村同志过来对我说，邓大姐找我。我急忙走到邓颖超同志身边，邓大姐问我，周总理让人给我带话，有没有捎到。我说不知道捎话的事。邓大姐说：“总理让我告诉你，要顶得住，要经得住考验，前途是有的。”我听了十分感动。

（1966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

（林彪讲话同期声）

国庆节这天，经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刘少奇仍然以国家元首的身分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但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

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

（周恩来向红卫兵讲解政策）

（北京先农坛体育场）

周恩来尽最大的努力，劝阻红卫兵不要做违法的、出格的事情，劝他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前去。这样的接见和劝说，有一百多次。一次在北京先农坛开会的时候，曾发生这样一件事。

（雍文涛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

当时这个会上，秩序还是很好的。但是忽然间这个会场上发出一个“打倒刘少奇”的声音，喊的人数不多。总理在那儿站着讲话，这个口号出来以后，总理马上就把身子转过去，把背对着这个会场，脸呢，转过去了。因为总理还是有威信，总理把背一背过去以后呢，大家就不吭气了，也没有人喊口号了。等了一会儿，总理又返过身来，返过身来，就讲……

（批斗现场）

这种形势事实上已无法扭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下，对各级领导干部的批斗逐步升级，越来越多的老干部被随便传唤出去进行长

时间批斗，一些人还遭到人身侮辱。是周恩来挺身而出，保护他们。

（谷牧时任国家建委主任）

富春同志就跟总理商量，说是不出去遭批斗几次恐怕不成，就规定一个礼拜两次，至多三次出去，跟群众见见面。那个时候有个说法，这样做，可以“缓和一下群众敌对情绪”，而且跟联络员讲好，每次出去不要超过两个小时，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让别人抢跑，两个小时完了送回来。哪个造反派还听上面的什么安排，什么两个小时，一批斗，至少都是四、五个小时，喷气式也坐了，什么揪头发这些事都干了，就是没下跪。

我也真受不了了。李富春同志就向总理建议，说这样的话，谷牧身体受不了，也耽误工作呀，说好多事要他干，说是不是改为一星期出去一次吧，或者是经过批准出去两次吧。总理对这个情况很清楚了，他说：“什么一次、两次，不出去了！以后谁要叫谷牧出去，必须我批准。”

（中南海国务院宿舍“工字楼”）

当时，需要保护的干部很多，周恩来就把一些受到冲击的国务院的部长和各省的负责人，接进中南海里“休息”，实际上是让他们避开造反派的纠缠。国务院这幢叫“工字楼”的宿舍，便成了这些老干部的“临时避难所”。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林彪讲话同期声）

文化大革命形势好得很，形势越来越好。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旧世界，你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做得对，做得好！

（周恩来讲话同期声）

这段影片资料。或许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维系国民经济运转最真实的纪录。

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援朝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同志们，同学们，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企业单位和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布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抓革命，促生产”社论）

（红卫兵“大串连”）

在周恩来主持下，《人民日报》连续发表几篇“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但是，数以千万计的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却使得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命脉铁路运输，更是不堪重负。

（吕正操时任铁道部部长）

八次红卫兵串连，都是最困难的时候。那时，总理几乎是每天一到人民

大会堂，九点就把我找去了，甚至饭都没吃，到那里临时吃顿饭，我也没吃，到那吃顿饭，总理吃点面条，带着我，就问我运输的情况，就指示哪个列车可以出去，哪个列车可以进来。我就按他的指示来办，按总理的指示来办，这个车才能行动。所以，总理有时候跟红卫兵讲，也当着我的面说：吕正操，你这个铁道部长，我替你当了。总理说过这个话。我说，我也没办法，你不说话，他是哪一个都不听，只有总理说的话，还可以听一听。但是以后，我走了以后，恐怕总理说话别人也不那么听了。

（上海安亭车站）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人，煽动上访工人卧轨拦车，致使南北铁路交通枢纽中断达三十多个小时。对此，在北京的周恩来极为焦虑。

（吕正操时任铁道部部长）

总理大概给这个谁打电话，我记得好象给陈丕显打电话，说要保证运输正常。在上海呀，陈丕显也在一边挨斗，一边当上海市委书记。他（周恩来）在电话里就叫陈丕显，你一定要保证铁路运输，不要把铁路运输搞乱了。

（上海铁路调度室。火车行进）

（铁道部关于铁路运输中断情况简报，周恩来致中央文革小组信手迹）

由于铁路交通秩序混乱，大量物资送不出去，运不进来，直接影响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到和几亿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生产方面来了。他把余秋里和谷牧两人调到国务院，协助抓工业，还对他们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周恩来又给“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康生和江青等人写信，告诉他们：“全国交通命脉，绝不能中断”。

（火车行进。工厂停产镜头）

为了稳住生产局面，保障起码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周恩来决定召开一次工业交通方面的座谈会，制定一些具体措施，尽量限制和缩小已经逐步扩展的“文化大革命”对工交系统的影响。

（谷牧时任国家建委主任）

我们就开了这么个会。会议的结果，我们写了十五条，这都有文件为证，我不详细讲内容了。这十五条，以后就出了大乱子了。陈伯达首先发起攻势，他说：你这个报告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搞突然袭击。周总理站出来讲话了，他说这是我叫他们昨天连夜搞的，还来不及印发给大家。林彪批了我三个半天，最后总理又站出来。林彪说陈伯达追究你为什么不跟他们商量，总理就站出来讲话，接着总理就解释：谷牧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怕文化大革命如果领导不得力，把下面生产搞乱了，他们经常给我讲，说没有煤啦，没有钢铁，那怎么样，喝西北风，闹革命吧。他这样讲：我说服他们几次，他们这个思想还是没有转过来。就在这次会议上，有几个人包围总理，质问这个，质问那个。周总理这个时候就讲了：“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周恩来及林彪、江青一伙镜头）

在如此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还多次明确表示：我只有八个字，“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与贺龙，雪中西花厅）

四十年前同周恩来一起领导南昌起义的贺龙元帅，却在这个严寒的冬季里被造反派搅得无处安身。周恩来几次为贺龙寻找并转移住处，批评造反派对贺龙的无理行为，但还是不能摆脱他们的纠缠。周恩来只好把贺龙夫妇按到自己住的西花厅。一周之后，消息还是传了出去，周恩来不得不秘密派人把贺龙安顿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偏僻住所。

两位老战友分手时，周恩来握住贺龙的手说：“等到秋天，我再派人去按你！”可是，到了秋天，周恩来却无能为力了，而贺龙也身染重病。

（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贺龙烧到三十八、九度了。钓鱼台开办公会议，总理对我说，你讲一讲。……开会时我说：总理讲了，贺龙烧到三十八、九度了，年龄大了，不赶快治疗有危险，送到三 一医院去。康生、江青他们当时讲了：贺龙他是个军阀，是个坏人，没有资格住三 一。总理也不吭气，“文革小组”这些家伙都讲开了，总理没吭气。

从钓鱼台下来以后，总理跟我讲，你想个办法吧，弄出来治疗一下。我说，哪里有什么办法，北京医院造了反了，总医院造了反了，三 一医院造了反了。后来我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五棵松警卫一师那个医院没有造反。总理说：好！你要想办法把他（贺龙）弄到那里去。有些药没有，我们也没有，总理就对他的保健大夫卞志强说：你给我找这个药，我要用这个药。找来后就交给我送到医院去了。

贺龙十多天病就好了，好了以后我就报告总理，说已经好了，是不是还休息一下。总理说：算了，时间久了以后怕暴露了，在那个地方暴露怕出危险，就交给杨德中他们吧，杨德中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交给他，把他（贺龙）送到象鼻子山，象鼻子山保险，外围都是部队，在大山里面。这样就送回去了。

（上海“一月风暴”。群众争抢传单，游行）

1967年1月，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周恩来在元旦那天，还嘱咐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一定要坚持工作，稳住上海局势。然而，才短短几天，造反派就把原上海市的党政主要领导人统统打倒了，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开始主持上海市的工作。各地造反派纷纷如法炮制，开始“全面夺权”，全国陷于空前的混乱之中。

（周恩来1967年1月的工作台历）

（中南海怀仁堂。几位老帅在天安门上）

面对“天下大乱”的局面，1967年2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碰头会，讨论党政业务问题，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老帅在会上痛斥江青一伙乱党乱军的做法。2月16日那天，双方斗争达到高潮，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等老同志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中的种种极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这就是有名的“大闹怀仁堂”的事件。

（谷牧时为出席中央碰头会成员）

周总理的态度也是很明确了。就是大闹的那一天呢，大家七嘴八舌说得没完，总理就在场，总理没有起来批评，哪个元帅，哪个说怪话的，总理只是讲一句话，反复的讲，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呀，但是不要发牢骚嘛，只讲这一句，这是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所谓我们那个碰头会，每次开完会，

总理都必须到毛主席那儿去汇报，当天晚上就去，这一次周总理没去，三天没去。当时四人帮他们一伙儿，江青、张春桥，他们就到毛主席那里去告状。毛主席不高兴了，说你们过去都每次开会，你周恩来都来讲一讲，怎么这次不来了？因为总理去不好讲，他实际上是支持我们的。

（中南海外围，造反派组成“揪刘火线”，冲击国务院）

老一辈革命家在二月间的抗争失利后，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更加气焰嚣张了。他们公然宣称：现在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斗争，要打倒以国务院为代表的第三个司令部。

（童小鹏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红卫兵冲中南海冲过两次，把大门、铁门关了，他们就从上面爬进去。每一次都是我在前面，给他们解释。有些讲道理的，有些不讲道理的、有些坚持在那里。我说怎么办呢？我就报告周总理。总理就讲，要他们撤退，不撤退我自己来。他们包围了好多天，天天敲锣打鼓，还有高音喇叭，周总理没法睡觉。

（武汉“七二”事件）

（谢富治、王力回京，北京声援大会）

（“文攻武卫”。武斗升级）

周恩来曾经说过，1967年，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度过的最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夏天，各地武斗蜂起，派仗不息。7月中下旬，林彪、江青一伙蓄意制造了武汉“七二”事件”。周恩来往来于北京和武汉之间，竭力平息事态发展。但阴谋家们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借以煽动群众，挑起事端，进一步扩大动乱。7月22日，江青发表讲话，公开肯定“文攻武卫”，致使全国武斗急剧升级。8月1日，报纸上又刊载经林彪批准同意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提法的社论，由此，各地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领导干部之风愈刮愈烈。

（林彪批示手迹）

（王力“八七”讲话）

在武汉“七二”事件中充当“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于8月7日煽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鼓吹打倒外交部长陈毅。这个讲话使整个外事工作陷入混乱。8月下旬，在北京发生了“火烧英驻华代办处”的恶性事件，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声誉。

（周恩来对造反派讲话镜头）

在王力“八七”讲话煽动下，造反派们加紧了对陈毅的攻击。仅8月上旬，大小批判会就开了几次。几乎每次批判会，周恩来都要亲自到场，实际上是以“陪斗”方式来保护陈毅。一次，要斗陈毅的造反派竟围攻周恩来达十八个小时，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

（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每一次斗陈毅呀，总理都去，有总理，有谢富治，有我，我们三个人。在外交部大楼。总理在这些问题上都亲自布署。他对我讲，你要搞一辆车放在外交部后门那个地方，万一造反派冲，挡不住，不行了，你就把老师放车里带走，拉到人民大会堂也可以，拉到中南海也可以。我们组织了七八个人身体好的，健壮的，保护陈老总。

陈老总他不怕，他说：你们斗争我，毛主席都说我陈毅是个好同志，不信你们问总理。总理说是。造反派听了这话，就起来冲，军队有五六排，都



是身体好的，在前面拦，四个人一排，手挽手，不让他们冲上来，最后还是冲，住上爬。总理火了，站起来说：你们不听我的，要抓，抓我！打倒我！这时总理生了气了。这个会议呀，总理说，不开了。

（钓鱼台5号楼外景）

在内政外交已经失控的情况下，周恩来派人给在外地的毛泽东作了当面汇报，并请求采取果断措施。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还委托周恩来宣布立即逮捕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不久，戚本禹也被逮捕。处置王、关、戚，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集团受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西花厅雪景）

进入1968年，周恩来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但动荡不安的局势仍不见好转。心力交瘁的周恩来一次次地劝说各地造反派停止武斗，恢复生产。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周恩来真正实践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周恩来书写的制止武斗手迹）

（中南海毛泽东住地）

这年夏天，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亲自召见了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五大领袖”，严厉批评他们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长期热衷于打派仗的行为。之后，经毛泽东批准，“工宣队”开赴大中学校，混乱局势有所缓解。

（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九大会场）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主席团成员镜头）

（周恩来起草的九大主席团执行主席座序手迹）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九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选举的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使得林彪、江青两个宗派集团的势力得到加强，而许多的老革命家和老干部却被排斥在党中央委员会之外。历史证明，九大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完全错误的。

开幕式那天，有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主席台前排，一边是周恩来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指责为犯了“错误”的老同志，另一边是林彪和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这个座序，正是周恩来亲自安排的。

（刘少奇、陶铸、贺龙等人照片）

九大以后，刘少奇、陶铸、贺龙等老一辈革命家继续遭受迫害，相继含冤去世。在林彪的“一号通令”发布后，陈云、邓小平等老同志则离开北京，下放到外地参加劳动。

（江西庐山）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人镜头）

江西的庐山，被人们称作“政治山”。1970年8月，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识破林彪一伙急于抢班夺权的企图，写下《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露了陈伯达等人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企图欺骗绝大多数中央委员的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进而给林彪一伙以沉重打击。

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批判了陈伯达等人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行为，竭力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1971年“五一”节天安门焰火晚会）

庐山会议后，林彪等人以假检讨来敷衍毛泽东和党中央，暗地里却加紧进行阴谋活动。林彪之子林立果秘密组织了“小舰队”，并且窃取了空军的

指挥大权。在林彪、叶群的授意下，林立果等人又秘密制定出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企图用武力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1971年“五一”节之夜，林彪来到天安门，仅在城楼上呆了几分钟，便不辞而别。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当毛泽东离开天安门时，身边已经没有了林彪，但他却意外地碰上了大病初愈的陈毅。他们紧紧握手的时候，陈毅元帅说了一句：“毛主席，老兵陈毅向你报到！”

（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周恩来工作日历）

1971年9月初，林彪一伙得知毛泽东视察南方时，在谈话中对他进行了批评，决心挺而走险，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分裂中央。9月12日晚上，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会议，讨论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的初稿。

（顾明时任国家计委负责人）

《政府工作报告》念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才十二点半。十二点半的时候呢，杨德中来了，说有电话来找总理，叫出去。叫出去了以后，我们在这里等了两个多钟头，因为他（周恩来）还要继续听啊。那一次，江青还都参加了会议，那时候政治局很多同志都在。十二点半出去，到了两点多钟还不来，大会堂外面还在敲锣打鼓演戏呢，是准备“十一”，为国庆节预备的节目。后来一直到两点半以后呢，来通知啦，杨德中同志说，今天晚上不谈了，你们先回去，以后另外再通知。

（人民大会堂小厅，新疆厅内的周恩来办公室）

（秦皇岛山海关机场）

周恩来中止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稿的讨论，是因为林彪一伙在北戴河出现了不正常情况。他们私自调飞机到山海关，先是企图飞往南方，另立中央。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便仓皇坐上三叉戟飞机，向北面逃窜。

（李德生时任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

他一起飞以后，总理就马上说，看来是个大情况。他就派我到空军指挥所。他在（人民大会堂）那儿坐镇指挥，打电话给他，随时跟他通话。要我一天坐在那儿，不能离开。在空军那个地下室的指挥所，24小时不离开。（林彪的飞机）就要出国境线的时候，就有人建议要不要把它打下来，七嘴八舌地跟总理报告，要不要把这个飞机打下来。以后呢，总理就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就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这是毛主席回答总理的指示，总理把这个情况就告诉我们了，就让它出去了。出去不久，这飞机不就掉下来了。他（周恩来）是非常沉着的。

（蒙古温都尔汗。林彪、叶群等尸体，飞机残骸）

林彪事件当中，周恩来连续三天三夜坚守在人民大会堂沉着指挥。在得到林彪一伙彻底灭亡的确切消息后才回去休息。

（陈毅追悼大会，毛泽东、周恩来镜头）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

1972年1月，陈毅元帅不幸病逝。毛泽东亲自出席陈毅追悼大会，周恩来致悼词。追悼会上，毛泽东肯定了陈毅的为人和历史功绩，并提到刘伯承、邓小平等老同志。当听到毛泽东说邓小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时，在场的周恩来示意陈毅子女把毛泽东的意思传出去。周恩来还审定了《人民

日报》的这篇社论，为“解放”广大老干部造舆论。

（周恩来写的“废除法西斯式审查方式”信的手迹）

（原阜外医院军代表日记）

周恩来很清楚，要“解放”和使用受到打击的老干部，第一步是阻止对他们的迫害，他专门作了一个“废除法西斯审查方式”的批示，又千方百计地把一大批老干部送到医院治疗。由于江青一伙仍在台上，这些事情不能让他们知道。

（汤聿文时任北京阜外医院军代表）

我多次见到这个（名单批件），总理亲自批准的，将这些老人送到阜外医院住院。送来批件的，一般说来都是卫戍区或者是专案组。这些批件都是几页纸，用塑料袋把它密封了，送来时都密封了。总理都是用铅笔批示，在他的名字上圈一个圈。凡是看到出现江青的名字的时候，总理就在江青的名字上圈一个圈，不送江青，或者是暂不送江青。

（傅崇碧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74年，让我回北京，回到北京之后，我住在西直门的专家招待所那里，过了第三天，第四天了，来了个大红旗车，说总理找我。……下来，我一进第一个门，总理在中央医院，那是第二门，总理穿着睡衣、总理出来了，总理握着我的手，我见到你太高兴了，我见到你太高兴了！总理就是这样一讲，总理再讲我把身体搞好，我哭出来了，掉泪了。

（“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贺龙遗像。周恩来致悼词）

当时的一个特别现象，是人们很注意报纸上出席各种活动的人员名单。林彪事件以后，报上如果重新出现某位老干部的名字，就意味着这个人被“解放”了。周恩来正是抓住了舆论宣传的这个“窍门”，尽可能地让广大老干部出席各种形式的活动，以便第二无名单见报。尽管如此，在当时的环境下，也常常有让周恩来未能如愿的情况。

（宋平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那个时候，中央实际上不能正常工作，处境非常地困难。“四人帮”那时候横行霸道。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最后要用政府的名义来做，用党的名义去做。那谁出面呢？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极端困难下面，违心做了一点事情，也是有的。

（背景画面）

邓小平同志也曾说过：“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周恩来。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情，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陈云同志也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保了很多同志下来，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嘛！”

（北京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会见意大利外长）

（意大利摄影师拍下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的著名照片）

1973年1月，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意大利外长的时候，随行的意大利摄影师为他拍摄了这张著名的照片，取名“周恩来的沉思”。

这时的周恩来在想些什么？对于许多人来说，可能是个不解之“谜”。也许，我们可以从佩戴在他胸前的这个“为人民服务”的徽章上，得到一些

答案。

## 第十一集 拓新格局

（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炮火。解放军喊话）

1969年3月，在黑龙江边境珍宝岛，中苏两国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全世界为之注目。

（美国。尼克松发表演说）

这件事情加快了中美两国调整外交政策的历史进程。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演说中透露了要和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年间，美国历届政府都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中国。从朝鲜战争到印度支那战争，中美两国一直进行着激烈的较量。对抗的结果，是美国政府的封锁和禁运政策的彻底失败，美国本身的利益也受到损害。他们不得不正视新中国的力量，开始考虑实行新的对华政策。

（周恩来出席越南胡志明的葬礼）

（报载周恩来和柯西金在首都机场会晤的消息）珍宝岛事件半年后，周恩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先后赴越南参加胡志明的葬礼。柯西金在回国途中飞到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在那里同他谈了将近四个小时。

（顾大寿时为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随行翻译）

柯西金同志强调说，改善苏中关系很重要，对世界革命，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都很重要。周总理也说，改善中苏关系确实很重要，不过他认为改善中苏关系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是解决边境问题。周强调说，中苏边境上有一些争议地区，他希望柯西金承认这一点，柯西金认为从他这方面来说，当然有一些地区是应该谈判的，但是最好不是两国总理谈这些事情，谈这些有争议的边境问题还是由外交部或公安部或边防部队什么的高级干部来谈判解决。

（美国国旗。白宫外景）

周恩来会晤柯西全的消息传到美国后，尼克松担心中苏关系出现缓和，决心采取主动，加快同中国接触的步伐，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尽快寻找机会和中国外交官接触。

（波兰华沙全景。城市雕塑）

中美两国大使此前曾先后在日内瓦、华沙谈判了上百次，但始终没有取得明显成果。1969年12月，在这里举办一个有各国外交官参加的时装节活动时，情况却不同了。

（李举卿时为中国驻波兰大使馆二秘）

我们坐下以后，金志诚同志发现美国大使老在这儿转来转去，而且对我们特别注意，在注视着我们。我一看，是啊，他是在注视着我们。赶到这个活动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个美国大使很快先走了，跑到门口。等着我和金志诚同志出去的时候，他正在门口等着，马上他就迎上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美国大使， he就把尼克松总统致周恩来总理的一封信递给我们。他还说，他愿意会见，他不是说会见而是说愿意会见代办。这个事情嘛，在当时国际舆论界轰动一时。

（红旗轿车开进中南海游泳池）

波兰的消息传回国内，周恩来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敲门砖”来了，可以“敲门”了。早已注意到美国对华政策新动向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基于中国自身外交战略的需要和考虑，同意同美国接触。“文化大革命”后中断了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

（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上。群众游行）

（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周恩来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

然而，中美华沙谈判刚谈了两次，便由于美国入侵柬埔寨而再次中断。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百万群众还在天安门集会，支持柬埔寨人民的抗美斗争。

五个月后，同样是在天安门，周恩来别有深意地把一个叫斯诺的美国人，安排在毛泽东的身边，参加中国的国庆节，给尼克松发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外交信号。

（冀朝铸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让斯诺这个美国公民，上天安门站在主席一边，这是史无前例的，没有过的。让美国人看一看，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既然对美国人民友好，那么你尼克松是美国的总统。我们也不至于让你多么难堪。可是这点话呢，后来基辛格以及尼克松本人都在私下里和我们领导人，包括对周总理说：唉呀，实在抱歉，我们这些西方人啊，太迟钝了，根本体会不了，你们东方人这样高超的暗示，我们当时认为，斯诺算个啥，他是个亲共分子，不理他。所以这个信息没有能够传达过去。

（联合国大厦。尼克松发表演说）

东方式的信息没有被理解，但在同月举行的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大会上，尼克松托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向中国领导人传话，说愿意派一个高级秘使来中国接触。在10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尼克松还第一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

（1970年11月10日周恩来赴机场欢迎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访华）

（周恩来和叶海亚·汗在汽车上）

1970年11月10日，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来到了北京。他也是周恩来的老朋友。

（冀朝铸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谈完了中巴之间的关系以后，叶海亚总统对周总理说，我有一些事、希望就是和你一个人谈。叶海亚总统就对总理讲：我到中国之前，访问了美国，尼克松总统请我带个信，（美国）绝无与苏联联合起来反华的意思，他还是希望同中国开展对话，最后走向和好，为此，（尼克松）愿意派一个代表先到中国来。那么，总理就点头感谢了叶海亚总统带来口信。

过了几天以后，总理就给他回了个信，就表示说，欢迎尼克松派他的代表来谈判美国从台湾海峡全部撤退美军的问题，可以公开派一个特使到中国来。所以这样一个口信嘛，后来就转回去了。（信的）上面没有说给谁，下面也不签名，就是只有一个日期。这张纸由巴基斯坦大使亲自揣在口袋里飞回巴基斯坦，转交给总统大人。总统大人再交给他的最亲信的亲信转到美国。就那么一张纸，然后交给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由巴基斯坦驻华盛顿大使约见基辛格。

（基辛格时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我们收到了来自中国的消息。这封回信是用手写的，（看起来）很可能是由一位巴基斯坦人记录的。信中邀请一位（美方）代表比如我，但它并没有说一定是我，只是说，比如说基辛格博士来华，进行一次会晤。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我将这一回音告诉了当时正在林肯客厅的尼克松总统。这是在我伪政府生涯中我与总统合作的几个重要时刻之一，因为我知道，

它（这封信）是有历史意义的。

（白宫。尼克松照片）

（1971年4月第三十一届乒乓球世界锦标赛镜头）

（美国运动员科恩当时在世乒赛上的电影镜头）

双方的信息接通了，尼克松开始考虑秘密派人来中国。

就在尼克松小心翼翼地试探通向中国之路的时候，根据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精心导演了一幕被国际舆论誉为“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加快了中美接触的进程。1971年3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庄则栋中国乒乓球运动员）

我们的大巴要开往体育馆去参加比赛，中国运动员都上去了。就在刚刚快要关门的时候，就从外面“蹭”一下就上了一个外国人。上来一看，我们看他是黄头发、蓝眼睛。他一看我们是亚洲人这种情况，完了以后，看了我们带着中国国徽，他可能也知道、一看就知道，哎哟，车可能坐错了。这时，门也关上了。他那么一转身，眼睛就冲外。这一冲外呢，背后的U·S·A大家就全都瞧见了。噢，知道他是个美国人。这车就开了将近十分钟，车上就没有一个中国人去跟他答理。而我呢，就坐在那个车的最后边，前十分钟我一直在琢磨，要不要去理他。我一直做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想到我们是礼仪之邦，想到强调友谊第一，美国人上了车了、到我们车里来了，再不去理人家，我觉得这个违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所以，这时候我就一边想，我就在我那大包头找啊找，我就找一个最好的礼品、一个最大的织锦，可能有一米长吧，一个织锦，那是杭州风景图画。我就过去了。当时翻译也就走过来，跟我去翻译。后来我见了他就跟他握握手，我说，虽然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不友好，但是美国运动员始终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美国运动员的友谊，我说我送你一块织锦。当时翻译就把这话给翻译过去。科恩特别高兴。翻译说，你知道送你东西这个人是谁吗？他说我知道，是你们的世界冠军。这话就刚说到这儿，就五分钟，这就到了比赛馆了。日本的记者呢，就特别的敏锐，一看中国的车上上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美国运动员，而且跟我站在门口，一看这个情景就马上过来，就一阵狂照。照完了以后，第二天在日本的《每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读卖》，反正日本的各大新闻报，在头版头条，大标题是《中美接近》，就登出来

（庄则栋和科恩握手）

（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队的电影镜头）

毛泽东和周恩来抓住在日本发生的这一幕，公开邀请美国乒乓球队在回国之前访问了中国。在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时，谈笑风生的周恩来显然在给大洋彼岸的人们传达着某种信息。它除了表示中国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外，还在于通过美国乒乓球队员以他们的亲身经历告诉美国人民和政府：中国并不是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好战和不友好。

（政治局会议会址）

（周恩来1971年5月29日给毛泽东的报告）

尼克松从“乒乓外交”中受到了鼓舞，迫不及待地连续3次带信给周恩来，表示准备派特使到中国。5月26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详细讨论了中美会谈的方针原则和一些细节准备，亲自起草了《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回答了在邀请尼克松访华问题上的种种疑虑，提出：我们应当在5月底发出

欢迎基辛格来京举行一次预备性会谈的复信，为尼克松访华作必要的准备和安排。在毛泽东批示后，5月31日，周恩来正式向美国方面发出了邀请口信。

尼克松读到周恩来的口信后，高兴地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

（北京南苑机场，基辛格走下一架波音707飞机。叶剑英迎接）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客机，悄悄降落在北京。他此行的目的是和周恩来商谈尼克松访华的有关准备工作。

（黄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在这段时间里，基辛格和总理一共会谈了十七个小时左右。然后，总理还指定我和章文晋同志同基辛格谈这次秘密访问将要发表的《公报》。《公报》二百来字，很简单的一个公报。但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僵局，就是谁主动要来访问，谁主动发邀请。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方面原来准备不用我们主动邀请这种措词。总理有一场宴会活动在人民大会堂，就指示我和章文晋，还有王海容同志一起到主席那里直接汇报。

（基辛格时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当时我在中国期间，出现了一点小麻烦。中方希望我们在公报中暗示，是我们自己邀请自己访华的。但我们却希望，公报说明是中方邀请我们访华的。

（黄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

我们说基辛格觉得这样的措辞，岂不等于尼克松来中国是一个旅游者，好象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来中国访问。主席听了这话之后，哈哈大笑，举起手说：改，改。回来之后向总理汇报，总理提出加一个词，就是前面加一个获悉，获悉尼克松总统曾经希望访问中国，然后就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向尼克松总统发出邀请等等。然后我们拿着这个公报稿子给基辛格看，基辛格一看，非常满意。双方商定时间，就是在7月15号在华盛顿和北京同时发表。

（焰火。毛泽东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欢庆1971年五一劳动节）

（林彪座机坠落蒙古温都尔汗）

（人民大会堂）

正当中美接触紧锣密鼓地进行时，中国发生了林彪叛逃事件。

为了减少这一政治事件可能给尼克松迈向中国带来的顾虑和迟疑，周恩来觉得有必要通过“巴黎秘密渠道”及时向正在和美国方面接触的中国外交官们通报消息。

（符浩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我们到巴黎去的前一天晚上，总理见我们。总理说你坐下吧。（我）就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他就告诉我他说呀，林彪这件事情，现在还是绝对保密，没有向下传达，这已经到了27号，但是你到巴黎之后呀，你把这件事情，你都了解，你告诉黄镇大使，黄镇同志那个时候是驻法国大使。

（法国外景）

后来的事实表明，周恩来此举是给美国方围吃了一颗定心丸。

（1971年10月报载基辛格访华消息）

（周恩来会见基辛格）

这年10月，基辛格如约第二次来到中国。这次访问是公开的，目的是准



备尼克松访华时将要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

（基辛格时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我带去一份《公报》的规范文本。这种常规公报只列出双方达成协议的条文。因此线条很粗。周恩来把文本拿去研究。但第二天他来说，这个文本根本行不通，好象双方就所有的问题达成了一致，这样我们会迷惑中美两国人民，而根据贵方这一文本达成的协议是毫无意义的。

（熊向晖时任周恩来总理助理）

总理就指示，就按照 1945 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签订双十协定的办法，就是各说各的，有共同点列出来。就指示，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的立场是什么？美国的立场是什么？关于共同关心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朝鲜问题，我们的立场是什么？美国的立场是什么？共同点、不同点都列出来。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在头一次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时候，已经交换意见了。那么在基辛格十月来的时候，美国已经在联合国提出了关于联合国席位中国席位的方案，其中一个就是两个中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联合国会员国，取得安理会的席位，同时保留所谓中华民国的席位。当时，总理就说，我以中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不管美国采取什么行动，都永远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事实。

（基辛格时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那时美国只承认台湾是（中国）合法政府，因此我们必须想出某种提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我可以说我在这方面做了一点贡献。我提出用台湾海峡两岸全体中国人，从而维护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

（挂炉烤鸭。周恩来宴请基辛格）

（叶剑英等在机场为基辛格送行）

（联合国大厦。联合国表决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镜头）

（周恩来为乔冠华赴联大会议送行）

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周恩来和他会谈了十次，有了圆满结果后，还请他吃了一地地道的北京烤鸭。

不辱使命的基辛格就要回国了。他对送行的中国元帅叶剑英说：联大会议现在正表决恢复你们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我看今年不会通过，等尼克松总统正式访问你们以后，明年你们就可以进联合国了。

事实上，他的飞机刚刚起飞，就传来了联大以压倒多数的票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消息。众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在这件事上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无疑，这与周恩来长期致力于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友好关系是分不开的。面对表决结果，在场的美国代表表示：这可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但事实证明这表达了大多数会员国的看法。

当然，基辛格的两次访华，以及尼克松将要访华的报道，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不知不觉为我们拉了选票。

中国政府当即决定派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联大会议。在机场送行的周恩来，露出了“文化大革命”以来难得一见的笑容。

（尼克松到达北京机场的电影资料镜头。周恩来和尼克松握手）

1972 年 2 月 21 日，在周恩来和基辛格的周密安排下，美国总统尼克松飞到中国。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总统公开访问了一个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

这是个被称为改变世界历史的一瞬间。

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你把手伸过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周恩来 1972 年 2 月 21 日欢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宴会上的讲话画面和同期声）

总统先生，尼克松夫人，女士们，先生们，同志们，朋友们：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地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

（雪后长城。周恩来陪尼克松游长城。和群众在一起）

绚丽博大的中国古老文明，让好奇的尼克松夫妇兴奋不已。

如何接待这位来自长期的敌对国家的元首，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周恩来制定了“不冷不热，不亢不卑，持之以礼，不强加于人”的接待方针，还要求有关部门的工作一定要实事求是。

（冀朝铸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那时候是冰天雪地的时候，但是我们一些主管人士，为了使尼克松觉得我们国家是很繁华的，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就组织了一批小孩，穿得花花绿绿，拿着各种各样的球啊等等，在那里又跳舞又唱歌，看起来很好玩。可是那些美国人啊，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他们写文章说，（中国人）为了使尼克松对中国有好印象，中国政府专门演出一场戏来给我们看。总理老人家就看到这个报道了，所以第二天见到尼克松和基辛格他就说，我今天代表我们的人向你们道歉，弄虚作假，实在岂有此理。我已经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不许他们这么干，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讲究实际。所以这一点，尼克松和基辛格非常感动，他们说不管下面人怎么样，但国家的总理还是讲究实际的。

（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飞机上）

会谈几天后，周恩来和尼克松前往杭州和上海，准备在那里继续谈中美《联合公报》。

（基辛格时为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

直到那一刻，我们只完成了英文稿，还没有中文稿。由于我对周恩来极为信任，因此，我对他说，你们准备中文稿，我们无需核对，你们可以做到（内容准确无误）。当《公报》中文稿拿来后，我们发现，只要在有两三个中文词可以表达同样意思的地方，周恩来都采用了使我们容易接受的词句。这一做法，大大增加了我们对中方的信任，使我们能在凌晨四点，在杭州与周恩来一起完成了这项工作。

（杭州西湖。周恩来和尼克松在西湖畔的刘庄）

（刘庄八角亭）

1972 年 2 月 27 日，尼克松夫妇满怀兴致地游了一趟西湖。也许是过于沉浸到这如画似锦的山水景致里去了，他们曾一度找不到事先约定的与周恩来会面的地点。

周恩来把他们带到刘庄的八角亭，在这里代表中国政府正式谈定了中美《联合公报》，同日，在上海正式发表。

中美关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基辛格时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我认为周恩来是我遇到的人当中最机智的一位，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具有所有这些品质，并且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真诚的替他人着想的能力。不过他自己的确是一位非常强硬的谈判家，但他总是考虑得非常周到。他非常善良，他是一个极富人情味儿和能力的结合体。

基辛格还说：中美两国在 70 年代谋求和解，这是世界环境决定的。但事情来得这样快，发展得又如此顺利，则是由于中国总理的光辉品格和远见卓识起了不小作用。

（钱其琛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对美国的关系，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邀请基辛格和尼克松来访问，发表几个《公报》，特别是中美上海《联合公报》，那么所有这些对美工作，周总理当时也是决策人之一，也是指挥者，具体指挥的同时，他也是直接进行谈判，所以是一个实践者。这三种身份，决策人、指挥者、实践家，三种身份合一来创造这种经验，这些对现在我们的外交工作还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中美上海《联合公报》）

（报载日本佐藤内阁下台）

（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会议镜头）

（田中角荣发表演说，报载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

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双方都谈到了日本。中国说：“中国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对外扩张”。美国说：“要最高度地珍视同日本的友好关系”。

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日本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可避免地震动了日本政坛。佐藤内阁迅即下台，新任首相田中角荣一上台就发表声明，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时机正在成熟”，“我们要认真地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2 年 7 月 9 日周恩来欢迎也门外宾）

（日本建筑）

两天后，周恩来就对日本政府的态度做出了反映。他在一个外交场合表示：田中内阁的这个声明是值得欢迎的。随后又托人带信给田中角荣，欢迎他能到北京来当面商谈。

（日本“周樱”石碑。岚山诗碑）

（一组周恩来在五六十年代会见日本民间团体和人士的电影资料）

周恩来是一位感动过许许多多日本朋友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十九岁的时候，他曾到这个国家寻找过真理。在日本不少地方都有关于周恩来的纪念物。

如今这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趋势，也是周恩来长期以来重视中日民间外交的结果。作为政府总理，他会见最多的外国客人，就是日本人了。

早在五十年代，周恩来就说：“我看就照民间外交的方式做下去，日本团体来得更多，我们的团体也去，把两国政府间要做的事都做了，最后只剩下两国外交部长签字，这也很省事，到那时，只剩下两国总理喝香槟酒了。”

（清水正夫时为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团长）

我们（和周总理）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一种关系。比如因为我们住在北京饭店，周总理就会来这里看我们。（他一来）我们就沸腾了，欢呼着：啊！周总理。周总理也特别高兴。他询问我们各方面是否有困难，还向我们

介绍中国文艺界的一些现状，总之各种各样的话题都和我们交谈，确实象我们的家庭成员一样，对我们非常热情。

（石狮。紫光阁。叠出一组周恩来在 1972 年会见日本政界要人的资料镜头）

（1972 年 7 月 27 日周恩来会见竹入义雄）

在田中角荣出任日本首相前后，周恩来又先后会见了一批日本政界要人。他告诉来访的客人，二十二年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从没有中断过，中日两国没有理由这样对立下去。如果田中首相或其他大臣来中国商谈恢复邦交正常化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

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人义胜随后受田中角荣的委托来到了北京。周恩来同他的会谈，为田中角荣正式访华定下了基调。

（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一行合影。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迎客松会见田中角荣）

1972 年 9 月 25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一行来到了中国。在欢迎田中首相的宴会上，周恩来致祝酒辞。

（周恩来在欢迎宴会上致祝酒词的画面和同期声）

自从 1894 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的日本人民，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

（田中角荣致答酒词镜头）

接着是田中角荣致酒会答词。他在答词中说了一句话，使周恩来很不满意。

（二阶堂进时为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田中说）在很长时间以来，日本给中国人民添了很大的麻烦。周恩来总理听到这句话以后，他列举了一连串的事例，对田中说，田中先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们犯下了滔天罪行，难道你只用添了很大的麻烦就可以了结吗？这种谈判，确实让人感到周恩来很伟大。

（周恩来和田中角荣会谈）

在此后的谈判中，田中角荣接受周恩来的意见，重新作了表述，他说：日本方面痛感日本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林丽韞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当时谈判当中比较难以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废除《日台条约》的问题，这是日本政府跟台湾当局签定的一个条约。由于当时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内部有一股亲台的势力，本来就在那里阻挠中日建交，所以从田中内阁来讲他由于刚刚成立不久，党内还有一定的困难。当时在谈当中呢，日方就表示虽然不把它写进《中日联合声明》当中，但是呢，可以在签署《联合声明》以后，以某种方式由日方向外界公开声明退出《日台条约》。总理听了以后很高兴，这样的方式还是可以达成协议的。所以当时呢，周恩来总理就讲，就是中国孔夫子有一句话，就叫“言必信，行必果”，而且呢当场就写在纸条上，递给田中首相。田中也马上回答：“信为万事之本”，而且以中文写了一个纸条、交给周恩来总理看。

（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书房会见田中首相的电影资料）

随后，毛泽东在书房里会见了田中角荣，还送给他一套线装本的古文学作品《楚辞》。

（军乐队演奏。周恩来和田中角荣等人在宴会上举杯）

（周恩来接见冈崎嘉平太的镜头）

经过二十二年的民间外交，中日两国的总理真的在一起喝香槟酒了。这时候，周恩来想起了那些为促进中日友好作出贡献的日本老朋友，专门提到了一位叫冈崎嘉平太的人。

（原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事务所代表冈崎嘉平太之子）

母亲说是从北京来的电话，父亲站起来去接电话，我们似乎能听见他接电话的声音。一会儿胞走回来，我们看到他由于激动脸都红了。他似乎是脱口而出：“是周总理来的电话啊”，然后，他摘下眼镜擦着眼角，陷入了沉思。他又说，中国人让我过去呢，我一定要去。那时候我就想，如果真的是高兴的事，父亲难道不应该笑吗？据说，周恩来多次仔细查看过日本来华人员名册，旁边有人问，您在寻找什么呢？周总理说，怎么没有冈崎先生的名字？于是他说，日本政府方面的名单里没有冈崎先生，那么我请他好了，立刻给他打电话，我出电话费。话说到这种程度，这才有了刚才从北京打来的电话。

（周恩来和田中角荣步入人民大会堂。双方签署《中日联合声明》）

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声明宣布：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国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资料片同期解说）

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周恩来、田中角荣的签字文本）

（林丽蕴时任周恩来的翻译）

周总理在大会堂签署完公报以后，非常地高兴，我永远忘不了总理的那个笑容。在交谈当中，田中首相提到他们日本的贵宾馆，就是他们的迎宾馆，原来是皇太子的离宫，正改建为国宾馆，正在重新装修。池希望周恩来总理作为第一个国宾到日本去访问，我们一定在这个迎宾馆来迎候。当时总理微笑着说，我们当时不理解他那一句话，（他说）看样子我是不可能去了，但是他们可以去，指我们在座的别的中国同志可以去。总理去世以后，我们才体会到当时他自己心里是知道自己重病在身，自己是不可能到日本去，但是中日建交以后可能还有更多的中国朋友到日本去访问。

（1972年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建交的报道）

（群众欢迎处宾的场面。）

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中日邦交的正常化，1972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又相继和英国、荷兰、希腊、联邦德国、澳大利亚等一大批西方国家建立了大使级的外交关系。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同西方国家建交最多的一年。

（李鹏国务院总理）

1988年我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有一次，小平同志约我去谈话。他告诉我中央已经决定由我担任中央外事小姐的组长，主持对外工作。他说：你要

学习周总理，周总理在外交工作上有重大贡献，体现了泱泱大国的外交（家）风度。他说：周恩来同志在外交工作上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表现出高超的外交艺术。他要我很好地学习和继承周恩来同志的这种优良的作风与传统。

（周恩来会见外宾镜头）

新中国成立三十三年后，终于全方位地走向了世界，从而为今天的对外开放拓展出一个新的格局。在这艰难的行程中，周恩来所付出的努力，所展示的风采，无疑将永远地让人们感怀和纪念。

## 第十二集 最后岁月

（周恩来到机场欢送索马里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一行的电影资料）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前往北京机场，欢送来自非洲的索马里贵宾西亚德一行。镜头中，周恩来依然那样目光炯炯，神态自若。

人们不会想到，正是这一天，来自北京和各地医院的专家们会诊确认：他患了膀胱癌。

（人民大会堂福建厅）

实际上，周恩来这时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了。他曾在这里对来访的斯诺说过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他指的是把自己的身体打败了。

（韩素音英籍作家）

他（周恩来）第一次开口对斯诺讲（这样的话）。斯诺跟我谈：周恩来的生活很苦啊，很苦啊。周恩来说，我左右人很少，也不知道有这么多事情，他都要自己做，都要自己做，什么事情他都要自己查。斯诺感觉（情况）很不对，他（周恩来）累得要命，所以后来他得了癌，1972年的事情。

（一组周恩来在“文革”中各种会议上讲话的镜头）

（中南海西花厅。1967年2月3日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造反”大字报）

（周恩来的会客室。邓颖超写给周恩来的条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苦苦维系着经济工作的运转，还要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干扰进行斗争，这对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身体和精神承受的负担，是可想而知的。

为了劝说过度操劳的周恩来注意身体，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联名写了这张大字报，上面说：“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才能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

这样的条子，妻子邓颖超写了十几个。她说：你有时候连续工作三十个小时，“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大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

然而，在那些日子星，周恩来只能以顾全国家命运为大局。面对癌症的威胁，周恩来这样告诉他的医生……

（吴阶平时任周恩来医疗组组长）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作为医疗组代表去说的。总理就说了两句，一句我配合你们，这是头一句话。那就是说，他相信我们的话了，他配合我们，我们认为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但是第二句话，你们也要配合我。这句话呢，我也懂了，就是说我们诊断治疗，就要用他的时间，就要打乱他的计划，配合我们他会同意的，不会有什么不同意，但是我们也要配合他，就是他要工作、治疗诊断两不误，诊断治疗和工作两不误。

（西花厅夜景）

周恩来这时最关心的，是如何尽快把“文革”中被打倒或被停止工作的老干部解放出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他开始着手解决这个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

（江西新建县邓小平下放劳动时住的“将军楼”）

（中央讨论文件。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

1969年10月，在“文化大革命”前一直是周恩来得力助手的邓小平，

被下放到江西的新建县参加劳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说到邓小平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周恩来抓住机会，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问题。1973年3月9日，他把讨论文件送给毛泽东时，提议中央作一个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决定，下发到县团级，以便向党内外群众传达。毛泽东批示同意后，这个决定在第二天就下发了。

（北京西郊玉泉山。周恩来住地）

决定发出的当天，周恩来向中央请假，来到北京西郊的玉泉山休养治疗。已经回到北京的邓小平专程来这里看望他，两位老战友在一起吃了顿晚饭，促膝谈到深夜。

（1973年4月12日周恩来，邓小平等欢迎西哈努克到京）

1973年4月12日，在跟随周恩来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回到北京的行列里，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在中国政坛上消失了七年的邓小平。他在公众场合第一次亮相，成为当时最大的政治新闻。

（1973年6月，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参观的电影镜头）

邓小平复出后，周恩来加快了解放其他老干部的进程。1973年6月，他借陪外宾到延安参观的机会，仔细地查看了那里的革命纪念馆，还深情地谈起党的历史，谈起许多老一代革命家的事迹，提出应该更多陈列他们的照片。敏感的人们不难体会到，在党的十大召开前夕周恩来说这些话，显然有着深刻的含意。

（1973年8月党的十大会议镜头）

1973年8月，中共十大在北京举行。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出席的最后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经过周恩来的努力，一批在“文革”初期被打倒或停止工作的老同志进入了中央委员会。邓小平随后还进入了政治局。但与此同时，党的中央领导层内也形成并加强了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小集团的势力。

（报载“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的文章）

一些复出的老干部在工作中抵制了一些“左”的做法，引起“四人帮”的不满和仇恨，他们攻击这是错误路线的“回潮”，认定老干部的后台就是周恩来。于是，从1973年下半年起，他们又利用“评法批儒”和“批林批孔”的机会，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1973年11月，江青、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在“迫不及待”地夺权，还说他们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江青还要求增补他本人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1973年12月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

这年12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后，把周恩来和王洪文等留下，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他说：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错误的，说总理“迫不及待”，不对，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毛泽东还否定了江青提出的增补常委的要求。两周后，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周恩来起草了这份邓小平参加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

（批林批孔场面。1974年1月25日大会会址）

“四人帮”一伙仍不甘心。1974年1月25日，在中央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他们又进一步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叶帅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搞“修正主义”。

（国务院会议室）



许多老同志见到周恩来时，都对他的处境和身体表示担忧。周恩来则意味深长地表示，无论如何要做到六个字：“不倒，不走，不死”。

实际上，周恩来的病情在这一年的春天已经进一步恶化了。医生建议他住院治疗，对正在逐步扩散的癌症进行手术切除。周恩来不同意，他在批示中表示“暂不予考虑”。

（会议室）

（周恩来给毛泽东的报告）

（邓小平在联大会议上发言）

（周恩来到机场欢迎回国的邓小平）

周恩来作出这样决定的重要原因是，他要亲自安排邓小平率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由于江青以种种理由反对，周恩来几次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说服，并且还提出：邓小平离开北京时，要“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这是新中国政府领导人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坛。由于其他国家参加会议的多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邓小平的这次亮相显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回到北京时，周恩来又安排了盛大的欢迎场面，还抱病亲自前往机场迎接。

（邓颖超）

周恩来同志患了癌症，按照他初期的癌症和治疗条件是可以治好的，但是他不能够得到治的结果。最重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工作太繁忙，第二个就是“四人帮”想尽很多的办法，增加他工作的负担，并且呢还对他采取所谓疲劳轰炸的这样（方法）折磨他。当然他当时心情是很沉重的，当然这种沉重并没有影响他为党（做工作），与病做斗争，因为他的心情和他的责任感。对于当时的形势，他是很忧虑的。

（周恩来工作台历。周恩来的病历档案）

（周恩来工作台历。庆祝六一儿童节）

（办公室。汽车离开中南海）

邓小平回来不久，周恩来终于答应住院治疗了。

这年6月1日，正好是国际儿童节。孩子们高高兴兴地庆祝着自己的节日。

周恩来离开了他的办公室，离开了西花厅，离开了中南海。离开了他工作和生活了二十五年的地方。

此后，周恩来一直住在三 五医院。中间有两次，邓颖超搀扶着他回到西花厅看了看。

（三 五医院）

（周恩来接见美国参议员杰克逊的图片报道）

住院一个月后，新华社播发了这条周恩来在医院接见外宾的消息。全国人民才知道，周总理患病了。（报刊所载《孔丘其人》。1974年6月江青讲话记录）

（中南海游泳池）

在“四人帮”操纵下，这个时期的报刊却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批判所谓“宰相”和“现代大儒”，把矛头再一次对准周恩来。

毛泽东随即主持政治局会议，严厉批评“四人帮”，他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小宗派，不要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

（1974年国庆招待会电影资料）

不久，国庆节到了。周恩来利用国庆招待会的机会，安排老干部们作了一次集体亮相。这次亮相增强了同“四人帮”相对抗的党内健康力量。

（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讲话的同期画面和声音）

贵宾们，朋友们，同志们：二十五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二十五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

（1974年国庆招待会电影资料）

宴会上，周恩来见到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劫后余生的人们热泪盈眶，相别八年，他们发现周恩来老了许多。

（报载风庆轮远航归来。风庆轮）

（周恩来视察先进设备图片。工业建设）

（周恩来会见外宾）

国庆节一过，发生了著名的“风庆轮事件”。

七十年代全球出现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周恩来抓住时机，先后批准进口几十亿美元的外国先进设备，他还指示，在国内造船跟不上需要时，可适当买些船只。

而江青一伙却攻击这是“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恰在这时，国产万吨级的“风庆轮”远航归来，因交通部派到船上的干部对“四人帮”的做法表示了不满，于是，“四人帮”抓住这点大做文章。

（李国堂时任“风庆轮”政委）

到岸十天就斗我们了。10月11日开始斗。一开始斗，就问“是谁派你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我们是总公司派来的”。“谁叫总公司派你们来的？”“交通部啊”。“谁叫交通部派的？”我们说，“总理批示的第一条就是派工作组啊！”“噢！周总理。”说了好几遍“周总理”。这不就追到家了，追到底了么？

（人民大会堂。三五医院）

这时，中共中央正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政府成员的人选。“风庆轮”事件实际上是围绕四届人大组阁斗争的一个先兆。

在10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一伙借“风庆轮”事件继续发难，企图再次打倒邓小平，实现夺权的目的。

周恩来在医院里听取了政治局会议情况的汇报后，明确表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在医院里，周恩来还经常找邓小平、李先念、叶剑英等人谈话，支持他们的工作。

在医院里，周恩来依然是那样繁忙。

（高振普周恩来的警卫员）

这以后，总理的工作不能说跟在西花厅正常工作没有区别，还是有区别的，但工作量相当大了。看文件，开会，找人谈话，这个几乎是很多。

医院的会客厅的概念，好像是人家来看他的时候坐一坐的地方，实际上不是，变成了他开政治局会，开会的地点，见外宾的地方，接待客人，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不断地来看他，看他，就要谈工作，比较多。象叶帅、小平同志、李先念，这些都是来往比较频繁的人，经常到医院去看他。在这里开各种会一共是200多次，接见外宾就60多次。出去活动，开会也不少。特

别是准备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以前，这工作量相当大，这里边好多工作都是总理亲自来做。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王洪文的同期画面和声音）

“四人帮”一伙为了谋取更多的国家权力，主宰国务院的工作，派王洪文飞往长沙向住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

审判员：你到长沙是不是向毛泽东主席说过，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还忙着找人谈话，几乎每天都有人到总理那里去，经常到总理那儿去的有小平、剑英、先念，讲过这个话没有？

王洪文：讲过。

审判员：你这些话是从哪儿来的？

王洪文：这些话是这样，是江青在10月17号之前，大约一个礼拜不到一点，政治局开会。开会以后，江青把我留下跟我讲，她去看了总理，她向总理提出来关于四届人大人选的问题，主要是讲总参谋长的人选问题，就是部长、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总理不表态支持她，总理对四届人大人选，心里好象有一本帐，比较清楚的，但没有和她讲。她并且向我申明，你是主持中央工作的副主席，我向你申明，我保留我的提名的观点。并且还讲，总理经常找人谈话，谈得很晚，经常到总理那里谈话的有剑英、小平、先念等。

审判员：你接受了这个话，向主席讲了？

王洪文：讲了。

审判员：是这个情况？

王洪文：对的。

审判员：把被告人王洪文带下去。

（湖南长沙毛泽东住地）

到长沙告状的王洪文，碰了一个钉子。毛泽东要他回北京后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谈，不要跟江青搞到一起。还明确表示，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周恩来负责。

周恩来在北京主持拟定了一个人事安排名单，他给毛泽东写信说：“我积极支持主席提议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一切准备停当后，他抱病飞长沙亲自向毛泽东汇报。

（张佐良时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

总理是在1974年的12月23日到了长沙。在此之前，叶帅就询问过多次，说总理的病情最近到底怎么样？也就是在我们12月出去之前，在11月就多次问过。我们就说，情况还是稳定。但是开头他并没有讲要怎么样。最后一次讲的时候，就问总理的身体能不能外出一次。我们一听外出，不知道是外出去那里，是国内还是国外，时间长短，都不敢问。他跟我打电话，我不好多说，我只能说总理的病情现在还稳定，如果短期外出，时间不长，我想是应该可以的。他听了我的话，心里好像是有点底了，然后就叫我考虑一个精干的医疗班子，不要人多。他说，这次外出，就是到长沙去见主席。

（长沙毛泽东的住地）

这次到长沙，身患绝症的周恩来说了一句：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

（张佐良时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

12月26日是主席的生日，下午在离开那个地方，就是主席的驻地时候，那时候湖南的第一书记是张平化，总理向张平化交待，今天晚上吃面，菜简

单一点。在我耳朵里还第一次听到总理主动提出来要吃面，他要给主席过生日。因为党中央领导人都是不过生日的。主桌就是周恩来、张平化、李振军他们，我们随员就在另外一桌。总理很开心，我从情绪上看，一定是关于这次到长沙来的任务，拿现在的话来说，跟主席的意见是一致了。27号凌晨两点左右，突然一号楼主席那里来电话，请总理过去，毛主席要跟他谈谈。那天在主席那里谈的时间很长，到了天亮。

（长沙毛泽东住地夜景）

（毛泽东和周恩来合影一组，打出字幕）

（周恩来整理的毛泽东谈话）

这天晚上，他们就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任职安排交换了意见，毛泽东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增补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现在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去顶。谈话中最终确定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还决定在四届人大之前召开党的十届二中全会。

后来，人们把这次谈话称作决定中国政治走向的“长沙决策”。

自1925年在广州相识以来，毛泽东和周恩来为谋求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共同奋斗了半个世纪。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后一次长谈。两位党的创建者，两位开国领袖，一个八十一岁，一个七十六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纪录片）

1975年1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了。周恩来抱病作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

（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的同期画面和声音）

（周恩来同期声）

各位代表，我现在作《政府工作报告》，请求大会讨论和批准。

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再用二十多年的时间，一定能够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李鹏国务院总理）

在1975年1月，周恩来同志在四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政府工作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重申了中共中央所提出的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技术、国防现代化的主张。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国经济还非常的困难，他重申了这个现代化目标，可以说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那时周恩来同志已重病在身，一年以后，他就离开了我们，因此可以说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是周恩来同志留给中国各族人民的一份政治遗愿。

（周恩来在主席台上鼓掌特写）

（报载四届人大政府组阁名单）

这时周恩来最关心的，一个是经济发展目标，一个是政府领导成员。人们发现，在四届人大的政府成员中，多数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

（三五医院）

（周恩来起草的国务院副总理分工报告）

在随后召开的新一届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明确宣布：我的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他还拟定了一份十二位副总理分工的文

件，在上面写道：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呈批主要文件。

（钢铁生产现场。火车行进）

（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

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不顾“四人帮”的重重阻挠，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各个领域的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不到一年时间，我国的工业、农业、科技、教育、文化和军队各方面的事业，都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周恩来在医院接见罗马尼亚外宾的镜头）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在医院里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对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没有什么。我现在已经不能工作，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已经全面地负起责任来了，他很有才能。

（三 五医院）

这时候，周恩来身上的癌细胞已经全身扩散，要做大手术治疗。9月20日，医务人员把他扶上平车，往手术室推去。

（张佐良时任周恩来的保健医生）

我们将平车推着往外走，到走廊里边。距离手术室还有四、五米的地方，因为我是推的他头那边，警卫是推的他脚那一边，我们是由西往东走，总理在车上就跟我说话，小平同志来了没有？我说，来了。他说，请他过来一下。然后我就跟后边同志说，请小平同志过来，总理跟你说话。小平同志耳朵不大好，所以他们也是大声嚷嚷。后面党中央的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张春桥，有这些人。小平同志就过来了，总理就伸出右手，跟他握着手这么讲话，他说：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来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总理是大着嗓门，因为总理的嗓门是有一点沙哑的，他是提高了嗓门这么喊的。我们看到他有点激动。小平同志握了握他的手，没有听到他说什么。意思就让我们走，因为我们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了。就继续往前走，小平同志一直就站在那个地方，手就这么举着。

（三 五医院走廊移动）

（1932年报载《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毛泽东关于伍豪事件的批示）

（人民大会堂）

这时候，周恩来心里还牵挂着另一件事。那就是所谓“伍豪事件”。

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周恩来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曾用过这个名字。1932年周恩来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两个月后，国民党为破坏中共党的组织，在报上登了一个《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时任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立即登报辟了谣。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等人利用这个启事，企图破坏周恩来的政治声誉，打倒周恩来。

为此，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中批示说：“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毛泽东还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给中央高层领导干部详细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

1975年9月20日这天进手术室前，周恩来想起了这个报告记录稿，自己还没有签字。

（赵炜时任邓颖超的秘书）

当时通知我说，总理就等着这个记录，你越快越好。所以我到那以后，就到总理的身边。总理这时候是躺在那个手术的推车上。我到了以后呢，工作人员就把他扶起来，就是半扶坐着。然后我们用了一块木板，就这么给他托着，把这个报告搁在这木板上，周恩来总理用他颤抖的手签了他的名。签完名不算，他还写了，就是注明：于进手术室，年、月、日。

（周恩来签字原件）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代表性合影陆续叠出，并打字幕）

在医院里，周恩来和邓颖超共同度过了他们的金婚纪念日。

1919年他们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相识，1925年在广州结婚，到1975年刚好半个世纪。

大革命时期，他们有过孩子，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还没有出世就做掉了。后来，邓颖超又一次怀孕，因为难产，孩子没有保住。从此，他们一生没有孩子。周恩来住院前，他们都住在西花厅，可是单独相处的机会并不多。在医院的日子里，单独相处的时光反倒多了。邓颖超每天到医院里看望他，给他读文件，聊天，为他削苹果。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回答说，“我肚子里也装着许多话。”

（中南海游泳池）

1975年，毛泽东曾专门关心地询问了周恩来的病情。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谈到自己的病源时提到了长征。

（《长征组歌》画面和歌声。）

雪皑皑，野茫茫。

高原寒，炊断粮。

……

雪山低头迎远客，

草毯泥毡扎营盘。

风雨侵衣骨更硬，

野菜充饥志越坚。

官兵一致同甘苦，

革命理想高于天。

（三五医院）

《长征组歌》是周恩来很喜欢的节目。在医院里，邓颖超找来的唱片，常常放给他听，伴随他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赵炜时任邓颖超的秘书）

周恩来总理把邓颖超大姐约到他的病床旁边，周总理就对邓大姐说，不要责怪任何人，要感谢他们（医生），要感谢他们（医生），要谢谢大家。然后总理就说，团结起来。就握着两只手，紧握，握着拳头，说争取更大的胜利。完了他就接着唱起了《国际歌》两句，就说：“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吴阶平时任周恩来医疗组组长）

1976年1月7号晚上，大致是11点多钟，那时总理已经在弥留之际，有时候糊糊涂涂，有时候又稍微清醒，一会儿又糊糊涂涂。那天晚上11点多钟，我们好些人就围在他的床边，就是在305医院，他一抬头，忽然比较清楚，他看见我，说句话说得很清楚，很简单：“吴大夫，需要你的地方很多，

我这儿没什么事，你去吧，他们需要你。”这句话说完以后，他就没再说话，所以给我们的感觉呢，就是总理一心为别人，总是想到国家，想到大事，想到别人，不想自己。在那个时候，他是在弥留之际，实际上他那时大脑已经是活动能力很小了，当然他能说出这句话来，表示他的大脑还可以，就好象咱们老的说法，叫“回光返照”吧。可那时候，他的大脑都不大能有做出什么决断的了，好象很条件反射他说了这句话。这就充分说明，他在那种情况下，他想的还是别人，并没有想自己。那句话以后他就没再说话，所以那是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

（台历。时钟）

（周恩来遗像）

（周恩来的遗体装入水晶棺）

（邓颖超扶棺而哭）

（悼念花圈）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时年七十八岁。

（纪念碑）

（粉碎“四人帮”。三中全会镜头。邓小平1984年国庆节在天安门检阅）

（十五大镜头。俯拍城市建设。立交桥）

（周恩来巨幅像）

周恩来这个名字，人们叫了整整一百年。在中国的百年历史巨变中，周恩来为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现代化中国，耗尽了毕生的心血。

邓颖超曾这样说：“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

（李鹏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同志的经济思想是实事求是的，也是高瞻远瞩的。可惜的是他亲手绘制的中国现代化的蓝图，他没有可能看到是怎样付诸实施的。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把实现现代化分为三步走的战略方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在带领全国人民为了进入二十一世纪，为实现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中国的现代化，为完成周恩来同志留给我们的政治遗愿而努力奋斗。

（西花厅。周恩来各种图像。黄河俯瞰）

周恩来走了。邓颖超在海棠树下怀念地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了我们。你到哪里去了啊？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入了无边无际的海洋。”

